

前 言

《宣传动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工作指导性刊物。为了适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刊物编辑部决定：每年选辑若干适合广大党员干部阅读的材料，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读物发行。

阅读范围：公社以上党员负责同志；县和相当县级以上党委工作部门，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县以上宣传文化单位的党员干部；由县委和相当县委一级党委宣传部门具体掌握。本书可供上述人员个人购买保存，但不要外传和公开引用。

在编辑中，对收入的文章、材料，有个别的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改。本书仅供党内有关单位和同志参考。凡涉及工作中的政策规定等问题，当然应以现在的正式文件为准。

目 录

从元旦到春节期间的新闻宣传工作	1
张香山同志在地方对外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要)	4
打破森严壁垒 密切联系群众	10
业余宣传队和民间艺人的作用都要充分发挥	13
关于革命历史陈列馆的两点建议	16
坚持两分法 继续向前进	18
不要对外宾弄虚作假	24
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25
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	29
关于禁止印售外国和港澳台电影明星照片的通知	33
科学实验报道不可轻率	34
清理过时标语	35
不能让这种国民党的恶习复活	36
要把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抓起来	38
金山县文化馆办活了	42
认真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报告	45
辽宁开展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宣传	50
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公开宣传问题	52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54
农村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	55

要重视处理好语录、像章和过时标语口号	60
苏联以“八一”电台名义造谣惑众攻击我国	61
群众性刊物不宜登载裸体作品	62
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干部提出宣传工作应该注意的问 题	64
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67
对外商录制我文艺节目要加强管理	68
突出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宣传	69
警惕进口印刷品中的思想渗透	74
这些党组织的战斗力何在?	76
关于同台湾往来的宣传问题	81
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82
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同志	92
打击刑事犯罪的报道不要猎奇	95
张骏祥同志谈当前电影创作问题	97
外行一定要变成内行	100
克服片面性是端正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105
尽快把党员教育工作抓起来	115
吉林省委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意见	120
《四川省委宣传部分析全省思想战线形势》一文的编 者按	124
内部资料也要注意保密	125
党组织要维护教师的权益	127
江苏总结农村冬训工作	129
不要滥印西方侦探小说	133

制止外国人自行散发宣传品	134
正确执行宗教政策 开展无神论的宣传	137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142
周扬同志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56
一件由惊人的愚昧招致的特大凶杀案	173
对《吃运动饭》一文的批评	178
重申不要滥用“长官意志”这一概念	180
反映新情况 探讨新问题	182
——穆青同志谈经济宣传	
北京市委宣传部调查处理非正常流入的外国书刊	189
对宣传干部的几点要求	193
——王任重同志在中宣部党员轮训班开学典礼上 讲话的一部分	
要重视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	201
汪锋同志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问题	205
李维汉同志谈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	206
思想工作始终是宣传工作的中心	219
多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	222
关于电影《武训传》问题	223
陆定一同志谈理论学习问题	224
保持清醒头脑，认识资本主义弊端，避免盲目性	231
（我驻日使馆参赞陈抗同志对留日学生谈话的 一部份）	
宣传老干部新的光荣责任	247
注意一个重要提法的变动	249
不要开“比富大会”	250

组织学习和宣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251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253
要经常注意揭露谣言	255
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理论宣传	256
县报大有发展前途	259
“让贤”的说法不好	262
对“四人帮”组织、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	263
增加旅游项目要注意政治影响	267
“绥靖”一词使用应慎重	268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一文的编者按	269
地方要关怀和支持部队建设	270
总政文化部提出要继续加强反腐蚀的教育和斗争	272
照相业要刹歪风	276
江苏省发出解决工矿企业宣传经费问题的通知	278
王任重同志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79
积极准备做好《周恩来选集》出版后的宣传工作	285
理论研究中一个需要注意掌握的问题	286
宣传涉及政策变动的试验要慎重	287
正确对待少数人闹事的问题	289
宣传要有利于民族团结	291
关于党的生日的公开宣传	291
桂林市推行人民公约活动	292
不举行领导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	294
报刊要严格把关防止泄密	295
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	297

从元旦到春节期间的 新闻宣传工作

最近，中央宣传部召集北京一些新闻单位，座谈元旦和春节期间的宣传报道问题。大家认为，从元旦到春节期间，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要认真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新年茶会上的讲话，并按此进行宣传报道。宣传一年来在各条战线取得的重大成就，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胜利，宣传一九八〇年的任务，讲明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既具有坚定的信心，又保持清醒的头脑，顽强战斗，去夺取四化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二、要大力宣传增产节约，广开门路。各行各业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总结工作，引导干部群众千方百计地搞好挖潜、革新、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广开门路，以最少的劳动耗费，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果，加快四化建设的进程。

三、结合年终总结评比，利用各种形式表扬那些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生产、工作；立志改革、勇于创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善于钻研，广开门路的先进人物，造成一个人人比学赶帮，立功劳，当模范，为四化多做贡献的热潮。

四、宣传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到四化建设中来。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活动，加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宣传少数民族中的好人好事，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交心谈心，加强干群团结、党与非党的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团结。

五、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从今年元旦起正式实施，要继续深入进行法制教育。使广大群众认识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自觉地掌握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保障四化建设。

六、宣传勤俭持家、艰苦朴素，防止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发动和组织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团体、民间

艺人，开展丰富多采，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反对赌博和其他非法活动。

七、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维护社会治安，注意安全生产，欢欢喜喜过好节日。

(第1期, 1月7日)

张香山同志在地方对外 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举行的地、县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曾邀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就加强地方对外宣传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张香山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要点如下：

关于对外宣传的对象、任务、目的以及一些基本方针、原则，耀邦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间作了回答，都已刊登在《宣传动态》第九期上，这里不再重复。现在仅就为什么要加强地方对外宣传、当前地方对外宣传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座谈中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为什么要加强地方对外宣传工作？对外宣传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做的。例如我国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互访、会谈，我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会见应邀来访的外宾；文字方面

如外文局出版和发行的期刊、杂志、书籍，新华社、中新社、广播局发布的对外新闻；文化交流方面如电影、文艺演出的出口等，这些都是大量的对外宣传工作。至于在地方，主要是结合外宾、华裔、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参观、游览、访问等活动，作好对他们的口头宣传工作（当然地方也有文字宣传，如介绍本省、市、区的情况和成就的书面材料、导游图、画册等）。为了作好对外宣传，还需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教育，特别是对涉外单位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外事纪律和正确对待外宾的教育。

过去地方对外宣传一直由外办抓，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很少过问。这在地方外宾少的情况下，还勉强过得去。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外宾数量大大增加。接待任务越来越繁重。

发展旅游业也会带来副作用，即国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会侵蚀到国内来。对此，我们是早已预见到的。但能否因怕受到侵蚀就不搞旅游了呢？不能这样。我们搞四化，不能不同外国人来往。搞四化需要资金。发展旅游业比用其它办法能够更快地积累建设资金。我们能否把房屋打扫干净再请客呢？“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打扫了十七年，大有成效。那时路不拾遗，搞没有蚊蝇的城市，社会风气也很

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渣又泛起来了，并且有了新的的发展，如青少年犯罪增多等等。侨务政策也受到了破坏。但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再打扫几年才请客。因为，四化是最大的政治，四化需要建设资金，而且需要扩大国际间的文化、经济和科技交流。特别是为了搞四化，我们还得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需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可以说，发展对外关系，发展旅游业是四化建设的需要，是反霸斗争的需要，也是我国历史新时期的客观需要。对外宾、旅游客人等做好宣传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目前，我们一般开放的地区、城市已有一百一十七个，但实际上开放的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外宾有各行各业的人，要同我们进行对口交流，同群众的接触面和机会也大了、多了。他们了解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比过去深入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有了变化，过去不敢接近外宾，现在消除了顾虑，甚至主动找外宾交谈。这也说明地方的宣传任务比过去重了。外办、旅游局、侨办等有关部门，都很希望地方党委宣传部能过问对外宣传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耀邦同志昨天讲话中谈到一九八〇年的具体宣传任务时，在第八条中特别提出了加强对外宣传的要求。所

以，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应当进一步积极地承担起任务来。

宣传部过问对外宣传，并不是取代外办、旅游局、侨办的工作，而是尽自己应尽的职责，与这些部门协同动作，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指导。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第一，我们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外事工作的书记，定期召开会议，由宣传部、外办、侨办、旅游局等有关单位参加，讨论对外宣传问题，以便协调力量和动作。第二，耀邦同志在批示中宣部对外宣传局的一份关于对外宣传的材料时指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写三、四次总结性的材料，登在《宣传动态》上，进行及时的建议和指导。”我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是否也参照这个批示去做，既向党委反映对外宣传中的情况和问题，提出建议，同时协助、推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对外宣传工作。第三，召集宣传部所联系的报纸、广播电台、文化局等单位开会，及时了解情况和问题，定期研究改进对外宣传工作。

二、当前地方对外宣传工作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外宣传的问题很多，这里着重谈两个问题：

（一）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对外宣传经常是强加于人，大国主义，硬搞一套政治灌输，强

迫人家听不愿意听、看不愿看的东西，效果很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克服流毒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这种流毒至今还有不少残余没有肃清。另一方面，目前还出现了一种放松对外宾、华侨等从政治思想上做宣传工作的现象。只注意叫他们参观名胜古迹、到商店买东西，而不顺乎自然地进行宣传工作。

今年以来，全国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四化上来。对外宾、华侨等也应着重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概貌、态势、具体成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宣传中，各地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力戒虚夸。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的许多县，是华侨、华裔、港澳同胞的家乡，他们回来不象外宾那样由我们安排活动，而是自行探亲、访友，深入群众，接触面既广且深。他们能看到我们的成绩，也能看到我们的缺点、错误。他们对我们的各项政策，包括侨务政策落实得怎么样，也是能够了解的。因此，对他们的宣传就更应该严格地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成绩不能吹嘘，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和困难也不能回避、粉饰，只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说明和解释，作过细的耐心的思想工作。否则，缺点暴露就会抵消成绩的宣传。我们要给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等这样一种印象，即党和政府

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了解的、正视的，是有决心、有办法领导人民去逐步解决的。要使他们了解，我们受过十年的大破坏，粉碎“四人帮”也不过三年，到今年工作重点才转移，成绩已经不小。我们要求他们再看三、五年，因为问题的解决要有个过程。我们希望他们都能为促进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努力。

(二)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侵蚀，也的确有所滋长。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有辱国格的现象，如有沿街向外国人要东西或买人家带来的东西的，有倒卖外币的；偷窃事件时而发生。一些与我国不友好的外国记者，大量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蓄意败坏我们的声誉。在侨乡，有向华侨、港澳同胞进行“募捐”从中私饱的。也有以亲戚、朋友为名向他们索要各种东西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放任不管，属于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但大量的问题需要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党委宣传部要注意抓这方面的问题，并动员工会、青年团对职工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遵守外事纪律、讲究礼貌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除经常教育外，一年还可以着重抓两次。

(第2期, 1月9日)

打破森严壁垒 密切联系群众

最近，有位民主人士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他说：

现在有些苗头不对头，民主气氛不够，特别是有的领导同志。过去领导同志经常同我们见面，一起休假、闲谈。毛主席主动地找机会深入群众。周总理也是这种作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天，我以为我去得很早，谁料毛主席到得比我还早，在会场里走来走去和人谈话。他走到我的身后，拍拍我的左肩，问我的姓名。我说了之后，主席立即说：“呵，是民建会的。”谈了几句话，他又去找别人谈话了。这是深入群众的作风。周总理也是这样。我们参事室的参事分工管什么，总理总是让我们参加有关的会。休息时，总理就和我们一起散步、谈天。这样地接近群众。现在，这种风气没有了，不那么联系群众了，中间隔层了。我

觉得领导同志同大家越来越疏远了。领导与被领导，高级与中级、低级，堡垒森严。这是不好的现象。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批评，认为这条意见提的好，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改进。

现在确实是这样：象革命战争年代、五十年代那种领导同群众鱼水相依、亲如一家的关系少了，无形的壁垒多起来了。一些负责同志不仅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隔得远远的，就是同一起共事的党内外干部也相当隔膜，非公不谈话，有闲无往来，上下级界限分明。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共产党人永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职务升迁，责任增加，对人民负责的广度、深度更高了，绝不能是同群众的距离扩大了。把领导工作做好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看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反应如何。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随时掌握他们的脉搏，爱其所爱，恶其所恶；从他们中间不断吸取养分，增长智慧和才干；和他们打成一片，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不失革命者本色，这样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什么有些领导同志同群众疏远了呢？有的是成天陷于事务圈子里，忘掉了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员的天

职。有的是滋长了官气，摆出一副架子，使人不愿意接近。有的是不求工作有发展，对对付付过日子，害怕到群众中去，害怕会遇到新矛盾、新问题。有的是被这样那样的不合理的规定、工作中的漏洞阻塞了同群众的交往，上下无法通气对话。总之，壁垒是多种多样的。

一切有志于四化的新老领导干部，都要想一想自己同群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当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那样一种千方百计要接近群众的劲头；如果有壁垒横在自己同群众之间，是不是下决心搬掉它。当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带头人，不做地主资产阶级的官老爷，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各级宣传部门，要向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经常进行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应该非常重视党外同志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组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批评和监督，并且推动全党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排除阻碍同广大群众接近的藩篱和壁垒，做到同群众心息相通，感情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四化建设中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受到人民的信赖，率领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第3期，1月12日）

业余宣传队和民间艺人的作用 都要充分发挥

据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反映：目前，活跃在农村的两支业余文艺队伍——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和民间艺人，正适应着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以饱满的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

过去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重破坏下，不少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顶过来了，没有被摧垮。如湖北省孝感县丰山公社红旗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坚持活动二十七年；河南省安阳地区滑县白道口公社后吾旺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坚持活动十五年。其它各省都有一些这样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他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自编自演，演新唱新，为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少农村文艺宣传队，为了适应社办、队办经济的发展，在公社党委领导下，

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经济条件，因地因时大胆实践，摸索出一条有利于发展生产，又坚持了业余演出活动的新途径，产生了一批新型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有的叫业余剧团）。

为了使文艺与生产结合得更好，并且相促进，有的公社党委把公社一级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安排在社办工厂，采用了“以队办厂，厂队合一，社办站管，亦工（农）亦艺”的办法。江苏省苏州地区沙洲县兆丰公社小五金工厂业余文艺宣传队，就是这样一个好典型。这个宣传队一九七四年建队以来，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五年获得纯利润五万五千六百元。除解决全队队员的报酬，添置一批生产设备和乐器、服装、道具外，还盖了五间房子，开办了一个小图书馆。并支援农业劳动三千多个工，支援穷队五千元。宣传队员利用业余时间，发扬“只能比社员多吃苦，不能比社员少干活”的艰苦奋斗精神，前年共创作节目一百五十多个，跑遍了全公社二十八个大队，共演出一百三十多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们的经验已经引起很多地方的重视。

有的公社党委把大队一级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安排在大队的茶场、林场等生产单位。虽然比社办工厂、企业规模小、利润少，但同样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湖

北省藁城县盘石桥大队党支部把宣传队安排在大队茶场，实行生产与文艺合一的办法来办宣传队。前年大队下达给他们四千元的多种经营任务，他们完成了五千四百元。不但增加了集体收入，队员的平均收入也达二百四十元。宣传队前年共创作八十九个小型多样节目，演出七十八场，受到社员群众欢迎。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农村民间艺人的演出也更加活跃了。河北省唐山地区昌黎县小田庄大队七十多岁的秧歌艺人秦焕，生病刚出院，听说队里组织秧歌队，马上赶到城关参加了演出。丰润县潘庄子大队七十多岁的老艺人刘梦，去年春节也兴致勃勃地表演了踩高跷的技艺。河北省闲散艺人有四千多人，各地、县文化部门主动把他们组织起来，经考核后发给“民间艺人演出证”，编成曲艺队或小组，规定了演出剧目，为社员演出。经济上自负盈亏，组织上自己管理自己。并定期休整，汇报演出情况，组织政治学习。湖北省文化局在全省推广了云梦县充分发挥民间艺人作用的经验。县文化局同艺人们就演出剧目、收费标准、活动范围及演出时间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和规定，把这支民间艺人的队伍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目前农村业余宣传队和民间艺人这两支业余文艺

队伍，正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携手并肩，共同前进。民间艺术是社会主义百花园中的一朵花。民间艺人有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尤其是他们擅长表演各种民间艺术和传统节目，受到群众欢迎。有些地方的民间艺人也开始尝试改编和创作新节目，这是可喜的现象。我们在发挥民间艺人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发挥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作用，并且尽可能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成为业余文艺宣传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否则不能充分满足广大社员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在演新唱新，以多种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宣传积极为四化贡献力量的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等方面，业余文艺宣传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一切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不能捡一头，丢一头，顾此失彼。

（第3期，1月12日）

关于革命历史陈列馆的两点建议

南京高级步校党史教研室吕殿云、刘岳化同志来

信，提出关于革命历史陈列的两点建议如下：

一、各地革命陈列馆要有本地特点，以便同综合性的展览馆相区别。如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在天津的革命活动陈列馆、黄埔军校陈列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都突出了当地的历史特点，效果很好。但是有的陈列馆却注意本地特点不够，显得一般化。如西柏坡革命陈列馆，展出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解放之后几十年历史的文物图片，基本上是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删节本”。没有着重反映出党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迁到西柏坡后的重要历史活动。

二、许多革命陈列馆可以利用革命旧址展出，不必另外再设陈列馆。如中共一大会址，西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等处，就是这样做的。参观的人如身临其境，印象深刻。可是有的革命旧址能展出的东西并不多，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展出的只是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期农讲所的文物。原来第六期农讲所旧址不小，利用旧址展出很好，但是现在又在旧址旁边建了一个较大的纪念馆，内容重复很多。古田会议纪念馆也有同样情况。

（第3期，1月12日）

坚持两分法 继续向前进

一九七九年过去了，历史跨进了八十年代第一春。我们宣传战线的许多部门和单位，正在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发扬成绩，检查缺点，总结经验。这是很必要的。只有认真回顾总结过去的工作，才能进一步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途径，更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宣传任务，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最近以来，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宣传工作议论不少，有表扬，有批评；有鼓励，也有责难。有些文章和报道在报刊上发表后，收到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说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关心和爱护。也说明宣传工作同干部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注视和监督。这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改进工作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由于社会上对宣传工作的议论颇多，在我们宣传队伍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两种思想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一种是听到了一些批评和责难，就对我们这一年的工作产生怀疑。究竟搞得对不对，心中没有底。有的还联系到这些年来的历史情况，觉得宣传工作是“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完批评”，吃力不讨好，滋长了消极畏难情绪。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应该看到，去年我们宣传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大力宣传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和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宣传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宣传了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维护安定团结，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等。所有这些，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了全党和全国的思想解放，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发展。此外，我们还宣传报道了对越南扩张主义者的自卫还击战，宣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加强和鼓舞了全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四化的决心和信心。在宣传作风和宣传方法上也有很大改进，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避免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从根本上改变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说假话、大话、空话的状况，进一步恢复和增强了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成绩都

是有目共睹的，看不到这些成绩，对宣传工作丧失信心，是不对的。

但是，另外也有一种思想，和前者恰恰相反，对于来自其他方面的一些批评和意见，不大听得进，或者感到委屈，对一年来的成绩看得较多，对缺点和不足之处看得不够。这种想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去年一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我们工作中是不是一点缺点和不足之处都没有呢？显然不是。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单位来说，就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对某些重大方针和重大理论性、政治性问题，宣传得不够有力；有些宣传缺乏分析，存在考虑不周和片面性；有些宣传区别对象、注意内外有别不够；有些宣传社会效果不够好。显然，看不到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认为我们宣传工作一切皆好，也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在总结工作中，我们应该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坚持两

分法，两点论。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和不足之处；既要看到主流方面，也要看到非主流方面；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对过去的工作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计，才能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

林彪、“四人帮”鼓吹一条谬论，叫做“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路线对了，一切皆对”。这种形而上学猖獗一时，至今还毒害着我们一些同志。从总体来说，路线错了，全局工作失败了，错误的部分超过了正确的部分，这时，错误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支配和影响全局的东西。但是，路线错了，是不是一切皆错呢？不是。在某些局部的工作上，还是有正确的部分。特别是作为广大革命者个人来说，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积极性还是可贵的。所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纠正错误路线的时候，历来注意肯定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成绩，不采取那种“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实践证明，只有采取这种两分法，才能使我们的同志，在错误和失败的条件下，看到成绩，看到光明，从而鼓起我们的勇气，纠正错误，继续战斗，不致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信心。同样，路线对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是一切皆对呢？也不是。路线对了，不等于每个具

体的政策、措施，乃至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是正确的，更不等于我们每个工作部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过程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和毛病。所以，当路线正确，特别是在正确路线下打了胜仗，处于大好形势之下的时候，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提醒我们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着重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从严要求自己。可见，不论在正确路线或错误路线下，都要坚持用两分法来对待和分析我们的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对过去的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前看，为了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不断地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宣传工作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在全党全国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党和人民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两分法，从严找缺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蒙蔽了自己，才会防止思想僵化，在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认识，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经常保持活力和生气，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好地前

进。

坚持用两分法总结工作，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在党内形成一种很不好的观念和习惯。一提成绩，什么都好，捧到九天之上；一提有什么缺点，一无是处，打下十八层地狱。在这种风气下，受批评的部门和同志，感到有压力，抬不起头来，别人也另眼相看。把一个本来是象天天洗脸那样极其平常的事情，搞得不象样子。这种风气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用两分法对待自己工作的优良作风，不能很好地恢复和发扬起来。我们希望各级宣传部门在总结一九七九年的工作中，都能在这方面带个头，坚持用两分法对待自己的工作，虚心倾听不同意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解剖自己。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顾大局，识大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在发展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4期，1月19日）

不要对外宾弄虚作假

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对外宣传和接待外宾工作中弄虚作假，影响很坏。

这种错误的作风一点好处也没有。它在国内群众和外宾中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损害我国的信誉。其实，稍有社会经验的外宾，很容易看出弄虚作假来。有的当面不说，回国后传为笑谈，甚至写成文章讥嘲我们，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党历来反对这种不老实的作风。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外事工作中，曾经多次在口头上和书面中，严肃地批评弄虚作假，矫揉造作、胡乱吹嘘等行为。可是，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那种极端虚伪的资产阶级作风带到我们队伍中，搞假象、说假话成风。其流毒至今还没有完全肃清。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破坏，尚在克服过程中。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对外宣传和接待外宾一定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宣传成绩和进步的同时，不应该隐讳落后面和缺点。

隐讳也隐讳不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介绍我们的情况，才真正有说服力，取得外国朋友的信任，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要告诉我们有关的同志，不要好心办坏事，弄巧成拙。至于有意作假，那更是错误的。

自然，在接待外宾参观访问前，有些准备工作是要做的，例如注意安全保卫，收集一点本单位的材料，对群众进行如何正确对待外国人和遵守外事纪律的教育，等等。我们反对弄虚作假，但应该做的准备工作也不做，那也是不对的。

（第4期，1月19日）

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越来越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严重的摧残，至今农村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农民群众的需要，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生活仍然相当贫乏。农民是很不满意的。加强农村文化工作，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积极地、有步骤地满足农民群众

的娱乐活动的要求，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关键，是各级党委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首先，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生产和文化的关系。搞好农业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先决条件；而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积极开展丰富多采的群众文化活动，从各个方面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又必然会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阵地，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那种所谓“锣鼓响不响，庄稼照样长”的观点是片面的。我们要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解放思想，切实把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春节即将到来，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对农村的娱乐活动要及早作出安排，防止封建迷信、聚众赌博、大吃大喝等不良活动泛滥。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要不断增加面向农村的设施和服务内容，并对社队文化事业给以支持和帮助，但主要还是要依靠社队集体经济力量，依靠农民的业余文化组织来开展。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重犯“小靳庄经验”的错误。这是没有弄清所谓

“小靳庄经验”和正常的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界限。“四人帮”炮制所谓“小靳庄经验”，是为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他们强迫农民放下生产去唱样板戏，当然要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我们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只要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就不仅不会妨碍生产，而且会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上，各地都有一批办得较好的农村文化室(俱乐部)，多年来坚持开展广播、电视、图书阅览、文艺演出、体育运动、办故事会、科普讲座等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去年以来，一些地方把流散在农村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半农半艺的文艺团体，农闲从艺，农忙务农，既活跃和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又解决了这些人员的生活出路，减轻了社队负担，同时也加强了必要的管理。这些经验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和推广。

活跃农村基层文化生活，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是要根据需求和可能。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文化娱乐活动，他们有开展活动的积极性，又有开展活动的条件，我们就应当积极地支持，热情地帮助，满足他们的需要。群众在开展活动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善于引导又敢于管理，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对于不健康的東西，简单

地取缔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地为农民办几件事，积极地引导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努力提倡那些使人积极上进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的东西，同时也要允许那些教育意义虽然比较小一些，但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存在。我们只是劝阻、禁止那些腐蚀人民思想的东西。总之，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但是，又要看到，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底子还比较薄，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各地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群众的要求和民族习惯也不一样，我们在具体做法上又应当是稳妥的。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规模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建立什么样的业余文化组织，开展哪些方面的活动，搞多大的规模，都要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爱好和可能而定。总之，要采取多种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满足群众中的不同需要，不要搞一刀切。在民族地区，尤其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习惯和民族形式。

把小城镇逐步建设成为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别，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各地党委在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时，要同时对建设各项文化机构和设施

（如文化站、电影队、影剧院、图书室、展览室、体育场、说书场、青少年之家等）作出规划。这些文化单位主要应该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去发展。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哄而上，超过了物力、财力、人力可能负担的程度，更不能搞平调。在推广一些地方的经验时，我们一定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

八亿农民的文化生活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要工作。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共青团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把农村文化生活活跃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第5期，1月22日）

把民间艺人组织起来

编者按：安徽宣城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把流散在农村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为活跃农民文化生活服务，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好。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参考。

据新华社反映：安徽省宣城县文化部门认真落实民间艺人政策，将长期流散在社会上的戏剧、曲艺和杂技魔术等方面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半职业性质的文艺团体，农忙务农，农闲从艺，活跃和丰富了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县一些专业文艺团体被精简，许多以从艺为生的艺人被迫改行务农。多年来，有些艺人不适应农村重体力劳动，生活完全依赖社、队和亲友接济。有的迫于生计，不得不三五成群，在逢年过节时串乡卖艺，挣钱糊口。宣城县文化部门通过调查，认为民间艺人是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尽快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从艺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减轻社、队负担，同时又便于进行必要的管理。从一九七九年六月份开始，宣城县文化部门花了四十五天的时间，将流散在全县的一百五十名民间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三个皖南花鼓戏剧团，一个越剧团，五个皮影戏“担子”，六个杂技魔术演出小组，十八个说书场（其中四个固定的，十四个流动的），组成了一支新的文艺队伍，奔赴农村，为社员群众演出。

宣城县文化部门将民间艺人组织起来的做法有五

条：

一、为了准确掌握全县民间流散艺人的情况，县文化部门统一制定民间艺人表格，通过各地文化馆、站，逐个摸底，填表登记，然后由民间艺人所在生产队、大队、公社签署证明意见，呈报上级审核批准。

二、凡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从艺为生的艺人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从专业文艺团体精简下放的艺人，都可以参加艺术考核。经过考核，逐个评议，合格者由县文化局发给“民间艺人证。”

三、根据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建立不同的文艺团体。曲艺允许个体从艺；皮影、戏剧、杂技魔术艺人可以组织起来，成立剧团、剧组。性质属于公社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经济上自负盈亏；政治上由所在公社党委领导，业务上由当地文化站辅导。所有民间艺人户口原地不动，按农村工匠的办法，向生产队交款计算工分。

四、各半职业民间艺人团体组织起来后，县文化部门在与他们共同协商、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到了“四定”：一是定活动地点和时间；二是定收费标准；三是定公共积累；四是定演出内容。

五、加强对民间艺人的管理。在各半职业剧团巡回演出过程中，县文化馆确定专人定时到现场，帮助

他们提高演出质量，端正艺术表演作风。县文化部门还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召集各半职业文艺团体负责人汇报演出活动情况，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宣城县组织各种半职业民间艺人团体演出，深受社员群众欢迎。据统计，皮影戏五个“担子”，组织起来刚三个多月，就下乡演出四百多场，观众达八万多人次。三个皖南花鼓戏剧团和一个越剧团，不到半年的时间，共下乡演出三百八十多场，观众达二十五万多人次。使全县半数以上的人民群众看上了戏。许多社员反映说：过去农闲时，一些人没有戏和电影看，就想去赌博、搞迷信。现在半个月一场电影，一个月一场戏，再把锣鼓敲起来，龙灯、狮子玩起来，去赌博、搞迷信的人就少了。

宣城县各种半职业民间艺人团体下乡演出多，收入也多。到目前止，五个皮影戏“担子”，三个皖南花鼓戏剧团和一个越剧团，演出共收入三万七千多元，民间艺人们除生活费用和交生产队计算工分的钱款外，还各为自己的文艺团体添制了三千多元以上的服装和道具。

（第5期，1月22日）

关于禁止印售外国和港澳台 电影明星照片的通知

(不另行文)

据反映，近来在一些大中城市里，发现有的单位和个人印制、出售外国和港澳台电影明星私人生活照片。其中有的是从在台湾注册登记的香港《南国电影》上翻印的。不少照片形象丑恶，不堪入目。有的还附印有淫秽词句。绝不能容忍这些毒害青少年的东西自由泛滥。为此，特通知如下：

一、任何单位或部门，都不得印制、出售这一类的照片或画片；也不得为其他单位、部门或个人印制、出售这类照片、画片提供条件和方便。

二、发现任何单位和照相馆印售这些照片的，有关地区的宣传出版部门要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干涉、制止。

三、私人印售的，有关部门应该遵照法令予以取

缔。对情节严重者要进行必要的处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6期, 2月1日)

科学实验报道不可轻率

今年一月十一日,《文汇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题为《中国宇航训练员生活片断》的照片专栏,并发表了《我国宇航员展翅欲飞》的报道。同日,上海《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访我国宇航训练员》的通讯(以上报道均转自《科学生活》杂志,照片转自《向宇宙进军》科教片)。

上述报道迅速引起外电的普遍注意,香港报纸也都作了报道。外国记者纷纷要求了解中国宇航载人飞行的准备情况,参观中国宇航训练中心。国内报刊也要求介绍并作进一步报道。据向有关方面了解,上述报道是夸大了。我国进行的仅是宇航医学的研究,有时试验要有人参加,因此有锻炼员的活动。上海科教片厂拍摄《向宇宙进军》第三辑科教片,编入了锻炼员

的活动，并非训练宇航员。《大众电影》八〇年第一期登载《向宇宙进军》影片消息，其中提到：“看到我国发射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壮观情景和我国第一批宇航员训练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各新闻单位今后不要再发表此类报道。

科学实验报道要求有高度的科学性、准确性。这方面的重要报道事前应经有关方面审查。

（第6期，2月1日）

清理过时标语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搞“红海洋”，打标语仗，弄得到处皆是标语口号。这几年有的地方进行了一些清理，有的至今未动。其中很多早已陈旧过时，或者本来内容就有错误。群众迭有反应。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应该督促有关单位加以清理刷盖。今后不要再提倡写大标语。我们的宣传工作要作扎扎实实的细致工作，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

（第6期，2月1日）

不能让这种国民党的恶习复活

群众反映：有的地方的县、社干部借子女结婚聚敛钱财，影响极坏。

例如山西有这样一个县，在有些县委常委、部长和局长的带动下，全县城乡刮起一股利用办婚事大请客、大收礼、大讲排场的歪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十九个为儿女办婚事的领导干部，有十八人就大请其客，人数都在四百人以上。其中三名县委常委各收礼不下一千五百元。一个公社副主任更是请客一千余人，收被面三十条，礼金六、七千元。人们说，这已经成为某些人“急发财”的手段。办一宗喜事，请上三、四百人，每人摊派礼金五元，除去花销，可以净赚七、八百块钱。

在解放前，有钱有势的借办红白喜事敲诈群众，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是整个剥削制度不可避免的附属产物。同我们共产党人是冰炭不能相容的。然而在今天，正如有的老人气愤地说的那样：“解放前国民党、阎匪军借办喜事讹诈群众，可如今这些共产党的

干部也学会了这套本领！”国民党的十分丑恶腐败的作风，侵入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了，而且在一些地方还颇有蔓延之势，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

林彪、“四人帮”煽动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利欲，深深毒害了我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脆弱灵魂，至今还在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有的人口头上讲“革命”，讲“为人民服务”，讲“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心里想的都是个人的得失荣辱、亲属友好的上下进退。他们利用职权，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竟然发展到连子女结婚也变成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了。

我们党历来反对挥霍浪费、请客送礼。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不但不作群众的表率，反而带头破坏这些规定，大张筵席，竞尚奢华，妨碍生产，影响生活，把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都搞坏了。“人家自愿送礼的啊！”不对。除了极少数别有所图的抬轿子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是反对这种作风的。有的人为了比排场，得钱财，更是敦请别人送礼。自己开名单，公社指名叫，大队用电话传呼，远道的派卡车接送。奉命送礼，受命赴席，基层干部和群众有苦难言。

必须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决不能听之任之。有关地区的党委应该把这当做整顿党风，调整党和群众的

关系的大事来抓，查明几件突出的事例进行必要的处理，在党内外通报，并且号召和支持群众进行抵制。

（第7期，2月5日）

要把少数民族 文学史编写工作抓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去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出席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十五个省、区，以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的同志。

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工作，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共编写出十几部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初稿。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摧残，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新生。这次座谈会，是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它实际上是恢复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的规划会议。会上交流了自一九六一年三月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以来，各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修订和落实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一、会议代表列举大量事实，愤怒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破坏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毁灭少数民族文化的罪行。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四害”横行时期，少数民族的歌手、艺人、作家和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同志横遭打击、迫害，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史都受到了粗暴的践踏和否定，多年积累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绝大部分被销毁，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不仅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只有继续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极左路线的流毒，包括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在内的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才可能尽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要落实规划，迅速恢复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必须解放思想。各地代表

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拨乱反正，突破“四人帮”一伙所设置的重重“禁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遵循毛主席重视民间文学的文艺思想，发扬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使我们的工作顺利前进。各地代表呼吁必须尽快对人、对作品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民族政策、文艺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否则，思想解放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三、近两年来，各地的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组织，正在陆续恢复和重建，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步子显得缓慢，有的地方虽已宣布恢复，但人力配备过少，有的地方至今还没有机构。这些都是很不适应各民族民间文学急待开展的要求的。为此，各地代表强烈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重视这项工作，切实抓好组织建设，尽快把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学机构或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机构恢复和健全起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原有的专业人员归队，并大力培养人材，重新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队伍，为开展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组织上提供可靠的保证。

四、在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一场浩劫之后，抢救各民族民间文学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赶快进行抢救，进行全面搜集，我国各民族世世代代产生和流传

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就会丧失，许多珍贵的资料不能保留下来。各地代表呼吁各级领导发动群众，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尽可能使用现代化的工具，有步骤地进行搜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与此有关的民俗、历史、民族、宗教等有关资料的工作。对于那些重要的作品，以及年纪很大的民间歌手、艺人记得的作品，要尽快组织人力进行抢救，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工作铺开。在此基础上，由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统筹安排，通力协作，汇集并编印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原始资料、少数民族古代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刻本、手抄本、某些寺庙经典等资料，以及其它有关资料的档案馆。

五、会议重新审查和修改了一九六一年制订的三套丛书的计划，即《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草案）、《中国各民族文学作品整理、翻译、编辑出版计划》（草案）、《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出版计划》（草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初步落实了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分工。

六、为了满足目前的社会需要，向广大读者介绍我国丰富多采的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决定采取由各有关地区、有关单位分工合作的办法，组织编写出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

七、会议希望各省、自治区依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写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班子，制定编写本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和各项工作的具体规划。编写工作中如发现问题，可以及时与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室联系。

（第7期，2月5日）

金山县文化馆办活了

编者按：我们宣传文化事业各单位也有个广开为人民服务门路的问题。金山县文化馆抓住这个环节，全盘都活了。一定要放下架子，抛掉框框。凡是真正对广大群众有益的，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就积极主动去办，并且力求越办越好，这难道不是群众文化工作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吗？

据《文汇报》反映：上海市金山县文化馆，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全县的文化中心，有书报阅览、诗画展出、棋类比赛，夜间上演文艺节目，还有书场和电

视。“文化大革命”后，文化馆是“门虽设而常关”，活动停顿了，群众反映：“这个文化馆，住户不象住户，机关不象机关，和我们不搭界！”

这个与群众“不搭界”的文化馆，国家每年仍要负担六万元以上的经费，用在支付二十多个脱产人员的工资、房租等，特别是花不少钱搞许多只讲形式、不求实效的活动。如为了应付政治运动的宣传，搞什么“文艺培训班”；为排一出戏，花了钱补贴工分，把社员抽调上来，群众啥都没有看到；有时也有“小分队”下乡，因演出质量低，群众摇头不要看。

一九七九年金山县文化馆做了一些工作，把十多年来冷冷清清的局面打开了，文化生活活跃，社员群众欢喜，文化馆干部高兴，而国家花的钱反而比往年大为减少。

他们的做法是：

一、恢复一些群众欢迎的活动：开放书报阅览，电视面向群众，开办“文化书场”。从去年五月至七月的三个月内，接待了听众一万五千人次，文化馆也因文化书场的开办而增加收入一千四百多元。

二、积极开展农民画。金山农民画的特点是色彩鲜艳，生活气息浓郁，风格形式多样，深受国际友人赞赏。金山文化馆在社员中大力发掘农民画人才，充

分调动农民画家的积极性，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创作，提高了金山县农民的美术水平。一年来，金山县已有六百七十多幅农民画被外贸部门购去远销欧美各国。金山县文化馆在开展农民画中也收入了八千六百多元。

三、组织业余演出团到各公社、大队巡回演出。业余演出团是从各公社调集少数有演出经验的非强劳动力人员组成的，保持了演出质量。每到一个大队演出一次，总是轰动一次。大队反映：“过去我们大队自己搭班子，搞会演，来来往往，车费一大笔，既影响生产，又劳民伤财，群众看了戏还摇头，不如现在这样用几十元钱包一场，既省钱，又受群众欢迎。”金山县文化馆在短短几个月中通过文艺演出，增收了五千八百多元。演出过程中还发掘演唱人才，随团培训，加以培养提高。

四、深入开展讲故事活动。“文化大革命”以前，金山县讲故事活动就很有成绩。文革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讲故事表面上轰轰烈烈，但不讲究实效。去年，金山县文化馆在挖掘、抢救和整理民间艺术龙灯、狮子舞、莲湘等节目的同时，还搜集了毛主席的侄子毛福轩解放前参加金山县地下党活动的英雄事迹，编创了十四万字的中篇故事，到茶馆、书场

去讲，群众很欢迎。前后共讲了一百零四场，为文化馆增加了收入。

金山县文化馆的这些措施，既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又为国家节省了开支，也有利于城乡集镇形成文化中心。为了鼓励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们从净增收部分提取百分之二十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又从中抽出百分之十五用于奖励个人，改善了职工的生活条件。一九八〇年预计可以收入三万元，占全年文化馆经费的百分之五十。

（第7期，2月5日）

认真学习和宣传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报告

邓小平同志一月十六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后，十七日上午，胡耀邦同志主持了有中央宣传、理论、新闻、文艺、教育、出版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进行学习讨论，并研究如何宣传贯彻执行。

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初步学习讨论会上，中央宣

传系统各单位的负责同志热烈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报告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了党在八十年代面临的许多重大迫切问题，从原则上作出了深刻正确的解答，关系十分重大。有的说：这个报告是在八十年代开始，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同志们都强调指出：小平同志还着重对宣传、理论、文艺、新闻界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要求，语重心长，严肃恳切。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坚决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使各方面的宣传工作紧紧跟上党的步伐，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安定团结进行四化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再次充分肯定了三年来宣传工作的成绩，这是代表党对我们很大的信任和鼓励。今后宣传方面的言论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有助于大局的稳定，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认识到宣传工作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小平同志在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服从中央。我们宣传、理论、新闻界应该高度重视，坚决照办。凡是涉及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问题，要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在中央没有作出改变以前，我们要继续宣传贯彻执行。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要把内部的探讨和公开的宣传区别开来。特别是党中央正在讨论，还没有正式作出决定，

或者已经作出决定但尚未公布的重大问题，未经中央授权，任何宣传单位不得擅自以任何公开形式捅到社会上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波动和混乱。如果对中央的某些方针政策有意见，或者从群众中收到不同的反映，应该向中央提出或报告。未经中央同意，不能在报刊中提出异议。

小平同志的报告，对文艺界也打了招呼。讲到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宣传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文艺又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界要讨论清楚。不要只是抽象争论，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对目前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上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我们不打棍子，但要经常提醒，敲敲警钟。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但是不能没有要求，没有引导，没有批评，搞“三无世界”。文艺战线比别的宣传战线更敏感，在前进中如果不注意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有可能遭到挫折。要防止这一点。

要认真讨论、分析清楚当前影响安定团结的主要因素，研究解决的步骤和方法。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这很值得我们警惕。不少的

事实说明：有些人至今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满怀怨恨，甚至咬牙切齿地仇视；有些人至今对党中央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坚决反抗，就是顶住不干；有些人仍在顽固地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些迹象，造点舆论，推动实际工作部门采取妥善的步骤和有效措施，逐个地区、逐个部门地查清解决。要把忠实于党的路线、奋发有为的同志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对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清查，这三年在闭门思过的人，要在分清大是大非的前提下加以正确处理，主要看他们这三年的表现。

我们的党受到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摧残和破坏，需要重新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造比重建更难。整顿党风党纪一定要抓紧，并且坚决抓到底。不搞运动，不乱斗，但必要的斗争也是难免的。今年一定要狠抓党的建设。考虑好步骤和方法，搞好党风党纪。只有这样，四化才有希望。宣传部门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可以先走一步。抓紧对新老党员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调整、整顿好支部以上的各级党组织的核心。

小平同志的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当前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采取的措施不得力，下不

了手，显得手软。宣传工作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要注意纠正。我们对宣传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要主动地去发现和解决，上级机关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该批评的还要批评，要讲原则，讲党性。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变时期，除旧布新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到处都有新旧交替的现象，各方面的矛盾不少。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政治上经济上不再折腾，而极少数人却总想把形势搞乱。有的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有的继续搞派性，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无理取闹，危害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有些地方各种犯罪分子活动猖獗，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我们有些干部民主作风差，不能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致使矛盾激化，也对安定团结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要看到，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左”和右的干扰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当前特别要注意的是，必须坚决肃清由于林彪、“四人帮”流毒而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在党内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宣传工作要注意这个形势的特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我们的产品有利于加速除旧布新的过程。

我们各个宣传单位，要研究如何尽快地把小平同志报告的精神贯彻到宣传工作中去，推动全党和全国人民落实报告的要求。报刊要发表一些言论。鉴于去年几次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之后，宣传方面没有很好组织力量，有些问题宣传不力，这次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第9期，2月12日）

辽宁开展 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宣传

去冬以来，辽宁农村根据省委的指示，广泛掀起如何尽快富起来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今年一月辽宁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把这一宣传深入发展下去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在会上讲话，提出了重要意见。

任仲夷同志说：省委两个月前提出“全省齐动员，为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提出要使我省农村尽快富起来，允许一部分社队和农民先富起来，这在理论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在实际上是符合当前

农村情况的，是符合广大农民愿望、深得广大农民拥护的。

抓了几个月，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富过头了？我看没有过头，才算刚刚开始。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提出：“使我国农村逐步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富庶的农村。”用这个要求来衡量，我们还差得远呢。

在富起来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一些不良倾向。对这些，我们也要估计到，也要看到，并要及时地恰当地加以引导，不能掉以轻心。看到这些情况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因噎废食。

从宣传工作来讲，我们在继续宣传“敢富”、“会富”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宣传以下几点：

一是要宣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的是要坚持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搞家庭副业要注意三条，一不搞剥削，二不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资源，三不影响参加集体劳动。这些原则决不能动摇。个人通过正当手段富起来是允许的。但我们要着重宣传的还是集体如何富起来。富可以有先有后，但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是要宣传勤劳致富。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富，不能靠剥削，只能靠勤劳和节俭。我们在宣传每一个

富起来的典型的时候，要注意宣传他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

三是要宣传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宣传富起来的典型的时候，要注意宣传他们是怎样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怎样对生产和生活、积累和分配进行合理安排的。

这些思想，要在“敢富”、“会富”和“怎样富”的宣传中，很自然地体现出来，不是要另外搞一个宣传运动。不要使群众以为政策发生了变化。政策没有变，这里讲的是宣传上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10期，2月14日）

关于平反刘少奇同志冤案的 公开宣传问题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问题，十一届五中全会将作出正式决议，予以平反，并在公报中宣布。这是一件对国内外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好公开宣传工作。

一、在五中全会公报没有公布之前，各报刊不要抢先发表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消息、文章、图片以及其他材料。

二、将根据中央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决议和有关的历史复查材料(不公开发表)，组织一批文章统一发表，说明所谓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叛变”，在武汉、庐山进行“内奸活动”，在沈阳“被捕叛变”等，都是没有根据的诬陷，彻底推倒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大罪状。

三、要对过去错误批判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修养”等等，组织文章澄清是非，在公报发表后陆续发表。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宣传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四、纪念少奇同志的文章，可在追悼会前后发表，重质不重量。这类文章的口径应该按照平反决议和悼词，着重宣传少奇同志的革命功绩，不要过多去描写受迫害的情节。注意不要把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对立起来。对于发生这一大冤案的原因，可按照决议的口径，不必过细剖析，也不要简单地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

五、要妥善安排，全面做好五中全会的宣传，对

有关少奇同志平反的宣传，同有关党章修改、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宣传，要作出统筹安排。

六、关于少奇同志平反和纪念的重要文章，中央宣传单位的，要经中央宣传部审阅；省、市、自治区宣传单位的，要送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审阅。

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注意及时收集有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的反应，及时整理上报。

（第11期，2月25日）

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今年三月五日，是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为了筹备开展纪念活动，全国政协邀请一部分知名人士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蔡元培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他倡导科学与民主，开“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学风，培养和教育了一代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蔡元培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的活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堪称为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毛主席、周总理都曾对他做过很高的评价。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隆重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对于发扬革命传统，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都会有一定作用。经商定并报中央批准，届时将在首都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印发《蔡元培先生年谱简编》，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时继续收集整理蔡的著作、书信、手札等文献，陆续出版。

（第11期，2月25日）

农村电影管理体制的 一个重要改革

编者按：浙江省文化局在桐庐县试点，改革农村电影管理体制，取得成功。他们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据新华社反映：浙江省文化局和桐庐县委试点，改革农村电影管理体制，由社办电影放映队改为县办集体性质的文化企业，取得显著效果。

现行的农村电影队社办社管的体制，弊病较多。据浙江省电影公司调查，主要问题有：

一、放映力量布局不合理，各公社之间很不平衡。桐庐县是个半山区，各公社大小规模相差很大，但都各办一个电影队。大公社群众看电影，最低的平均每人只要八厘钱，山区小公社则要三分三厘，个别小的放映点甚至平均每人需要负担一块钱。

二、不利于电影事业发展。大的放映点几千人看八点七五毫米电影，效果很差，大家迫切要求看十六毫米的，有的还要求看三十五毫米的，但由于多数公社底子薄，没有积累，买不起十六毫米或三十五毫米的放映机。

三、放映队伍不稳定，放映人员事业心不强。放映人员调动频繁，变动很多，不少县电影管理站年年抓培训，年年从头做起，工作非常被动。同时，各公社电影放映员之间的报酬标准不统一，高的每月基本工资三十七元，有的还有额外补贴；低的每月仅二十元，影响放映人员积极性。

四、多数公社对电影队管理不善，违反制度现象比较普遍。私调影片，私放“专场”电影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省电影公司和桐庐县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开始，着手进行农村电影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首先，

全县三十六个社办电影队改为县办集体性质的文化企业，由县电影管理站直接领导管理。同时，在各公社党委支持下，整顿了放映队伍，并建立和健全了考核、工资、财务等规章制度。

在改革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他们还注意妥善处理一些政策问题。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与各公社签订协议书。原公社所有的电影放映设备，按质论价折款给公社，并在今后电影队的放映利润中再给公社百分之二十的分成，在经济上不使公社吃亏。放映人员由本公社推荐，经县电影站考核后择优选用。放映员的党团组织关系在公社，由公社负责政治思想领导，布置宣传任务，审查放映点布局、场次规划、放映计划以及解决放映人员的口粮、办公和住宿等问题。县电影管理站主要负责放映网的布局，发行放映的管理，机器改造、更新，放映人员的技术考核、培训，财务管理以及放映员的工资、劳保福利、奖惩等。

一年多来，农村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显示出不少优越性，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于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后，保证了放映人员相对稳定，又贯彻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整个放映队伍的精神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关心集体企业，钻研业务技术和积极送电影下乡，努力提高放映质量的新风气。

二、有利于农村电影的普及规划放映。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去年该县农村共规划放映点五百四十五个。偏僻山区二十至五十人的自然小村都设了放映点，最小的放映点只有七个人，一年规划放映四次。去年四月体制改革结束后到年底的八个月来，全县农村电影队共放映电影一万五千六百零八场，平均每个电影队放映四百三十三点五场，每个放映点二十八点六场，观众人次达一千三百八十三万六千七百余人次。按全县农村人口计算，全年平均每人看电影四十六次，每星期能看一次电影。各电影队还加强了映前的宣传教育工作，全县三十六个电影队去年一至十月共制作配合中心的幻灯片一千一百五十多套，深受群众的欢迎。

三、企业经营管理取得显著成果。体制改革后集体性质的电影企业，实行统一经营，分队核算的办法，县电影站每月公布一次经营情况。由于把企业的利益和放映员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所以，人人力争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去年三月到十二月，全县三十六个放映队收入达十六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元，平均每队收入四千六百四十四元，在不提高收费标准的前提

下，超过了一九七八年全年的放映收入，利润达六万四千多元，接近于原来全县社办电影队历年来利润积累的总数六万九千三百多元。

四、有利于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日前，在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来发展农村电影事业。因此，桐庐县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村电影事业的做法是很可取的。该县体制改革后的集体性质的农村电影队，由于经营情况良好，又是集中管理、统一使用积累的资金，就可以有计划、有步骤、较快地发展农村电影事业。去年八月份，已把六个电影队的八点七五毫米放映机改换成十六毫米，资金全部由去年提取的折旧资金中解决。

全县去年积存的六万余元利润，除了百分之二十分成给公社，并提取一部分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资金外，尚有近四万元可用于发展农村电影事业。他们计划分期分批逐步建设一批农村简易电影放映场地，以改善农民群众看电影的条件，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水平。

（第11期，2月25日）

要重视处理好语录、像章 和过时标语口号

不少群众来信反映，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一些地方刷在墙上、建筑物上的标语口号，立在街头、广场的标语牌，仍然存在不少混乱现象，需要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发行和制作的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像章，也出现乱扔乱放、乱作他用的情况，很不严肃，影响不好。有的来信建议国家把群众中除留作纪念的多余像章（铝、铜等金属质的）收集起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反映和意见是好的，应该引起重视。

有关标语口号和领袖画像、著作、像章等问题，中宣部曾发过〔1978〕3号文件《通知》（经中央批准《关于处理留存“忠”字品的请示》）、〔1979〕5号文件《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1979〕14号文件《关于处理公众场所语录牌和标语口号问题》，提出过原则规定和处理意见。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参照上述文件精神，认真作好检查和清理工作。至于群众中的毛

主席像章和语录，教育群众不要乱扔乱放乱作他用，如有愿交的可由商业部门收起来，统一加以妥善处理。处理这类事情，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关注和议论。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谣传。

（第 11 期，2 月 25 日）

苏联以“八一”电台名义 造谣惑众攻击我国

近年来，出现一个自称“八一”电台的反动电台，假冒我电台的口气，并用中国人民的名义，造谣惑众，对我国内外政策，人事变动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攻击诽谤。去年对越还击战期间，这个敌台还无耻地用我军的名义发布战况消息，歪曲真相，为越南侵略军张目。河内“越南之声”电台经常援引所谓的“八一”电台的谣言，淆乱视听。这个冒名“八一”电台的敌台系苏联所设，一般在晚上播音，时间、次数不定。信号不强，但质量较好的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得到。北京地区早已进行干扰。外地由于设备不足未能

干扰，广大农村更无从干扰。这种状况短期间难以改变。希望各级党委宣传部，尤其是县委宣传部教育群众提高警惕，不要收听，偶然听到了，不要轻信上当。

（第11期，2月25日）

群众性刊物不宜登载裸体作品

编者按：近来一些群众性刊物相继登载裸体作品，有的是外国名作，有的是我国美术工作者的创作。《作品》、《花城》还先后印出张志新同志的裸雕图片。对此，反应不少。裸体美术作品在西方源远流长，十分普遍。这是同民族发展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广大群众很少接触这种艺术形式，容易产生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借鉴外国优秀艺术，我们的美术家需要研讨裸体作品。至于自己的创作，还是要力求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在群众刊物上不宜刊登包括外国名作在内的裸体作品，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

最近，浙江宁波有两位同志来信，对群众性刊物发表裸体作品提出不同意见。来信摘登如下：

“今年一月《工农兵画报》的封底上刊登了〔法〕安格尔一幅题为《泉》的裸体少女画，干部群众见了都为此议论纷纷，在我们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震惊。震惊之所在：一是这样一幅一丝不挂的裸体妇女画竟会刊登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而且青少年读者占多数的群众性画报上；二是刊发的时间又正好是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城市治安会议》精神，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之时。”来信说，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园地呈现了一片“百花齐放，满园春色”的生动活泼的景象，然而，“百花齐放”是不是什么都放？还需要不需要根据我国的民情、国情？我们认为，裸体画照即使作为人体美术探索的课题，也应在美术界内部进行研究，不应广为刊发，通向社会。在人民艺术中不应有碍于四化建设、有害于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东西滋生。

（第11期，2月25日）

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干部 提出宣传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据新华社反映：上海市宣传系统党员干部在学习邓小平同志一月十六日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联系宣传工作的实际，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宣传工作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防止绝对化，力戒片面性。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同志谈到，去年报纸宣传做了不少促进安定团结的工作，成绩很大，但宣传中还存在不少片面性。在宣传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政治与经济、歌颂与暴露、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自力更生等等问题上，一个时期强调一个侧面是应该的，但不能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有的问题在宣传中讲得绝对化了，就会助长一些思想混乱，不利于安定团结。

二、要顾全大局，重视社会效果。许多同志提

到，目前确有些剧团、出版社为了片面追求利润，多发奖金，把有关过去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不健康的剧目也搬上舞台。有的出版单位争着出能卖钱的、趣味低级的乃至不好的书。这种为了利润、奖金而不注意社会效果的倾向，要努力克服。

三、要坚持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能搞客观主义。有的同志认为，前一个时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中，针对有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不够。有的同志说，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观点要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更不能助长群众中的错误思想。不少同志认为，我们社会上是一些阴暗面，但在文章和作品中不能搞客观主义、自然主义，不能忘记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根本任务。

四、对于一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要图一时之快，“火上加油”，促使矛盾激化。有的同志说，去年有的报纸为教师的待遇太低在报上呼吁，不少教师看了报道以为就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了。事实上目前不可能全都办到，那样宣传反而使有些教师增加埋怨情绪。

五、要区别允许和提倡的界限，有些允许存在的东西，并不都要去提倡。有些同志说，我们打破了“四人帮”对文化的禁锢主义，贯彻了双百方针，文化

艺术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是好现象；但另一方面，有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也多起来了。有的同志对有的刊物上刊载张志新烈士裸体雕塑作品，很有意见。

六、要遵守宣传纪律。许多同志认为：我们在宣传中既要解放思想，敢于提出新问题，又一定要遵守纪律，尤其要积极、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唱反调。重大问题应及时请示汇报。

（第12期，3月1日）

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编者按：这是胡乔木同志写给新华社穆青、李普同志的一封信，提出新闻要客观地叙述事实，不要写成骂人的大字报。这个意见很重要。写其他文章，无论是对内对外，包括论战、批判的东西，同样都不要大字报化，而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穆青、李普同志：

建议新华社在国际新闻稿中取消“跳出来”、“抛出一个……”等字样。这些字样在新闻中毫无价值，只是贬低了新华社新闻的价值。新闻总是要客观地叙述事实，而不能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骂人的大字报。类似的字眼还有“疯狂”，近虽已少用，仍未绝迹。关于这个词似乎格林已批评得很中肯了。

以上请考虑。

胡乔木

一月十七日

（第12期，3月1日）

对外商录制我文艺节目 要加强管理

据有关部门反映，去年以来，外商和港澳商人要求录制我文艺节目和要我提供节目录音母带的事情日渐增多。他们有的是向我唱片出版部门接洽，有的是同地方文化部门联系，也有的是直接找我们的文艺团体乃至演员个人进行交易。特别是香港的一些唱片私商，利用与国内来往方便的条件，在广东、福建等地活动甚为频繁。据了解，已有多起不经过正当途径，以低廉的价格，甚至用窃取的办法，录走了我们的一些文艺节目，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加工成唱片、盒式带，到处销售，牟取高利。还发现个别地方的文化部门和广播站，图一时小利，同外商、港澳商人达成协议，为他们提供节目录音母带。

上述这些现象，有损于我对外文化宣传的质量和声誉，对国家外汇收入也造成损失，而且给国家录音

制品的出口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些节目一旦为外商录走，版权即为外商占有，我国自己录制的反成了“非法”的了。

文艺节目录音制品的出口，必须坚持统一管理，在统一管理下同时注意到地方特点及其经济利益，发挥地方积极性，统筹兼顾。这样才便于做到不出政治差错，保证艺术质量，维护国家出版权益，避免外汇损失。

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国唱片社，是国家录音制品的出版业务部门，又有责任管理全国各地录音制品的出版工作。目前正在着手拟订录音制品出版、出口管理办法。在有关办法下达之前，各地如遇到外商或港澳商人要求录制我文艺节目，应该主动同中国唱片社联系，研究妥善办法，不要使外人有空可钻。

(第12期, 3月1日)

突出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宣传

今年上半年，围绕着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传达学习 and 一系列重要决定的贯彻落实，我们要突出党的

建设问题的宣传，紧紧抓住这次全会的主题：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下半年，结合进行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仍然要继续宣传这个主题。

党的建设问题，是全国人民瞩目的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统治地位，制定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政治路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又及时地提出组织路线问题，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党的工作。全党和全国人民被压抑多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涨起来，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卓有成效的实践，重振了党的威望。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重大决定，又进一步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坚定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党的周围，一心奔四化。我们在宣传和学习全会精神时，一定要密切掌握思想动态，警惕和排除来自“左”的或者右的方面的干扰，始终注意把全党同志和各族人民的思想引导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题上来。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某些善意的然而心存疑虑的人们，一方面承认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

确的，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担心它们能否持续不断地贯彻到底。这次五中全会确定，从中央起，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这是一个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接班人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出了个林彪和“四人帮”。个人接班历来没有取得成功，还是集体接班比较好。五中全会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加强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事业胜利前进。这对巩固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地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同时也会大大增强人们对党的信心。我们要进一步宣传马列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完整学说，宣传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宣传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林彪、“四人帮”盗用我们党的旗号，胡作非为，罪恶累累，不仅败坏了党的事业，也严重损害了党的

肌体。优良的传统作风，正常的党内关系，鱼水般的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统统受到了肆意的践踏。经过三年多的工作，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党内的问题还很多，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党的战斗力有待加强。我们党在实际上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五中全会从这个实际出发，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党的立法工作，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我们要按照全会的要求，在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在全会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以较长时间组织学习“准则”和党章修改草案。要逐条学习领会，联系工作和思想，通过谈心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这种教育，使党内外广大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前进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它善于总结经验，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锐意进行革新，包括实行废除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样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各级宣传部门，要协同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精心地、全力以赴地抓好这项思想政治教育和必要的整顿工作。

五中全会正式宣布，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完满地解决了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对于党的建设也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少奇同志被诬陷，他执行的党的路线被打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学说所作的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被说成是黑谬论，这一切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现在澄清了真象，恢复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党内外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教材。我们要把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宣传教育，变成端正全党作风，加强全党团结的巨大推动力。要着重宣传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态度；宣传党仅仅相信真理、服从真理。不管多大的错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也不管它是由“永远”之类斩钉截铁的语言加以维护的，在这个党里终究是要被彻底纠正过来的。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前途确实是美好的，最后胜利确实是有保障的。要着重宣传少奇同志生前在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巨大贡献。要使全党同志认识到：平反少奇同志的冤案，推动我们党的建设，把中国共产党整顿、建设得更好，这才是我们对少奇同志最好的纪念。

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并不是我们的最后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持久地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在宣传和学习党的建设问题中，要把它同这个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一段时间内，突出某一项具体内容，是不可免的乃至必要的。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项具体宣传同安定团结搞四化结合起来。总的要求是：一心一意搞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四化，这是我们的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或者冲淡，一切问题包括党的建设中的各个问题，都要放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恰当的安排。

（第13期，3月4日）

警惕进口印刷品中的思想渗透

上海海关的同志向文汇报反映：近年来从海关进口的私人印刷品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一九七九年近四十五万件，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一点一五倍。国外有

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渠道，对我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渗透。

一、有人乘机在进口邮件中夹寄反动宣传品，对我进行攻击和破坏。如蒋帮特务从香港直接投寄的反动小册子《故乡见闻》，还有反动杂志《东西方》、《探索》、《鸣放》，反动书籍《中国大陆抗议文学》、《北京最寒冷的冬天》等。

二、宗教渗透活动加剧。国际教会势力特别是基督教组织正全力对我进行思想渗透，远东广播公司出版的《福音广播》杂志公开宣称：“不要忘记远东有责任栽培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让更多、更多的同胞听到福音！”香港圣经函授学校向国内散寄函授教材，要求收件人开展“一传十”运动，介绍亲友参加，优胜者给予奖励。从海关查扣情况看，香港是外国教会对我进行渗透的基地，现已逐步扩展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三、黄色、淫秽书刊有所增加。黄色、淫秽书刊以往很少进口，一九七九年先后查扣的有《新文摘》、《新知》、《蓝皮书》、《老爷车》、《星云》等九种书刊，讲的都是嫖妓、脱衣舞、性行为等下流不堪的内容。此外，进口印刷品中，印有裸体、半裸体女人像的月历大幅度增加。

四、封建迷信和宣扬资产阶级意识的书刊有所增加。带有封建迷信内容的相书、卦书、风水书，有《从生活看个性》、《从血型看个性》、《从手相看个性》、《160种不同命运的手相》、《星座与命运》等二十余种。还有投寄冥币的。不少是介绍电影明星私生活和港澳电影、电视的电影、电视画报逐渐增多，电影画报《银色世界》就有专门介绍“追求女人的妙计”的文章，低级庸俗。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些人对这些内容不健康的印刷品却很赞赏，有些印着裸体女人象的月历被海关查扣后，收件人竟向海关要求索回，他们以国内杂志上也有裸体像为由，指责海关，反对查扣。

（第14期，3月16日）

这些党组织的战斗力的何在？

编者按：这几则材料，特别提请同志们看一看。五中全会要求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们确实有一部分党组织软弱无力，确实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不象样。在明目张胆的封建迷信和违法犯罪活动面前，他们一筹莫展，不

知如何是好，有的自己还卷进去了。对这些问题尚且如此，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更无从谈起了。期望他们保护人民利益，发展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局面，可能吗？不改变这种状况，能得人心有威望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适当的整顿，是刻不容缓的事。希望有关的领导机关不要见怪不怪，而要认真对待，首先从这些具体问题下手，好好抓起来。

一 打着领袖旗号搞封建迷信

中国青年杂志群众工作部反映：近年来，不断有读者来信反映，在他们社队有人打着革命前辈和领袖的旗号搞封建迷信活动，危害不小，值得注意。

从来信看，这种现象先出现在湖广地区，搞什么“请仙姑”活动，胡诌杨开慧先烈是“三仙姑”。随后竟发展到把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领袖象摆在供桌前，桌上放上毛选五卷，还摆上《人民日报》。胡说什么三位领袖归天后，来各地视察“显圣”，“轮流值班”，问啥答啥，百灵百验。这种活动逐渐由南方蔓延到北方农村。由于打的是“领袖观察、指示”的幌子，欺骗性大，迷惑了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有些农村干部也划不清搞迷信与敬仰领袖的界限，对此不敢管，也

说不服。河南省济源县一位大队科研组青年社员来信说，这股歪风在我们大队刮了一个多月，公社大队干部竟无一人干涉。有的干部还参加了这一迷信活动，就连科研组中好几个有文化知识的团员也相信。谁要是进行干涉，就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这种迷信活动对稳定农村青年，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也极为不利。山西阳城中学学生裴张明来信说：他们公社的年轻人，在领袖像前多问的是自己何时盖房，媳妇是谁，何时娶，将来家庭幸福不幸福；还有不少中学生问自己是否能考上大学或中专，将来是干部、工人，还是种田的，等等。这些青年认为，毛、朱、周都是伟人，现已灵魂升天，前来“观察”、“显圣”一定很灵，都信以为真。有的得到回答是能考上，就认为有把握了，学习上就不再去下功夫；有的答考不上，就灰心丧气，认为自己仍旧是个种田的命，结果都严重影响了学习。还有些小城镇的待业青年和想外出的农村青年，也参加了这种迷信活动，更加惶惶不安。还有的乘机散布谣言，胡说什么世界大战今年就要打起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竟然说，毛主席算的卦，你们还敢不听！

读者来信要求报刊加强无神论和科学知识的宣传，要求有关方面采取措施煞住这股迷信风。

二 党员干部带头赌博

吉林梨树县胜利公社公安特派员李凤山同志，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映：目前一些地方赌博活动仍然不断出现，而且有上升的趋势。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个别党员干部参加。据最近我们公社调查，从去年入冬以来，发现参加赌博活动的有四十八人，其中有党员六人，这六人当中有大队干部一人、生产队长三人。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有的党员干部对赌博活动视而不见，不去干涉，也不向有关部门报告。他们认为这事应由公安部门管，与己无关，还是少得罪几个人吧。有的社员群众很气愤地反映说：“要禁赌，必须首先解决党员干部参加赌博的问题，要解决有的党员干部不管赌博的问题。”建议农村各级党组织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认真抓一抓，坚决煞住这股歪风，维护社会治安。

三 麻将牌流行

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反映，安徽和县胡敬华同志来信说：最近，江苏、安徽部分集镇商店公开出售麻将

牌，特别是一些小贩，在交通要道和车站人烟稠密的地方喊：“‘麻将’便宜卖，按出厂价格，副数不多，要买就快。”群众很有意见。前不久，我因公出差去和县，汽车站也摆着卖。到了县百货公司门口，看到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好消息！本公司新到麻将牌，价廉物美，欢迎选购。”农民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现在什么都好，就是卖‘麻将’让人赌博不好。”有的说：“我们那里打‘麻将’、摸‘纸牌’，根本没有人管，干部、党员也干。”还有的说：“现在不但给赌，封建迷信也让搞了，什么抓周、烧灵、修谱等等。搞了迷信请了赌，害得我们农民好苦。今年丰收，分配几个钱，你接吃酒，他接做寿，都花光了。现在比以前更厉害，你不赌也不行，拉呀拖呀，总是男的打‘麻将’，女的摸‘纸牌’，名义上尊敬你，实际上他家落头钱，这样搞下去，那有心思干‘四化’。”

我家住在农村，从去年秋季以来，送礼已经花了近二百元。我们那个大队十一个村庄，有二十二副麻将牌，白天、晚上干的、看的，要牵连百把人不能生产。据说，公社党委要采取措施制止，究竟效果怎样？能不能制止住，值得怀疑。因为，这事涉及面很大，不是一个公社、县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省的问题，我们县级机关有些单位买“麻将”还报销呢？变成合法的

赌博。

我认为应该禁止制造、出售麻将牌，更不要提倡打“麻将”。农民早就说过：“倾家的‘牌九’，败家的‘麻将’。”现在替“麻将”平了反，说它不是赌具，是娱乐品，很多人想不通。如果说“麻将”是娱乐品，“纸牌”、“骰子”、“牌九”这些赌具怎么办呢？如果都是娱乐品，那就变成赌博社会了。

希望有关同志调查，提请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否则，损失不堪设想。

（第14期，3月16日）

关于同台湾往来的宣传问题

关于我对台湾通邮、通商、通航及人员来往等问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一年来，以各种方式作了多方面的宣传，在台湾内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公开透露同台湾接触往来的具体情况，会引起不好的效果。今后关于对台湾通邮、通商、通航及人员来往等政策，还要继续积极报道；但对具体情况如贸易关系、书信、电报、电话往来以及我方船只通过台湾海峡等，都不

宜广播、登报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公开宣传。请各地宣传部门和宣传机构注意。

(第15期, 3月24日)

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编者按：《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几个突出问题》、《非出版单位和私人印售书刊的现象亟需纠正》两件，都是中宣部出版局根据有关方面的反映整理的。出版工作摆脱林彪、“四人帮”的禁锢之后，很快形成了生气勃勃的景象，正在对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广大群众在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修养和科学技术文化方面迫切需要的好书，出版得还很不够；一方面，有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书却印得不少，甚至有些不应该公开发行的书也出了。有的出版部门忽略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在实际上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到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校、团体、印刷厂和私人乘隙粗制滥造，大量印售质量不高的乃至有害的书刊画片，加剧了混乱现象。对此，社会各方面的反应日益强烈，要求采取措施纠正。本来，党和政府关于出版工作的方针、

政策，包括非出版单位不得编印书刊发售，早已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我们贯彻执行得不力。思想解放和加强领导，支持新生事物和克服消极现象，是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的。希望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有关的领导机关，认真抓一抓出版方面的问题，发动出版工作者联系实际，检查贯彻执行出版方针的情况，进一步改进工作；对于非出版部门和私人擅自编印发售书刊的现象，则要迅速制止，不能任其再蔓延了。个别严重违法者，还应依循法律程序进行必要的处理。

当前图书出版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这两年来，出版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和不好的情况。

一、相继出版或准备出版一些可以不出或缓出的旧书。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印数各达四十万册；戏剧出版社准备出《施公案全传》，印二十万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啼笑姻缘》，印三十万册，《西太后演义》，印二十万册；江西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秋海棠》。这些虽不都是坏书，但没有多大社会价值，不少的是消闲之作，对读者很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在目前纸张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完全可以不出。

二、大量印制不应印或可以少印的外国作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飘》，印六十万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基度山伯爵》，印四十七万五千套，后广东、上海、四川租型，各加印了五万套；《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印一百万册，电影出版社也印了十万册；《尼罗河惨案》，江苏除在发行三十万册的《译林》上发表外，又印了四十六万册；《人生（人性）的证明》，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十二万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四十五万册。十三个出版社今年的外国作品选题中，英国克里斯蒂一人的侦探小说就有二十一种。

三、不顾专业分工，争出毫无关系而有利可图的图书。海洋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初从国家出版局按计划分到了纸张一万二千令，出科学幻想小说《魔鬼三角与UFO》一书，印四十二万册，就用了纸七千令。全书十七篇作品中，与海洋专业有关的作品很少。这个出版社今年计划出书三十种，其中科学幻想小说占四分之一。地质出版社出了描写惊险离奇凶杀的侦探小说《孤岛奇案》，印五万册。还准备出其他同专业关系不大的书。水利出版社将出《家庭养花》，印五十万册。已出《玛丽在北京》，印四十四万册；原子能出版社将出《语

文基础知识与文章修改》；冶金出版社将出《现代德语简明语法》、《科技英语的结构》。

四、争分利润，唯利是图。上海的出版社租型给外地出版社，除要多分利润外，印数还要四成归上海发行。《金陵春梦》原已答应租给四川印三十万册，上海分利润百分之二十，后广东愿出比四川更为优厚的条件租这本书，于是上海便把四川印数减为十五万册，给广东印十五万册。上海文艺出版社与群众出版社谈判，以《金陵春梦》纸型换《希腊棺材之谜》等纸型，供型者分利润百分之二十。《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旧书样本是上海书店提供云南的，条件是书印出后七折发上海书店（发上海新华书店是七点五折）各五万册；华东地区的发行任务由上海书店包销。

产生以上问题，和出版部门某些同志存在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有的单纯追求利润，甚至说：“赚钱的买卖为什么不干！”“看家书，不租型，要靠它盖房子，添设备。”有的只讲“票房价值”片面强调满足某些读者的兴趣，忽视了出版工作任务、方针，忽视了精神产品的教育作用。

以上现象已经引起普遍的不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

第一，出版部门必须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明确指

导思想。图书出版物应有利于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安定团结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水平。不符合特别是违背这些要求的书籍，不应该出版。有的出于研究的需要，也只能少量印制，控制发行。

第二，加强领导。出版图书应有全盘考虑，出什么，不出什么，多出什么，少出什么，归谁出，何时出，都要有统一规划。对全国出版社总的要求是多出为四化服务的图书（担任特定出书任务的出版社可灵活掌握）。对外国作品、古典作品，要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各出版社需大量印刷发行的重要选题，应报国家出版局统一平衡，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这些图书的印数也要有所控制，使现有的纸张真正用到刀刃上。

第三，出书要切实做到有专业分工。专业出版社应只出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图书，不要出版其他方面的图书。

第四，对裸体画、雕的出版，要考虑民族的传统习惯，除专业美术刊物外，一般的群众性的刊物、挂历，不要刊登裸体画、雕。

第五，对于应该出版的畅销书籍，可以租型。租

型要从有利于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出发。不要一地一社垄断，要从全国一盘棋考虑。出租和承担单位要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对边远地区租型要尽量照顾。应当制订租型的统一办法。在全国范围发行数量大的图书，最好安排分区选货。

第六，各地出版部门应即检查一下自己的出版计划和正在或即将付印的书刊，该出的出，不该出的或该缓出的坚决不出或缓出。应节约有限的纸张，保证出版急需的书刊。

（第16期，4月7日）

非出版单位和私人印售书刊 的现象亟需纠正

近来有些省市反映：不少非出版单位乃至私人擅自编印和发售书刊画片，虽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情况仍然比较严重。

（一）许多学校和机关团体擅自编印、高价销售书刊。据了解，陕西二十八个单位在去年以来自行编印书刊一百五十种，其中图书八十九种、期刊六十一一种。北京市非出版单位自办刊物已达一百六十四种，其中有六十九种公开或半公开发行，有的甚至公开卖

给外国人。四川自办刊物有几十种，多是各地文化部门或文化馆编印的。有个大学竟冒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了一本《电影艺术基础》，经查问才承认错误。在各地擅自编印的书刊中，有的互相转抄，内容重复；有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有的刊物内容不够健康，甚至宣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而且大都高价牟利。北京西城区一个中学的教师编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等书，获利约八千元。湖南株州一教学辅导站编印一本《数学试题汇集》，印九十五万册，销行十余省，每册成本一角六，卖价四角，获利十六万余元。最近又发现河北大学有些教学人员大量编印《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内容包括：唐宋传奇、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三言”、初刻二刻三刻拍案惊奇、醉醒石、西湖二集、剪灯余话、剪灯新话中的一些篇章。共编十册，总印数达十余万部，每套预收十七元五角，自行到全国大专院校和有关单位征求预订。

(二) 有些单位和个人为了牟利，非法翻刻、销售旧书和年画。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均发现有印售《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劝世文》、《女儿经》、《神童诗》、《指纹学》、《指纹手册》、《生男育女》、《增广贤文》、《如何解生活之谜》、《你的家庭快

乐的几点方法》等书的情况。最近成都市公安机关查获一个专搞翻刻的集团，收缴到油印机和照相器材等工具八套，油印旧书十六种，六千余册，照片、歌片一百六十余种，五万余张。山东、河南、山西一些地方的印刷厂自行印制五花八门的年画、年历画。如山东的高密、泰安等县和河南的商城、信阳、三门峡等县市的印刷厂，不经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大量印制《小姑贤》、《西厢记》、《甜蜜的笑》等年画以及其他美人画等，除自销外，还向省内外推销。山东省新华印刷厂潍坊分厂未经领导部门批准，也擅自印制和为四个县印刷厂印制年画八十余万张，既不印版权，也不印定价和出处，以高价出售。

（三）一些地方出现图书自由市场。《基度山伯爵》原价四元，黑市价二十至四十元，最高达六十元；《数理化自学丛书》原价十一元七角，黑市价四十元。还有人兜售有严重问题的图书和内容荒诞的古旧书。在长沙的闹市街上，有人出售林彪“语录”及评法批儒一类的图书。成都、昆明街头出售的旧书中有《麻衣神相》、《济公传》、《江湖奇侠传》，甚至还有春宫画等。在一些县城、村镇的集市上，不少小商小贩长途贩运、高价出售各类年画和迷信品。河南禹县城关公社一户社员贩卖年画四万二千张，牟利二千余元。山

东昌潍、河南商丘等地的集市上，公开出售木刻印刷的门神、财神、灶马等迷信品。

（四）有些省市的自发刊物仍很泛滥。

上述由非正当途径印售的书刊画片，带来很多严重问题。有相当一批出版物内容不好，有害读者，而且也破坏了国家的财经制度，给一些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徒以可乘之机。同时造成出版用纸和印刷发行的混乱。北京市一年来非出版单位编印发行书刊共用纸五万令，相当于国家拨给全市出版用纸二十六万令的五分之一。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纠正这种现象。

第一，有关上级领导机关和党委宣传部门，要对擅自编印书刊的一切非出版单位进行工作，使他们了解和认真执行一九七八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克服书刊内容重复和滥编滥印现象的报告》中有关的以下几条规定：（1）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不得编印图书出售。大专院校自印的讲义、教材和未经批准发行的学报，除在校内使用和与有关院校交换外，不得在社会上发售，如有需要，应纳入中央或地方出版计划，由书店公开或内部发行。（2）各单位都不得翻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行定价公开或内部销售。对擅自印制出售非法出版物进行投机倒把的行为，各地出版行政机关要严加查

禁处理。(3) 各地印刷厂不得接受非出版单位交印的图书，如有必需，须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或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凡出版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期刊，中央一级的，要经中央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地方的，要经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上述领导机关在审批期刊时，要根据工作需要、编审力量和纸张、印刷等条件全面考虑，从严掌握。对现在未经批准的各类自办刊物，要根据以上要求进行认真清理。对自发刊物更不得提供纸张与印刷条件，擅自提供者要受到批评直至纪律处分。

第三，国家的出版发行部门要努力改进工作，多出好书，改进发行，尽力满足群众需要。对社会上存在的图书黑市活动和印售有害书画的非法行为，应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和法令，由出版行政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宣传教育，予以查禁和取缔，不能让其泛滥。

(第16期，4月7日)

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同志

据湖南省委宣传部反映，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全体同志认真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复调查研究，克服片面性，对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的内容做了部分修改，力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做到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

现在的陈列内容，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是客观存在，不能因为现实需要或人物变化而任意更改，也不能按照现代人们的心理来重新编导。只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宣传。因此，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一室，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些文物，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武昌起义的消息报导和孙中山的《反袁宣言》；还增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早期宣传马列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此外，还陈列了杨昌济先生关于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日记。这些

较好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党其他历史人物的活动，也按历史本来面貌予以宣传。比如在宣传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时，充分肯定了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具体领导安源罢工的功绩等。对展出的历史文物和照片，坚持一律不挖、不涂、不删、不贴，恢复和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是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过去认为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自然只宣传毛泽东同志。现在在重点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同时，也宣传其他有关领袖人物，宣传党的集体领导；把毛泽东同志置于党的组织之中、群众之中。增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照片，肯定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是党的创始人，增加了党的“一大”代表李达的照片和十三个代表名字，写上了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同时，增加了一些毛主席和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的集体照片。

三是路线斗争和是非争论的关系。过去把党内所有争论都纳入路线斗争的范围，把党史叫路线斗争史。这是不妥的。这次修改，去掉了这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提法。例如，对党的“一大”会上对有些问题的争论，不再说成是路线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陈独秀的某些错误观点，不再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只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在党内形成了一条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才说明是路线斗争，并强调路线斗争对党和革命全局的影响。

四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周总理生前指出：搞展览也不要重复，要有重点和特点。韶山陈列馆的重点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家庭、青少年时代和上井冈山以前的活动。对于其他时期的内容，只作一般宣传。近年来，自费旅游的外宾对旧居旧址很感兴趣。因此，对外宾的宣传又把重点放在介绍旧居旧址上。

五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事求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形式力求朴实、扎实、大方，不搞形式主义。这次修改，撤除了大红屏一个、大语录三块，充实了一批历史文物、照片。

陈列内容修改后，宣传效果比较好。前来参观的各级领导和国内外观众，都认为这样做符合历史事实。一位法国朋友听了毛泽东同志家庭的如实介绍，满意地说：“今天，从我们看到的这栋大房子，就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家是富的。但他抛弃了这个家去革命，正说明他伟大。”一位罗马尼亚同志听了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介绍后说：“这说明

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在早期不但受了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但他是在汲取其精华而不断前进的。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第17期，4月12日）

打击刑事犯罪的报道不要猎奇

铁道部电化工程局公安处章迟庄同志写信给公安部反映说：《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二二五”案破案的细节和经过（按：即《“二二五碎尸案”侦破记》，见去年八月二十九日上述二报），把我们的工作方法及实施全盘托出，公开发表，是不明智的。这些具体的做法是不应该让我们的敌人知道的。我们的底细全部给了敌人，岂不只能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增加困难吗？报纸发表此侦破记的当天，我乘地铁，在车上听一群青年人在议论：“若是塑料布上没有这两个电话号码，公安局就只能喝大面粥了。”“要是我，全买新塑料布，跟着车坐到外地，下车之前把提包换个车箱……。”尽管这群青年人很可能只是在炫耀自己有丰

富的想象力，但是在千千万万个读到报纸的人中，会不会有人犯罪时将引以为戒，把该防备的地方都做了准备!？因为那些要防备的地方，我们已经通过报纸全部教给他们了。看了报纸，又听了社会上的议论，感到：报纸上的公开消息，一定要为我们今后的工作着想。

以上意见值得引起注意。近一个时期，类似的报道、特写不止一件。最近的例子如《北京晚报》今年三月五日至七日连载的《十二万五千元盗案侦破记》，都有罪犯如何作案、销毁罪证痕迹以及逃避打击的具体描写。有的甚至绘声绘影，多方渲染，也有的详尽介绍我们采取什么侦察手段，包括安装防盗警报器及其性能、作用的说明。这样，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显然是不利的。希望各新闻单位教育有关的编采人员，不要把精力放到这些方面去，而要着重宣传我们同刑事犯罪现象斗争的决心、政策和基本措施，以及斗争的成果。

(第17期：4月12日)

张骏祥同志谈当前电影创作问题

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反映：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同志，最近谈了他对当前电影创作上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如下。

一、题材问题。现在不应干规定题材比例那样的蠢事了。但明年是建党六十周年，是不是还应该反映党的领导的革命历史题材？苏霸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我们要时刻准备打仗，是否还应有革命战争的题材？还有反映工农兵生活的题材。我不反对拍《杜十娘》。不过如果我们的题材都是分量很轻的，缺少革命历史、战争和工农兵的题材，我们是交不了帐的。这些方面的题材，比较难写，也比较担风险，不能指定谁写，但我们的编剧要有勇士出来，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二、创作上，有的过分追求技巧，甚至躺在技巧上，编戏的痕迹太重。创作确实要用技巧，但不能离开生活的基础，违反生活的逻辑去追求技巧。从《巴

《山夜雨》到《燕归来》，编的痕迹太重，有的违反生活逻辑。不是说这些本子一点没有生活，但是生活底子不厚。《归心似箭》的编剧，生活非常丰富，人物的经历，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感觉到。要理直气壮地讲技巧，导演不懂蒙太奇不行，但躺在上面也不行。编剧也是这样。《柳暗花明》，要人哭，要人笑，各种技巧都用了，但使人感到虚假。《樱》，技巧也搞得很好，人物的悲欢离合，很多手法都用上了。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谁是受害者？好象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一个日本妇女。观众看片子的时候，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是给技巧糊住了。细节的不真实会影响大的不真实。现在也确实感到，细节的真实把大的不真实糊过去了。

三、追求漂亮和洋气。服装、布景脱离人物的身份，追求漂亮，如《苦恼人的笑》拍得不错，但布景、美工没有衬托出人物内在的东西。《苦难的心》，医院很漂亮，地板象镜子，可以照出人来。其实“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个医院不是大字报满墙，乱七八糟！追求洋，如《这不是为了爱情》，字幕一出来全是拉丁字，然后是中国字，出现了女孩子的裸体镜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一个荒岛上，却修起了花园别墅。我不反对拥抱、接吻，但不需要的时候不要搞。我们应

该有我们自己表现爱情的方式，《归心似箭》中的表现方式不是就很好嘛！

四、有的作品忽视电影的文学价值。电影应该有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法，还应该有文学价值。现在有的只讲电影手法，忽视电影的文学价值。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要以导演为中心，但不能脱离编剧。当然，导演对文学剧本可以提意见，可以修改。有人说：《啊，摇篮》超过了原文学剧本，其实，是这部片子的导演首先在文学创作方面下了功夫，然后才是电影导演。不能因此就说是“导编”，导演放在前面，还应该是“编导”。电影只靠导演是危险的。电影最后体现出来，既是电影，又有文学价值。电影文学的哲理性、思想性和人物的典型性，不能只靠电影手法来表现。文学有叙事、抒情、戏剧三种形式，如《大河奔流》，上下集剪成一部，是很好的片子。张瑞芳演李麦时有一段叙述身世的戏，这段文学的叙事和演员的表演结合起来，十分感人；灾民困在孤岛上，加上唢呐的吹奏，很有抒情的味儿；一对年青的爱人，由于发髻引起了一场误会，很有戏剧性。这些文学色彩的内容，和电影手法、演员表演结合起来，既有文学的价值，又是电影手法。

（第17期，4月12日）

外行一定要变成内行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适应四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突出地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采取切实措施，使大批领导干部迅速地由外行变成内行，正是保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关键。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努力钻研业务，由外行变成内行，本来是在建国初期就明确提出来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之外，必须具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正确领导，知人善任，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也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把生产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事实上，我们有很大一批在建国以来转到经济、科技、文教等战线的干部，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拜一切内行的人为师，勤学

苦钻，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已经成为既懂得党的方针、政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又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他们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正在适应新的需要，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但是，也应该承认，有不少的同志至今还没有钻进去，安于当外行。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建国三十年了干部队伍还没有调整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构成很不合理，具有专门知识的干部太少。不彻底扭转这种状况，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妨碍我们一些同志钻研经济建设业务的，有一些糊涂思想，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确，过去我们是讲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那是在一九五七年，针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企图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情况而言的。毛泽东同志说：“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同时，他也指出：“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计划。我们各行各业

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毛泽东同志既讲了外行能领导内行，又提出要学懂技术和业务，实际上也讲了外行应该变成内行。我们必须全面地完整地理解他的论述。

外行、内行本来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在一个方面是内行，在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外行；外行通过学习，又可以变成内行。“外行能够领导内行”，指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尽管对某些专业知识不懂，或者知之不多，是外行，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是内行，在政治上、政策上、思想上、组织上是能够领导的。这是因为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能够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分析形势，综观全局，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奋斗。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必懂得业务，不必懂得科学技术。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任务是通过各行各业的的具体业务来实现的。政治一定要落实在业务上。一个政治觉悟高的干部，一定能够努力钻研业务，精益求精，使自己变成内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相反，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真才实学，又不认真学习，那末，尽管他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也不会作出应有的贡献，甚至还起相反

的作用。离开业务谈政治，只能是空头政治。离开客观规律去领导，只能是瞎指挥。这种“领导”越加强，人民利益受到的损害就越大。如果一个人不懂装懂，一味地蛮干，毫不顾及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恶果，那末，对他的那个“政治”，人们就不能不打个大问号了。

我们说共产党能够领导国家的建设，并不等于说，一个共产党员处在领导岗位上，就自然而然能够实现党的领导。我们通常所讲的领导权，是指阶级的领导，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组织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至于一个领导干部，是否能够实现领导的作用，要看他本人是否具备必要的政治、业务水平。阶级出身、职务官衔并不能自然带来领导的本领，只有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和不断实践，才能增长才智。正如列宁指出的：“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莫名其妙地就有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因此，我们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不管是搞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都有一个努力学习和钻研业务，把自己变成内行的任务。不懂业

务的，要学习，要钻研。懂得一些的，要继续学习，继续钻研。科学技术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着的。即使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打仗和农业生产这两件事，现在也是大大地发展了，不用新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也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耽误好多年了。仅仅感叹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奋发学习才能缩小这个差距，赶上世界的潮流。对于那些既不内行，又不热心学习和钻研的同志，要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领导班子，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那些经过教育，仍然不愿钻或者实在钻不进去的，怎么办呢？只能调整，改换他们的工作。不这样，就会耽误我们的事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下最大的决心，拿出最顽强的毅力，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科学，学管理，学技术，学本身业务所必需的一切专门知识，尽快使自己成为内行。这样，才能率领群众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列。

（第18期，4月24日）

克服片面性 是端正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宣传工作某些方面存在片面性的问题，在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之后，已经引起了我们这条战线广大同志的重视，不少单位认真采取措施纠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按照五中全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针来做好宣传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党在思想领域从根本上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那种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开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成绩是巨大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前一段的思想路线教育，围绕真理标准的讨论，

在宣传唯物主义反映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唯心主义，批评我们内部的那种主张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等方面收效较为显著；相比之下，在宣传辩证法，批判和肃清同林彪、“四人帮”反动唯心主义紧密联系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影响方面，则显得不足一些。而我们在各项工作中要真正地、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进一步解决方法问题。就宣传工作本身来说，正是在基本上扫除过去那套假、大、空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之后，进一步纠正片面性的问题才更加突出起来。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当前，克服片面性，是宣传战线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彻底地坚持唯物论同坚持辩证法是分不开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辩证法归纳为十六要素，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客观地也就是唯物地看问题，就要努力避免片面性，不把认识局限在个别的事实上，而必须掌握大量的事实，把观察的客观性同全面性一致起来。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

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一条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克服片面性，对于正确宣传、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有重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党在有些历史转折关头之所以遭到重大挫折，大都是由于对客观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计，而这种唯心主义的错误又往往是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开始的。片面性也是一种主观性。正如列宁指出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复杂矛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些事实的片断加以夸大，就会使我们的思想和决策脱离实际，从而陷入唯心主义。“文化大革命”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这种估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片面夸大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片面夸大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这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我们具有严谨的、没有片面性弊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但是，片面性今后还会不断地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来干扰我们的事业。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个问题。

二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旧交错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历史的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另一方面四化进程中的新情况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头脑还或多或少地受到旧的思想观点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对许多新事物又不熟不懂，缺乏必要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片面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特别是在事关党的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力争不出大的片面性。在这方面，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注意不够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有些同志没有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团结起来向前看和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去做，有时宣传这方面的东西过多、过细或过于集中了一些，有时甚至有点感情用事，这样就不利于引导人们安定团结搞四化。一个是在宣传解放思想，批判极左思潮，解决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思想僵化问题的同时，对社会上出现的右的思潮一度估计不足，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有力。

宣传工作上的片面性，来源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应当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总结经验，接受

教训，而不要就事论事。那么，这个时期以来，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或特点呢？

一种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就把它看成是事物的主流、全局。比方说，有些同志看到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四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毕竟是一个局部问题，它不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历史遗留的弊病。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缺乏恰如其分的估计，在他们看来，似乎我们党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他们不从安定团结搞四化的全局来考虑问题，不区别我们的打击对象和教育对象，而把反官僚主义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一种是，非此即彼，不是把事物看成对立面的统一，从对立面的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和互相转化中看问题，而是强调这一面就否定那一面，搞绝对化。例如，本来宣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把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有些同志在宣传上不注意这种辩证统一，离开党的领导去过分宣扬个人的民主自由。有的片面宣传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甚至主张对任何发表反动言论的人都应实行“言者无罪”的政策。有的说，允许自由结社就不

要登记，要登记就不叫自由结社。如此等等。对其他如加强政治工作和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善生活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红与专等对立面统一的认识上，也常有绝对化的现象。有的同志看问题、讲道理容易偏激，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常常把它说过了头，而不顾另一个方面，这样真理就越过了自身的界限而变成了谬误。

另一种片面性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重点论简化成一点论，用单打一代替弹钢琴，用一刀切来代替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主张重点论是对的，但是有的同志把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理解得过于简单，他们不去分析矛盾主次之间的互相制约和互相转化，而是孤立、静止地去抓重点，名为重点论，实则一点论。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反倾向斗争上。例如有的同志批极左时，对右的思潮的出现缺乏思想准备，没有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事实上，在矛盾运动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是永远不变的。不然，事物就不会有发展和进步了。因此，反倾向斗争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来进行，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左”防右，反右防“左”，不要搞反右一贯制或者反“左”一贯制。同时各地区、各单位的情况千

差万别，要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一反“左”就一律反“左”，一反右就一律反右，搞一刀切、一窝蜂。

以上这些方面只是举例，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根据新时期宣传工作的实际情况，更具体地、深入地研究一下我们片面性的表现，看看它们有些什么特点。然后对症下药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增强党的宣传工作的战斗力。

三

那么，怎样才能减少我们工作中的片面性，避免犯大的片面性错误呢？

从这个时期的体会看来，首先的一条是要尊重唯物辩证法，要学习它，应用它。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光辉哲学传统的党。这种哲学传统的形成同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是分不开的。我们党总是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把它运用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上来加强宣传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力。但是多年来这种尊重唯物辩证法的传统和风气被损害了。林彪、“四人帮”阉割了辩证法关于对立统

一学说的丰富内容，用一套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冒充辩证法。正如他们用天才论、唯意志论来代替唯物论那样，他们在方法论上所造成的祸害也是十分严重的，至今还程度不同地在影响着我国一些同志的头脑。我们今天必须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的伪造，从思想上理论上把自己武装起来。

第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前一段我们有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对于人们批评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不那么听得进去。这种态度不利于我们的进步。应该虚心听取人们的批评，包括不那么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批评，仔细地分析这些批评。一种情况是我们确实讲得不那么完整、准确，有片面性，甚至有错误，我们应该接受批评，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的立论没有错，甚至没有什么片面性，但是如果联系实际不够，讲得很一般化，没有针对人们关心的问题作很有说服力的论述，人们也可能接受不了，甚至有意见。总之，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有片面性，不能以我们主观上觉得如何为标准，而应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经常要就重大的事情发言，要讲得完整、准确而无片面性弊病，这是很不容易的。毛

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和人民委派我们掌握宣传手段，并不等于我们因此就自然地取得了正确地进行宣传的发言权。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对所宣传的问题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为此，我们必须十分尊重战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那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倾听他们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克服主观片面性，也才有可能帮助那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使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和实际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第三，要严格地按照党的方针进行宣传。一个同志如果党的观念强，能努力领会党的方针，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他在工作中的片面性就可能会少一点。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首先是党中央，是我们的战斗司令部，是掌握全局的。只有依靠党，我们才能做到全局在胸，才能避免犯大的片面性错误。但是由于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党发生的特殊情况，有些同志这种观念淡薄了。林彪、“四人帮”曾经利用他们直接控制的宣传机器，大搞反动的舆论一律，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永远结束，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解放思想，生动活泼的大好形势。为了进一步发展

这种形势，避免犯大的错误，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性，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我们的全部宣传工作，在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第四，要用民主的、心平气和的、讨论的方法来解决片面性的问题。我们工作中出现片面性，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历来效果都是不好。那样做，往往会出现用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造成压而不服，思想问题越整越多的局面。民主的、心平气和的、讨论的方法，有助于人们全面地分析问题。要看到有些意见从总体来说是片面的，但在片面的认识中，还可能包含着某些真理的成份，不要轻易地全盘否定。听意见首先是要多多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要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的意见来集思广益。对于许多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之争，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就更要慎重对待。在争论中要允许别人保留意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从团结愿望出发，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大力提倡人民内部不同意见可以自由讨论的新风气。要坚决摒弃过去那种自己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

就急于表态，那种不分是非、只看风向，动不动就一边倒的坏风气。在原则问题上，要敢于和善于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克服片面性是端正思想路线的一个经常的课题。我们要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加强思想方法修养，改造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做好党的宣传工作。

（第19期，4月27日）

尽快把党员教育工作抓起来

最近，中央在《关于组织全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通知》中指示：对广大的新党员和老党员，在今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要以学习、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采取上党课、开讨论会的办法，使党员的模范作用、党的组织生活、党的领导，在轮训以后有明显的进步。各级宣传部门，应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组织部门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把党员教育工作切切实实抓好。

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三千八百万党员，确实不

愧为一个伟大的党。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党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一部分党员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不强，模范作用很差，乃至搞不正之风等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有些原来合格的也不那么合格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然而也有一些党组织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习惯于在旧轨道上工作的那一套方法。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就有“党不管党”的现象，这以后更是普遍地放松了党内的教育工作，对党员既无要求，又无检查，不闻不问。这一切，明显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作用。今天，我们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从根本上抓起，进行系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自觉性，使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真正成为实现四化的先锋战士。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党的状况，这是搞好党员教育，整顿好党风、党纪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满怀信心地做好这件事。应该看到，我们的党是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党，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党。她虽然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但毕竟还是经受住了这场

严峻的考验。她虽然失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的领袖，但是经过斗争的检验，仍然保有一大批老的骨干，并且形成了新的坚强的领袖集体——党的中央委员会。她勇敢地向全世界指出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清洗了身上的污浊，医治了肌体内外的创伤，正以新的姿态继续向前。她在总结了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重新确认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采取实际步骤结束十年动乱，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上来。所有这些，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尽管我们党内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健康的東西，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把党整顿好、建设好。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悲观的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抓紧抓好党员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全党同志的觉悟。不少基层党组织的经验说明，只要一抓党员教育，情况很快就有很大的变化。党员的作用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也提高了。即使是那些有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的党员同志，在党的教育下，大多数也是会清醒过来，跟上党的步伐前进的。

党员教育的重点，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单位的具体情况，针对不同对象的需要而有所不同。但是，统一对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认识，自

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要毫无例外地成为这次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偏离或者违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引起的。党之所以有战斗力，就在于它的路线正确。提高党的战斗力，首先要求全党在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就每个党员来说，只有思想路线端正了，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能自觉地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养成好的作风。路线端正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这次党员教育要采取整风的方法。整风并不是整人，而是要认真学习文件，真正在思想上提高觉悟。除了党章修改草案和政治生活准则以外，还可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关于共产党员的论述。并且要注意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英雄模范党员的光辉实践进行教育，激励广大党员的自豪感和责任心。要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现和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推动其他党员学习。要善于调动党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克服存在的消极因素。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交换意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始至终都要作到和风细雨。不要把对照检查搞成压力很大

的追逼行为。个别顽固反对党的路线，或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或根本不起党员作用，按照党章规定非处理不可的，也要放后一些，经由正常的组织手续去妥善进行，不要拿到党员教育中来解决。

毫无疑问，一切党员都要接受教育，老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党员，更应该起带头模范作用。那种把这次教育看成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党员的事，是片面的、不妥当的。为数众多的青年党员是我党的新鲜血液。他们富有朝气，接受新事物快。虽然不少人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确实要下功夫肃清流毒，但同样也要看到他们经受锻炼的一面，其中许多人还觉醒较早，同林彪、“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我们要对年轻的新党员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所有新老党员都要努力学习，都要时刻鞭策自己，为作一个合格的党员而努力。

这次党员教育工作的任务很重，工作量很大，需要全党动手，各级组织来办。宣传部门作为党委在这方面的助手，要进行全面规划，重点指导，及时总结交流经验。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争取在今年之内使全体党员受到一次系统的教育，在思想和行动上大进一步。

（第20期，5月8日）

吉林省委宣传部 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意见

四月下旬，吉林省委宣传部就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
问题，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现在摘载如下。

最近，我们组织部内二十二名同志，由部的三位
负责同志带队，会同有关部门，分四个调查组，对九
台县饮马河公社、四平线路器材厂、吉林市百货二商
店、吉林大学等四个单位的党员状况作了调查。

从调查的情况看，这些单位的多数党员是好的和
比较好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
一部分党员不合格或不那么合格。按党员的标准，结
合四个单位的实际情况，我们对这些党员进行了分类
排队，一类的是合格的；二类的是有些方面合格，有
些方面不合格的；三类的是不合格的。饮马河公社农
村有党员三百二十六名，其中一类占百分之四十六，
二类占百分之四十六，三类占百分之八。四平线路器
材厂有党员三百九十一名，其中一类占百分之三十八，
二类占百分之五十一，三类占百分之十一。吉林市百

货二商店有党员三十四名，其中一类占百分之五十，二类占百分之四十一，三类占百分之九。吉林大学有党员一千八百六十六名，其中一类占百分之三十，二类占百分之六十八，三类占百分之二。文革中入党的新党员中的三类党员，农村占新党员的百分之六，与同类老党员的比例差不多；工厂占百分之十三，比同类老党员的比例偏高一些。

从党员中暴露的问题看，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路线问题。工农党员中有少数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模糊认识，认为：“政治理论没准头，路线斗争没是非。”“这些问题咱们弄不明白，跟着干就是了。”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对四项基本原则抱怀疑态度，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政见。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首先研究如何学习和贯彻执行，而是先随意评论一番，做起来是左顾右盼，不坚决，不得力。党员中这种离心离德的情绪，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严重障碍。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党员教育中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懂得，在政治上同党的路线保持一致性，是党员的最起码的准则。

二是，党的观念问题。由于多年来党的组织生活

不健全，长期不抓党员教育，使一部分党员缺乏党的观念，不懂党的一些基本常识，更不懂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问题在新党员中更突出一些。要通过学习讨论党章修改草案，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系统地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党员懂得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三大作风和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增强党的观念。

三是，组织性纪律性问题。组织纪律松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是目前党员队伍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削弱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通过党员教育，结合健全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四是，党风问题。目前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严重地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威信。这是党员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教育党员坚决反对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行为，树立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的埋头苦干的正气，迅速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

为了解决好党员教育中上述四个问题，在进行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拟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从五月份开始，省、市、地、州委宣传部，要在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和机关，开展党员教育的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拟于六月份召开小型的党员教育试点经验汇报会。

第二，省委宣传部和报刊、广播等新闻单位，有计划地组织力量，根据党的五中全会和中央〔1980〕2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目前党员思想的实际，撰写一批既有理论性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以推动党员教育工作的开展。

第三，要下大力气总结出一批好党委、好支部、好党员（包括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典型，广为宣传。同时，配合纪律检查部门，对于违法乱纪的党员和干部，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进行公开的批评。

第四，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固定人员，长期以来，党员教育工作处于又抓又无人抓的状态。为了加强党员教育工作，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考虑省、市、地、州委宣传部应设立党员教育处（科），人员在现有编制内调剂解决。

（第20期，5月8日）

《四川省委宣传部 分析全省思想战线形势》 一文的编者按

近来，对思想文化战线形势的分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四川省委宣传部召集有关同志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

全国思想文化战线贯彻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现了生机蓬勃的繁荣景象。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这是很有成绩的战线之一。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产生了一点缺点和问题，那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如果不加以正视，把正在冒头的不良倾向及时纠正过来，就不利于继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但是，假如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以致动摇对我们这条战线的基本估计，那也是不实事求是的、有害的。把确实存在的问题指出来，是要更好地贯彻“放”的方针，绝不是要“收”。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当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

（第21期，5月15日）

内部资料也要注意保密

一个时期以来，内部学习材料如雨后春笋，出版社、机关团体、研究单位或大专院校的图书资料室都纷纷编印出版，或在内部交换，或广泛发售，甚有影响。为了交流思想，提供资料，促进学术理论研究工作，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或新提出的值得注意的理论观点和有关的材料，编印一些东西供作内部参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涉及到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则应该慎重，要区分机密程度分别对待。不能因为已注明是“内部资料”、“内部刊物”，就可以任意把秘密的、机密的乃至绝密的材料内容翻印，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利益。

今年一月，有个出版社编印的《干部学习参考资料》第二期，主要就是两个内部讲话：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及其展望》；一是《访苏情况简介》。前者谈了我对苏、对美的战略、策略，对不少国家首脑的评价和对当前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策；后者详细介绍了我国去年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的情

况，包括方针、策略、弱点，等等。这一类讲话一般是在很小的范围讲的，有的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否适宜作“学习参考资料”是大可考虑的。而这家出版社一印就是二十万册，虽然是说“内部集体发售”，很快会流传到社会上是不待言的，还有可能落到外人手中。经有关部门指出后，出版社已通知各地书店作停售处理。

最近，还有一个地方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编印的《研究参考资料》第四期，内容都是一些涉及对苏看法的内部机密材料。刊物发出，他们即已发现不妥，通知收回。这个教训也在于忽略了一般学术研究和当前政治斗争的区别，没有注意内部资料不等同于党内机密刊物，更不能轻率地翻印党内文件和机密刊物上的讲话。

我们应该从这两件事引出必要的教训。要加强对内部刊物的领导。一般学习材料和供学术研究参考的内部刊物，都不应翻印、转载机密的政治性的材料。

（第21期，5月15日）

党组织要维护教师的权益

去年十二月，在中国教育工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再次明确指出，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重教师的劳动，支持教师的工作，关心教师的生活，维护教师的正当权益，推动全社会树立和发扬尊师的优良风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在各地传达后，广大教师反应十分热烈，都决心为祖国建设多出人才贡献全部力量。很多地方党委也努力改进和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情况是很好的。

但是，据反映，有些地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教师中间至今未能很好落实。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残留着“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影响，错误对待中小学教师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有的实际上仍然把中小学教师看作“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真正以同志相待。有的不尊重教师的劳动，随意支使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干这干那，如有不从，则百般刁难打击。尤有

甚者，有个别干部无端打骂教师，或者纵容社员、职工危害教师人身安全。不久前，湖北省云梦县新店高中全体教工，写信给全国教育工会揭露，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晚，在校值班的陈文成教师，发现前王村社员来校偷粪，前去劝阻，竟被毒打昏倒在地，其他几位老师闻讯赶来交涉，也被一一打伤。事后，这个生产队的王发荀（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还带领全队男女老少，手持铁锹扁担来到学校，扬言：“三天内要把陈文成脑壳砍下来，一个星期内，老子们要踏平学校，来个一扫光。”象这种愚昧、野蛮、违犯法纪、侵犯人权的思想行为，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

各地党组织要继续注意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深入人心，对他们不得有任何歧视。在学生家长因子女教育问题同学校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教育这些家长对子女严格要求，同学校密切配合。要重视和维护教师和学校正当权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教师的工作，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公社、生产大队要教育社员不得侵犯学校、教师的财产和利益，如果发生争端，要反映到组织上调查解决。对毒打教师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严肃处理，不能姑息。

（第22期，5月20日）

江苏总结农村冬训工作

据江苏省委宣传部报告：江苏农村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试点，对基层干部、党员进行冬训，至今年三月结束。全省受训的有二百二十三万多人，其中党员一百二十二万多人。

这次冬训效果较好。大部分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了。人们反映：冬训象在混水缸里放了一把明矾，糊涂观念澄清多了。冬训前，不少同志认为，讨论真理标准是检验毛主席，不是“砍旗”，也是“降旗”。学习后，较多的同志懂得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大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增强了实现四化的责任感、紧迫感。前一时期，在基层干部、党员中较为普遍地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存有怕右怕变的思想，冬训中，大家联系本地实际进行对

比，学习先富起来的典型经验，分清了政策界限，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心。许多党员还认识到，治国先治党，正人先正己，只有党风好了，社会风气才能一新，提高了执行党规党法的自觉性。徐州、淮阴、苏州、扬州等地区，还比较集中地解决了基层干部怕经济上吃亏，工作上难搞，想“攒纱帽”的问题。他们在进行忆传统、讲党风的教育后，有些同志原来“纱帽笃笃摇”，现在表示要“纱帽戴戴牢”，决心为四化大干一场。

冬训是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党员普遍地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好形式。粉碎“四人帮”后，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虽已有所加强，但党课制度才开始恢复，经常轮训工作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基层的同志主要靠开会受到一些教育，无论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利用冬春农闲时间，对他们进行一次比较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理线”，“擦擦枪”，弥补日常教育的不足，把“细水长流”与“集中灌输”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很有必要。大家认为，今后每年冬季轮训干部和党员要成为制度。

冬训的时间短，学习内容不能多，只能集中解决一两个主要问题。这次各地在开展冬训时，一般都集

中帮助大家认识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克服各种模糊思想和错误认识，提高贯彻执行自觉性。也有些地方认为集中基层干部和党员学习的机会难得，想多插一些教育内容，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贪多求全，舍本逐末，效果受到一些影响。

许多地方的情况说明，把思想教育与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是搞好冬训的有效方法。这样做，使基层的同志听得懂，摸得着，便于理解领会，加深认识，既能弄懂道理，又能看到一些问题。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区的一些县、社，在训练班上联系生产队之间发展快慢的实际，总结先富起来的经验，找出富不起来的教训，使大家看到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贯彻执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精神，用政策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就能大上，集体、社员就能富起来；反之，生产就上不去，集体、社员就富不起来。联系实际找出了贯彻执行政策不力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林彪、“四人帮”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表现在：“谈到富怕丢纲，谈到钱怕离线，谈到定额管理怕回潮倒退，谈到发展副业怕走资本主义道路”，执行中往往是“放手不放心，想搞不敢搞”，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有的地方联系总结了领导生产不从实际出发，搞一刀切、一律化的经验教训，使大家

认识到，办事情，想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不能照搬照套。但也有一些县、社，在训练中对如何解决认识问题考虑不够，基本上照本宣科，从概念到概念，效果不怎么好。大家还体会到，联系实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因此在教育中要循循善诱，启发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做到以讲道理为主，以启发教育为主，以提高觉悟为主。这样，大家乐于接受，乐于改正，使冬训收到好的效果。

这次冬训，各级党委较重视。淮阴、南通、苏州等地委，宿迁、太兴、常熟、兴化县委的负责同志，亲自搞调查，抓试点，培训骨干，讲课，为下面做出了好样子。盐城地区一百八十一一个公社、镇的党委书记，大部分承担了讲课任务。建湖县十七个公社党委的五十三名正、副书记，有四十四人在冬训班上讲了课，共讲一百三十三课，平均每人讲三次以上。许多同志还将自己摆进去，把思想亮出来，为大家解放思想开了道。但也有少数县、社党委负责同志，存有“冬训会影响生产”的顾虑，对四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决心不大，措施不力。有个别县以收听广播讲座代替冬训，形式主义，走过场。

（第22期，5月20日）

不要滥印西方侦探小说

四月七日，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同志给胡乔木同志写信，对近年来有的出版社竞相出版西方侦探小说提出意见。他说：侦探小说在欧美的产生和发展，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现在左一个《惨案》，右一个《谋杀案》，大量发行，风靡一时。这些大都是按照几个公式凭空捏造的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并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不能有什么认识价值。他表示希望出版界多出好书，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胡乔木同志把冯至同志的信转给了有关省委研究处理。据江苏省委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反映：江苏省委对乔木同志和冯至同志的信非常重视，已交省委宣传部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后提出改进意见。这个刊物

还指出：“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应当认真地介绍和研究外国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技巧上可资借鉴，而内容方面不怎么健康的作品，可以内部发行，主要是提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至于对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智的精神食粮。”

（第22期，5月20日）

制止外国人自行散发宣传品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来我国参观游览、洽谈事务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有的外国人无视我国的主权，任意散发各种宣传品。例如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天津市，一个由加中友协推荐的旅游团一男一女两名团员，步行到三十四中门前，男的弹起“吉他”，女的则高声歌唱，招来很多学生和路人，一时交通堵塞。那个外国女人随即从提包里取出《福，带给你》、《我们的好朋友》等中文版基督教宣传品，广为散发。这种现象是不能允许的。今年三

月，天津市经过研究提出了对策，报国务院批准，已作为《关于制止外国人散发宣传品的通知》下达。各地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下面是这个通知的摘要。

为了维护我国主权，保持我市社会秩序和群众的思想安定，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外国人（含来访外宾、驻津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外国驻华机构人员、旅游者、商人）和华侨、港澳同胞等，散发宣传品（含宗教宣传品）的处理问题，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涉外单位和接待部门，如发现外国人携有拟散发的宣传品，应主动做工作，可向其说明此举违反我国海关对不享受免验待遇的外籍人员进口自用印刷品的规定。如发现外国人散发宣传品时，应予以劝阻，指出：按照国际惯例，为了维护我国主权，一切外国人都不得在我国境内自行散发宣传品；自行散发宣传品与来访者的身份和访华目的是不相称的；此举影响了我市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不听从劝阻者，可报告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安部门、值勤交通民警，对外国人在街道、公共场所散发宣传品者，应予制止，维护好交通和社会秩序。

二、外国人不准在我市进行传教等不正当活动。

对外国人在宾馆、饭店内，个人或集体内部举行宗教活动不应干涉；如提出要求在我市内自行举行宗教活动，由接待部门报经我市宗教主管部门同意，可安排在市内宗教活动场所（如寺庙、教堂）内进行。

三、边防检查站、海关等有关部门，对外国人携带宣传品入境者，按我现行有关规定处理。

四、外国驻华使馆（包括其他驻华机构或人员），向我有关单位或个人投寄的书刊、画报、新闻公报等宣传品，一般可以收受。但如有攻击、歪曲、污蔑我的内容，应交市外事办公室统一处理。如遇有外国人向我接待部门或涉外人员发送宣传品者，不论原著或复制品，中文版或外文版，如有对我攻击、污蔑和淫秽内容的（包括宗教宣传品），应阐明我观点，予以婉拒或退回。如情况特殊或时间紧迫当场来不及辨明其内容的，事后发现上述内容时，应立即向本单位领导申报，不得扩散。

五、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外事纪律教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对外政策。对已收受外国人散发的各种宣传品，要进行一次清理，凡有对我攻击、污蔑和淫秽内容的，要及时送交市外事办公室处理。

（第22期，5月20日）

正确执行宗教政策 开展无神论的宣传

编者按：近年来，某些地区宗教势力有所抬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肆意破坏党的宗教政策。遗毒至今，使得我们有些同志不敢接触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宣传和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宪法的规定。对个别借宗教名义进行不法活动的行为不敢管理。中央在有关文件中，对此都有明确的指示和规定。我们必须据以向群众进行宣传。山西、黑龙江和陕西等省宣传部门及时提出对有关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

山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工作》在四月三十日指出：据反映，我省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比较集中地区的一些基层干部，因为不了解党的宗教政策，划不清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宗教活动的界限，不敢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既不敢宣传信教自由，国家和政府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又不敢对不正当的宗教活动进行管理，以致发生了一些强迫别人信教，向未成年的青少年灌

输宗教思想，干涉教徒的婚姻，宗教活动影响生产和学校教学等违反政策的现象；对于个别参加宗教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不敢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这种放任自流的现象是不对的，应该坚决纠正。

有宗教活动的地区应该积极地正确地向群众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任何公民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加歧视，没有也不允许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教的和信不信宗教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承认有信教和在宗教活动场所宣传有神论的自由，又承认有不信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承认任何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是不对的。不过，为了避免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不必要的纠纷，解放以来的作法是，信教的不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宣传有神论，不信教的也不去宗教活动场所宣传无神论。

在向群众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还应当宣传信教群众必须遵守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在这方面有必要重申过去关于宗教活动的一些规定。例

如：不得向未成年的青少年(即十八岁以下)灌输宗教思想；不得干涉行政、教育和婚姻；不得妨碍生产和社会秩序；不得诈骗钱财和危害人身健康；不得动用集体财物进行宗教活动；不得恢复已经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制度，等等。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要批评教育制止，情节严重的，经查明属实，应分别情况严肃处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得信仰宗教。对参加宗教活动的党团员要教育他们摆脱宗教束缚，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退团。但一定要从教育入手，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并且要教育广大信教群众，要警惕和善于识别有人企图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协助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制裁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应该教育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要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热爱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爱国守法，自觉地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增强团结，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宣传工作》在五月十二日指出：

目前，在我国，信教群众不下几千万，我省信教的也有十来万人。这就决定宗教工作的群众性、长期

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长期的基本政策。同时，我们必须广泛深入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宗教的最终消亡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决不能采取强制的行政手段，不能用反对宗教组织和个别教徒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通过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坚持积极而有效地正面引导的方法，团结信教群众。要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通过现实生活的实践，逐渐懂得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是不存在的；精神和肉体分离的宗教教义是不科学的；人的灵魂能进入理想“天国”的说教是荒诞的。要使他们相信，只有四化的宏伟目标，才是全体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切身利益的最大寄托。要耐心引导他们把追求“未来”的“善果”，变为追求和创造现实的幸福，把相信上帝，变为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们自觉地放弃宗教迷信观念，积极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要联系信教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帝爱国守法教育。对信教群众的无神论宣传，要采取潜移默化、引而不发的做法，不能歧视他们，更不能直接刺伤他们的感情。要让他们在政府政策法规的指导下，按照指定的寺庙教堂活动，以便及

早把地下的宗教活动引到地面上来。少数坏人如借机进行不法活动，应发动信教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有据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对立的。共产党人在有神论面前，必须自觉地、理直气壮地宣传无神论，鼓舞人们同一切宗教偏见进行斗争，努力用真理战胜谬论，用科学战胜迷信。要教育人们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划清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偏见的界限。要大力宣传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宣传科学知识，用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武装广大群众，彻底驱散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宗教迷雾。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无神论教育。宗教活动的重点地方，中小学要把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政治课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要把无神论的思想渗透到其它学科的教学中去。

对党的基层干部，一方面要他们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的宗教政策，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同时，要他们掌握同有神论进行说理斗争和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正确方法，改变一些基层干部对违法宗教活动不敢管、不会管的现象。

陕西省委宣传部在五月十三日，就解放前在兴平县福音堂传教的美国基督教牧师孙维廉，今年四月下旬趁来华旅游之机，私去兴平县活动一事指出：

美国传教师孙维廉等四人私去兴平活动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国外宗教势力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我国国内渗透，国外神职人员以旅游者身份来我国千方百计进行串连、挂钩的事接连发生，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认真对待。必须认真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同时向广大干部、群众及信教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一致同国外宗教势力的渗透活动进行斗争，尽可能防止和限制其影响。

（第 23 期，5 月 27 日）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认真坚持党性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战斗力，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党的宣传工作和广大宣传工作者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在宣传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进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也应看到，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有些问题的宣传不够准确，有片面性；有些宣传，有客观主义的倾向；少数宣传单位和宣传工作者违反宣传纪律的事情也迭有发生。因此，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加强党性，仍然是改进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的首要问题。

一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首先就是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任何来自“左”的或者右的干扰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此之外，党本身决无另外的利益。包括宣传工作在内的党的全部工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言论行动，都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

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最高标准。我们党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一切为了人民（包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最高原则。当然，人民是个历史的范畴。在现阶段，我国人民包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它劳动者和爱国者。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也由于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有着特殊的利益和要求。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体现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体现各部分人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确结合。因此，在宣传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就不仅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同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而且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亲身体会，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教育人民，引导人民树立全局观点，自觉地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当前，就是要重点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引导全国各族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

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

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做宣传工作，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的痛痒，注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从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一步步地提高觉悟，理解党的政策，拥护党的主张。当然，我们强调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和切身体会出发，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群众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不能“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不讲社会主义的前途、理想以及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使人们的思想局限在个人眼前利益的狭隘境界。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宣传工作者讳言人民利益，特别是个人物质利益。谁要一提这些，就会被扣上个人主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之类的帽子，最低也是“不突出政治”。报刊上充斥着空洞的政治说教和蒙骗人民的假话，看不到人民真正的呼声和要求。当时的宣传大权为林彪、“四人帮”所把持，他们竭力使党的宣传作为他们的帮派利益服务，他们宣传的那一套完全是危害人民利益、与人民为敌的东西。他们鼓吹要百分之百地突出的“政治”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强迫人民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这样的“宣传”，这样的“政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的

厌恶和抵制。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有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的报刊、广播，真正代表人民说话了，反映人民的呼声了。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越来越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真正成了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但是，新形势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宣传中如何正确对待当前人民的意见、要求，特别是他们的生活疾苦；如何正确地开展对官僚主义、特殊化、走后门等等不正之风的批评和斗争，这都是我们广大宣传工作者值得注意的问题。

如前所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勇于同种种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但是党性原则首先要求我们从全局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从有利于安定团结搞四化出发。我们发展生产、实现四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多年来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太多，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对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凡是有条件或有可能解决的，我们都要满腔热忱地促进它的解决。对于有些目前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能轻率地许愿，而要

按照党的政策进行耐心的说明和解释。否则，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官僚主义、特殊化、走后门等等不正之风是实现四化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扫除，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宣传上必须做得比较适当，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并且较为切实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因为其中除了对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制裁外，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主要还是说服教育的问题。

我们国家还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期，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出现，人民当中的困难、问题仍然成堆，有些人信心不足以至有牢骚，有抱怨。而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内风气不正，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宣传工作要更多地为人民说话，反映他们的呼声，多讲点人民性，而不宜过分强调党性，似乎一强调党性，一强调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就会妨碍我们替人民说话、作人民的喉舌。这种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对党性原则的误解。无产阶级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只图一党一群私利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有利于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

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安定团结地搞四化。这是党的最大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也是全党和全国的大局。不顾这个大局，就既谈不上坚强的党性，也谈不上真正的人民性。

二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和一切“假（假话）、大（大话）、空（空话）”的东西，也要反对客观主义的倾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简要而精辟的表述。它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严格遵循的正确的认识路线，也就是思想路线。那么为什么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呢？这是因为我们党所集中地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意志，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卓有成效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又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

立场上，事事出以公心，才最敢于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的党性正是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统一。

近几年来，我们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同时，也联系到我们许多同志在思想路线上的主观主义倾向。这种主观主义或者表现为本本主义，即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或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不按客观规律，而凭主观意志办事，搞瞎指挥。多少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每个同志，在这方面是吃够苦头了。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体会到主观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四化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至于宣传工作上猖獗一时的“假、大、空”，则不只是一般地在认识路线上陷入了主观主义，而且是出于私心或者某种帮派利益，有意地歪曲、粉饰或回避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因此，这更是无产阶级党性所不容的。

在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假、大、空”以后，我们宣传战线有些同志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采取不问社会实践效果的所谓纯客观的立场。这种主张在有的文艺作品中表现为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在有的文艺理论文章中表现为片面强调“写真实”，否定作品的倾

向性。在宣传、新闻工作上，则有所谓“镜子论”，就是说，宣传工作就象一面镜子，客观世界有什么就宣传什么。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倾向。

把我们的宣传工作比作镜子，从坚持宣传的内容必须是事实，即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则这个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宣传工作比作镜子的意义再向前夸大一步，就并不恰当。因为，第一，镜子对客观世界只能作机械的直观的反映，只能反映出事物的表面现象和事物的某些侧面，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全体。而我们的宣传工作担负着指导和帮助人们探索真理、正确地认识世界的任务，则只能把现象看作是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第二，镜子式的反映至多也只能是消极地描绘世界。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重要的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向人民做宣传，主要的任务还是为了鼓舞、动员和指导人民投入改造世界的斗争（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总之，如果无视这两条，那么所谓镜子式的反映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映论，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能采取这样的认识路线，而必须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那么，能不能采取所谓纯客观的态度，看到什么就宣传什么呢？就我们宣传的材料说，必须是客观事实，即绝对不可搞“假、大、空”那一套。但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始终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的，就是要引导人们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我们不仅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必须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而且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更要事事考虑到怎样才能引导人们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去正确地认识和行动，决不能采取看到什么就宣传什么的所谓纯客观的态度。举例来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光明的一面；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有阴暗的一面。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只是从成绩与缺点、光明与黑暗的某些方面搜罗一大堆实例，然后“纯客观”地、不加分析地在报刊上照登。试问这样的宣传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形势，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为祖国四化而斗争吗？显然，这样的宣传除了给人以混乱的印象外，是什么好的效果也不会有的。如果这位宣传工作者由于时间、地点和他本人观察的局限性，只是接触了一些光明面或者只是接触了一些阴暗面，就根据这种片面情况进行宣传，那么只会得

到同我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不是使人盲目乐观，就是叫人悲观失望。这种镜子式的见什么就反映什么的宣传，就反映的某些事物或事物的某个侧面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它不能反映事物的全体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本质。从本质上看，就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见，以为只有采取这种所谓纯客观的（实际上也是有倾向性的）态度，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是不对的。

有这么一种糊涂观念：以为一讲立场、利益、倾向和党性，就会妨碍我们客观地看问题，就不可能严格地实事求是。这是把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党性混同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党性了。如前所说，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党性原则不仅不排斥而且要求严格的实事求是，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最勇于实事求是。相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理论家们在适合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范围内，也重视如实地研究客观事物；但是一当事物发展的趋势同他们的阶级利益相矛盾时，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掩饰和歪曲事实的真象，“昧着良心说瞎话”。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立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

科学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当今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立场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

然而，可否既不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也不站在资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而采取所谓纯客观的立场呢？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同于一面消极无为的镜子，都不可能采取漠然的态度纯客观地反映世界，而总是站在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立场，带着一定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区别只是在于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和带有什么样的目的和影响。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家们标榜所谓超阶级、超党派的客观主义，以无党性自夸，实际上不过是掩盖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党性的愚蠢企图和虚伪说教罢了。

三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还必须自觉地把全部工作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邓小平同志今年一月十六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我们是一个九亿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三千八百万党员的大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保证党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现在，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已经确定，这是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而制定的正确路线。党在宣传战线上的每个同志，我们的一切宣传工具，党的各方面宣传工作，都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决地、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直到向中央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等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党的宣传工作者也不得在群众中任意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否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贻误和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但是，我们党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纪律。斯大林说：“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

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6页）因此，我们宣传战线必须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刘少奇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论党》）我们强调加强纪律性，决不是要限制党内民主、限制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保证每个党员能够沿着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和党的路线，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最大的贡献。

坚持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关键在于加强广大宣传工作者的党性修养。我们每个宣传工作者都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要经常以周恩来同志这样一句名言来激励和鞭策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第24期，6月2日）

周扬同志在全国文学期刊 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

我讲一点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文学期刊的地位和重要性

文学刊物，应该在党的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它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往往认识不够，关心不够，这是个缺点，今后应该改正。

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先行。我们建党也是先有思想然后才有组织。我们共产党人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最彻底的批判者。马克思说革命有两种武器，两种批判，一种是批判的武器，一种是武器的批判。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就是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

界。开始是批判的武器，尔后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他们都是先办刊物的。马克思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先有《新青年》，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创办了《湘江评论》。先有报刊这个舆论工具，而后才有党的组织。当然这些不都是文艺刊物，但文艺在这些刊物上也占一个重要的部分。列宁很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讲党的报纸，当然，也讲了党的文学，但并不是专门讲文学的。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我们曾经是很重视的，因为那时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没有政权，没有军队，报刊是我们唯一能利用的重要阵地，所以我们想方设法去打入和占领这个阵地。到了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批判的武器就退居第二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出的书刊风行一时，对抗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抗战一起来，它继续发挥作用，但已处于配合地位了。武器的批判，用枪炮来说话，当然是最厉害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什么“革命大批判”，名曰批判，实际与武器的批判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它罗织罪名，蛮不讲理，还不许被斗的人申辩，根本剥夺他的发言权，要文斗，结果变成了要武斗。这种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粗暴的批评，都不成其为真正的批判。现在我们进入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了搞建设，但还有斗争，还要运用批判的武器。真正的批判，这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有说服力，与人为善，做到使人心悦诚服。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要战斗，战斗就不能只有防御，没有进攻，批判就要有进攻精神。不要一听到“进攻”二字，就感到紧张。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叫做“神经脆弱”，至今许多人仍然“心有余悸”。我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重新拿起来，并且学会更好地运用它。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批判整个旧世界，彻底改造旧世界，批判各种“左”的或右的思潮，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文艺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批判，通过艺术形象，通过形象思维的手段来进行的一种批判。谁能说文艺作品不是批判人生、批判社会呢？三年来我们的这种文艺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就因为它发挥了批判的作用。至于在这种批判当中有什么缺点、问题，有什么不当之处、不足或过头之处，可以讨论批评，共同总结经验，但它批判的精神是好的。我认为，三年来文艺工作之所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是发挥了它的批判精神。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旧事物的残余还大量存在，有的还死灰复燃，伪装新的面目出现，这就要求我们更

有力地发挥批判武器的作用。

我们这次开会，就是表明党中央重视我们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学出版事业的领导。我们要总结经验，交流经验，把文学期刊办得更好，更有生气，源源不断地向人民输送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和评论，使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物，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几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文学刊物，解放思想，广开文路，整个的说，都是办得有成绩的。我们发现了很多新作家，发表了很多新创作，短篇小说评奖，戏剧、电影评奖以及其他各种评奖，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取得了成绩，但也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问题。任何事情只有成绩，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要不要纠偏，首先要问有没有偏？又是什么样的偏？程度如何？我认为不能说我们整个文艺界都发生偏了。至少我看不出中央有这个意思。偏，无非是“左”和右。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有偏就要纠，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有偏，就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纠。决不能说整个文艺界都有偏向，更不能这样来评价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视

词和中央十一号文件，是正确的。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就最后让人民和历史去做结论吧！

开这次会，既不是什么纠偏，也不是削减刊物。现在刊物确实多了一些，应该说这是好现象，但也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调整得更经济、更合理一些。因为问题比较复杂，各地同志要自行商量，不要采取硬性规定，一刀切的办法。总之，我们的文学期刊要各有特点和个性，省、市、自治区的刊物需有地方的和民族的色彩。

文学刊物是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回想三十年代，为了争取一块报刊的小小阵地，要费多少力气，冒多少风险。现在我们文学刊物有一百多种，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好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提高编辑人员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刊物办得不好，就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报刊是我们党的思想阵地。在这个阵地上，我们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反对极“左”路线的残余影响，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思想，还要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的思想和作风。这就是我们思想战线上所要进攻的对象。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向旧世界进攻，向一

切抵挡我们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挑战。在斗争中，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摆在进攻的地位而摆在被进攻的地位？既然是思想阵地，有的时候就要用批判的武器发起进攻。我们要批判旧世界。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属于旧世界，不属于新世界的。进攻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枪法不高明，可能瞄得不准，不但没有打中敌人，反而伤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就打得更准了。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思想阵地上的一个战士，一个指挥员，要学会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不要误伤好人，而不是害怕进攻，更不是把自己摆在被进攻的地位。过去的中宣部有过一句话，就是要给党中央当哨兵，当参谋。扩大一点讲，所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要给党，给人民当参谋，当哨兵。既然是个思想战线，既然还有阶级斗争，你怎么能不当哨兵，怎么能没有敌情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刊物就叫《在哨所》，我国“左联”最早的一个机关刊物也叫《前哨》。但当哨兵这个词，也有片面性，因为当哨兵的任务主要是侦察敌情。现在有些同志，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敌情观念成了条件反射，似乎搞思想意识形态的工作，主要就是去发现敌情。由于世界上还存在有阶级斗争，我们国内外都还有阶级敌人，我们必须有

敌情观念，千万不可麻痹。注意敌情仍然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任务。文学期刊的编辑，不但要做个哨兵，还要做个勘察员。勘察我们国家的人才、创作。这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这些财富，许多还藏在地下，我们就是要把它发掘出来，如果单讲当哨兵，那么好象我们就是专门发现敌人的动向。我认为不仅要当哨兵，更重要的还要去当勘察员，勘察我们国家的人的财富、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才被埋没、被漠视。我们的刊物要让他们显露头角，英雄有用武之地，不致默默无闻。这是我们编辑人员应尽的责任，这种事做好了，就是大功劳。荣誉应该属于编辑同志。

刊物是阵地又是个园地，当好战士，也要当好园丁。对于人才，不但要善于发现，还要善于去培养。文艺刊物是百花齐放的园地，各种花都要长出来。我们的目的是要放出好花、香花。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放出一些不好的花、有毒的花。做一个园丁要善于去栽培好花、香花。不过要求每朵花都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园丁恐怕也是难以办到的。做园丁就要保护香花，爱护香花，尤其是新生长出来的花。它们是比较脆弱的，容易被摧毁，所以我们要特别保护。对写过

一两篇不好作品的但有才华的作者，我们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帮助，使他们的才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是非常宝贵的，要爱护人才，严格要求和批评，这也是爱护的方法之一。

党一定要重视文艺期刊这个阵地，过去我们重视不够，今后更要重视。

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刊物的编辑人员有很大功劳。如果刊物出了差错，发表了不好的作品，编辑应为作者分担责任，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又要为编辑分担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在编辑和作者身上。要使作家有创作的勇气，评论家有理论的勇气，编辑有敢于负责的工作精神。编辑自己首先要有眼力，有鉴别能力，有勇气，有事业心。办刊物和搞出版事业，都要有事业心。日本讲谈社出版人说他们出版社社长，现在已经半瘫痪，但他每天还在想着讲谈社的出版物应如何扩大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扩大到非洲、拉丁美洲去，而且还在想二十一世纪的规划。我听了很感慨。这些资产阶级的出版家，他们会想到非洲，想到拉丁美洲，想到二十一世纪，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出版家还不如他？我们的宣传、出版或其他一些文化部门，多么需要有这么一批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啊。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成千上万个有

事业心的人，有革新精神的带头人，是不行的。光靠群众的积极性还不够，一定要有好的带头人带领他们前进。

二、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

双百方针，从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后，经过了几次反复和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彻底否定和践踏。因为林彪、“四人帮”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怎么可能容许双百方针？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一定要把双百方针认真贯彻，不管碰到多少困难、阻力或者还会碰到什么挫折；我们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一定要重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我们共产党员，全体人民只有执行宪法的义务，没有违反宪法的权力。当然宪法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付之实践，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一定还会遇到各种阻力。这我们要有精神准备。我们一定要准备重新经受考验，不要以为实行这个方针会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方针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工作中一个创新之举，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试金石，将考验每个人，也考验方针本身。代表极“左”思潮的

人，他们是要反对这个方针的，巴不得这个方针失败。代表自由主义思潮的人，则从右的方面来败坏这个方针。因此，我们要有精神准备，不怕遭受挫折和风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实行双百方针有有利的条件，也有种种的困难和阻力。我们要坚定勇敢，而又要慎重，决不能掉以轻心，把这看成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把它看成是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文艺思潮，是整个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的反映。我们经常讲，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的确是这样。社会上的，党内外的各种思潮，都反映到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中来。所以一有什么思想动向、思想波动，文艺总是首当其冲。有的同志就抱怨说，为什么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都怪到文艺头上呢？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既然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是当代各种思潮的触角，触角不灵敏，那就不成其为文艺了，文艺也就没有生命了，灵魂的工程师自己也没有什么灵魂了。文艺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互相矛盾的现象，作家怎样去挑选其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来加以反映和典型化呢？我们要求作家反映得准确，力求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来反映。但作家任何时候都只能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运

用自己特有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来反映，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勉强他的。我们只能要求作家反映得更真实些，更艺术些，时时刻刻把人民放在眼里，注意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作家也好，评论家也好，都可能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不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对他们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有些文艺上、理论上的是非，一时还看不清楚，不要过早地下断语，作结论。我们搞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应积极地帮助作家们，帮助他们深入生活，接触现实中的尖锐问题，不要绕开矛盾走；出了差错，就为他们分担责任。我们处在伟大时代的斗争漩涡之中，想要逃避、离开，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和政治无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而不可分的。你要离也离不开的。我们需要根据长期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正确地处理文艺和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使政治有利于开阔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眼界，保证他们创作的广大自由，而不是限制和束缚这种自由，更不是对这种自由妄加干涉。文艺不脱离当前政治形势，文学期刊更是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辨别风向，分析形势，但坚决反对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看上级脸色行事的恶劣作风。我们

观察、认识形势要根据党的方针、路线，并经过调查研究，独立思考。不要靠打听小道消息来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襟怀坦白，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敢于解放思想，也敢于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想。如果真是自己错了，就大胆承认、改正，毫不回避、掩盖。我们也不要怕听别人的批评，包括并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不要听到别人指责和批评文艺界的某些消极现象，就认为别人是否定文艺工作的成绩。对一切事情，我们都应该采取客观的、冷静的、虚心的态度，经过反复思考和调查研究，然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倾向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包括文艺工作在内，从领导思想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左”或者右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过去通常所讲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既反“左”也要反右。无论“左”或右，一般都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随意提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林彪、“四人帮”就正是这样来残害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一种思想倾向，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明显，没有系统化，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形成一种思潮、一条路线。遇到“左”或右的思想倾向的萌芽，不要任意夸大，但还是应该注意，因为它会发展的，我们要及早注意，防止向坏的方向发展。对于艺术作品，一般不要用“左”或

右这类术语。“左”和右都是对领导思想倾向讲的，这是政治的概念，对作品的批评一般不要用这类概念，而应采取思想评论、艺术评论的方式，允许充分的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从领导思想的角度来说，对文艺工作，我们既要反对粗暴干涉，也要反对放任自流。粗暴干涉和自由放任是相反相成的。因为横加干涉行不通，就自由放任，自由放任出了问题就更厉害地横加干涉，打棍子。这样搞，我们文学艺术怎么能健康地发展呢？总之，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改进党的领导，遇事多同群众和专家商量，不要一意孤行。对思想问题、艺术问题，我们只能采取平等的、同志的商量的态度；凡涉及重大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党和政府那就必须干预，不能听之任之。我们批评了文学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某篇报道，至多不过是通报了一下，以引起大家注意，这也不能说是“打棍子”，更不能说是违反双百方针。难道双百方针可以不要批评，批评就是违反双百方针吗？这样理解是不对的。问题是批评的内容对不对，批评的方式好不好。当然，我们在进行任何批评的时候，都要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我前面说过，全国文学期刊整个来说，是办得好的，有成绩的。一个季刊发表了一篇什么不好的作品，

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什么坏书，也不等于说这个期刊或出版社整个不好。我们应该相信出版社、刊物、协会的领导人拥护党的方针、路线的。我们的期刊和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很多人是思想解放，也有鉴赏能力，但也有不少人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敢提出新问题，不敢发表新意见，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这是不好的，对艺术事业的发展不利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应当严肃批评，但也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既不缩小，也不夸大。不能对作家责备求全，也不能把责任都归之于编辑。文学期刊和其他文学出版物也好，戏剧、电影、音乐也好，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内容低劣、粗制滥造、盲目地模仿西方，一味追求票房价值等等不良现象，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贻害了广大青少年，由此引起了舆论界的不少批评和非议。我们的文艺界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应为此感到委屈。对这些不良现象，我们要有痛切之感。最近，我看到了张骏祥同志的一个发言，他讲电影创作问题，说有些电影违背生活逻辑，单纯追求技巧，模仿西方、日本和香港。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吸取他们的一切于我们有益的长处。但不从生活出发，不根据

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特点，盲目崇洋，这就不对了。我还看了新风霞同志的一个发言，她谈戏曲演员要提高思想和表演艺术，对表演要严肃认真，不要迎合和迁就某些观众的低级落后的趣味，要引导观众，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这些意见，都是讲得很好的。这些问题，和文学期刊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的文学期刊，对文学艺术界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现象都是负有责任的。它们应当发表意见，应当提出劝告，提出批评。在我们的文学期刊上，对他们进行诚恳的帮助，他们决不会怪你们多事，而是只会感谢你们的。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不少人还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同志们拿出勇气来，不怕别人批评自己，也敢于批评别人，不怕得罪人。批评对的就接受，不对可以反批评。我们的刊物一定要保证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如果只有一方的意见，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正确对待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

首先，要重视，党和政府都要重视这个工作。

其次，要解决文学出版工作的条件。我们编辑的工作很辛苦，要改善编辑同志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要保障他们有一定时间接触群众生活和自己写作。在这方面我们要有些立法，搞些条例。当然有法，也不一定全能实行，但总比没有好。作家、艺术家的权益问题，如版权、版税、上演税等等，长期没有很好解决。希望文化、出版部门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使大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再次，讲对编辑人员的希望。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为人做嫁衣裳的服务精神，要有点使别人名扬四海，而自己却默默无闻地舍己为人的精神。稿子是编辑看过、挑选过、修改过的，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他们为党和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人才，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是在百花园中辛勤劳动的园丁。我们讲要尊师，我们也要尊编辑，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师。当然，提倡尊重编辑，编辑也要尊重作家。

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都要注意培养评论队伍。莱辛、狄德罗、别林斯基都是刊物的著名评论家。评论家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个人很惭愧，没写什么自己满意的评论。现在，文艺也象其他战线一样，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文艺创作，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不能只讲破，更重要的是立。当然，对极“左”思潮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还要继续

破。为了适应我国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利益，要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培养评论家。我们的评论家要有比较丰富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及有关现代科学知识，要熟悉生活，还要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一个出版社和刊物至少应有两三个评论家。要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搞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批评。要广开门路、才路。全国性的文学刊物还应特别注意地方刊物的作家评论家，多发表一些他们的作品，否则容易搞成宗派主义和小圈子。现在有这样的反映，说是有的期刊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自己编辑部包办了，这是不利于培养评论家和扩大评论家队伍的，也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业余评论家，一些业余的评论家往往很有生活经验，也有高明的见解。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的队伍，我们的文艺兵种才能完全。文艺刊物既是个思想阵地，又是百花的园地，那就需要我们在这个阵地和园地上演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戏剧来。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我们的编辑和作家、评论家们紧密团结起来，为党为人民站好岗哨，当好园丁！

（第25期，6月12日）

一件由惊人的愚昧招致的 特大凶杀案

编者按：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我们的干部和职工中竟然还有心甘情愿地引颈待戮以求升天成仙的人！这种不能以常情理喻的愚昧迷信现象，尖锐地告诉人们，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科学知识，同封建的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深厚流毒作斗争，巩固地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报刊上、会议室里，而必须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群众中去，到偏远的星散的居民点里去。请基层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们认真地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有效的经常化的措施。

据新华社反映：不久前，贵州省织金县发生一起以迷信为手段诈骗钱财，终至杀人灭口的特大凶杀案件。凶杀案的主犯叫谢显吉，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两个受害者，一个是织金县城关区阿烈公社秘书张

盛宏；一个是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四二队安装工张清洪。两人都家破人亡，一个全家十一口死去十口，只留下已分家的大儿子幸存；一个全家四口杀了三口，一人死里逃生。罪犯的作案手段极为残忍，遇害的十三人中，两人被用匕首活活杀死，六人是用炸药炸后又用凶器加害，还有五人是用棕绳捆住身体、坠上石头推入河中淹死。而这些被害者临终时还喜形于色，以为真的会脱却凡胎升天成仙。

今年春节前后，罪犯谢显吉恐其迷信骗财活动暴露，经过周密策划，决定用“升天成仙”的骗术，将受其诓骗已久的张盛宏、张清洪两家全部杀害，以达到灭口的目的。二月十五日，谢犯分别对张清洪、张盛宏胡说：“你们希望升天成仙的事，老祖已经答应了，你们赶快准备，不可错失良机。”并诱骗他俩动员全家合宅飞升。同时要张盛宏的爱人杜玉珍和张清洪一起去四川，动员张清洪的爱人尹堂容升天。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谢接连两次去张盛宏家，策划送其八个子女“上天”的事情，并协助张把未卖掉的肥猪、家具、被褥等往自己家里转移，二十一日深夜，谢、张即以搬家往四川为由，将张的子女骗到离住房约一百米远的柏杨洞内杀害。据谢犯供述，他与张盛宏商定两个方案：一是送凡体，即用刀杀；二是使分身法，即用炸

药爆炸。深夜十二点多钟，张盛宏把已睡的孩子喊了起来，说：去洞头祝告一下，好上车。走到洞边，谢先安排一个十四岁和一个五岁的女孩进洞，谢用匕首将她俩分别刺了四、五刀，当即死亡。谢随即来到洞外，对张盛宏说：“送凡体的办法不行，这样做肉麻得很。”张盛宏说：“我心里也不忍，那就改用分身法吧。”谢又返身进洞，将尸体移到岔洞内，在另一个岔洞里找了一块宽敞的地方，把带去的两斤炸药放入坑内，安上四个雷管，每个接上一根一至二寸长的导火绳，用画有符的黄纸盖上。让张的六个孩子围着黄纸跪成一圈，叫他们对准符上的图象烧钱纸祝告。谢立即转入别的洞内，躲避炸药爆炸。炸药响后，张的次子、五子当即被炸死，三女、六女、七女和九子还在哭叫，谢犯用匕首逐个补刀。

第二天，谢犯和张盛宏、张明华（张盛宏的长子、已分家）乘车离开贵州，到四川找张清洪去了。谢显吉到四川后，带着他们急忙找“成仙”地点，都因人多而未敢下手。后来在綦江县石门滩河边找到了“理想”的地方。谢提出他们“升天”的办法是采用水遁匿尸的招魂法。谢向他们说：“用这种办法升天最好，只要一念咒语，把魂一招，人就失去知觉。唯一要紧的，得把尸体隐蔽好，否则灵魂上不了天，会成游尸魂。”

死里逃生的张清洪说：当时我们由于中毒太深，对谢丝毫不怀疑。选好地点后，我和张盛宏都很高兴，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当天中午，就按谢显吉的交代上街去买了两根棕绳，以备晚间成仙时用。这天晚上约十二点钟左右，谢显吉把我们叫了起来，对我们说：“快点走，三点钟就要关南天门了，过了时候上不了天。”于是，我们就匆匆忙忙到了河边。谢显吉说：“就在这里，你们去搬大石头来，好沉尸掩护凡体。”我们把两块大石头抬到岸边。然后，让我们沿着河岸跪成一排，我背上张良（十岁男孩），我的爱人尹堂容背张琼（六岁女孩），他先把棕绳套在石头上，以两端的绳子分别把我和尹堂容拦腰拴住，张盛宏和他的爱人杜玉珍是自己套的绳子。等我们都捆好后，谢对我们说：“你们要跪好，意要坚，心要诚，我招魂去了。”这时我趁着蒙蒙夜色看了一眼尹堂容，只见她大气不出，脸上笑咪咪的。隔不一会，就听谢显吉喊一声：“一二三，上天！”随即将我们一个个连人带石头推下河中去了。一落水，我才恍然大悟，感到谢显吉不是送我们上天成仙，而是要害死我们全家。我在水中拼命挣扎，把拴在腰上的绳子褪掉后，浮出了水面。这时谢显吉还没走，在河岸上一个劲地用电筒朝河中照。他见我并没有淹死，就拣了一块石头向我打

来。我立即向水中一沉，拼命游向对岸，向政府报了案。

谢犯作案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案自首。

据调查，张清洪、张盛宏是在一九七六年初和一九七七年夏与谢认识的。他俩结识谢的动机，是听说谢会法术、会武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想找他拜师求艺。其实，谢当时还是一个刚跨出中学门不久的小青年，他由于家庭的熏染，从小就不务正业，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学了点气功、杂耍、小魔术等小玩艺。后来见有人上门求教，他就趁机诈骗。他教二张一些诸如拦腰打石、手上砍砖、水中捞物等气功和魔术，得到点酒肉，或敲诈点衣服。二张一向迷信，就拜他为师。他进一步教他们所谓“阴斩”、“遁术”等法术，搞了求天书、取仙丹、办观音会等一系列的迷信活动，宣扬成佛成仙的鬼话。并吹嘘自己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星临凡，经常往返于天上人间，奏人间善恶，引渡有缘者。自一九七八年六月谢显吉以支持老祖修庙或给“父王”（注：谢胡说张清洪的父亲张四海死后升天，封为后天玉皇，成了“父王”）治病为名向张行骗以来，张清洪差不多每月都要给谢四、五十元。而张每月的工资加上野外津贴，却不过七十

余元。据张清洪记忆所及，仅他父子先后被谢骗去的财物达一千六百多元。据揭发，谢以迷信为手段骗得的现金共二千一百八十一元，他自己供认的也有一千四百五十元，还不包括从张盛宏家骗走的粮食、肥猪和木料等物资。谢显吉为了不被揭露，终于对二张全家下了毒手。

（第26期，6月16日）

对《吃运动饭》一文的批评

最近，广州市一些干部联名写信，对《羊城晚报》五月十四日登载的《吃运动饭》一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篇文章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吃白相饭”这一行逐渐地消失，另一种特殊的职业又勃然兴起，这种职业就是“吃运动饭”。文章说“吃白相饭的”和“吃运动饭的”都不务正业，游游荡荡，不为社会创造财富，专做损人利己的勾当。在平时，“吃运动饭”的形象是并不怎么雅观的，等到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会象神灵附体般地一跃而起，刹那间就变成了冲锋陷阵的勇士，斩将搴旗的英豪。“坚决打倒”，义愤填膺；“誓

死捍卫”，声泪俱下。他们只要把手中的小本本一翻，无数“尖端材料”便倾囊而出，油盐酱醋，要啥有啥，捕风捉影，骇人听闻，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就被他们炮制得很象个样子，他们立刻威名大振。到了运动结束的时候，“吃运动饭”的朋友们自然是扶摇直上、弹冠相庆了。“吃运动饭”，既不费力，也不费心，有名有利，无祸无灾，的确是一门很值得羡慕的职业。当然，“吃运动饭”如此吃香，苦干实干的老实人就更遭殃，这是明明白白的。文章最后说，自从林彪、“四人帮”垮台后，“吃运动饭”这门行业也一落千丈、一蹶不振了，“吃运动饭”的如何是好？改一改行，今后不吃运动饭，吃四化饭就行了。

广州市一些干部来信指出，《吃运动饭》一文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有错误。首先，它全盘否定了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不搞这些运动，很难想象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能巩固到今天。后来的反右派，虽有错误，但属必要。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政治运动，违反了历史事实。来信进一步指出，如何看待成千上万的参加政治运动的骨干，是一个涉及面很大，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积极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向党靠拢的非党积极分子，平时也是工作骨干，其中还包括不少的老模

范。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过运动的人，也要注意区别，大多数还是好人。运动本身有错误，责任不能归在他们身上。《羊城晚报》的文章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骨干丑化得连“吃白相饭的”还不如，这是很不公道，很伤人心的。特别是作者费尽笔墨，描绘“吃运动饭的”如何“整人”，如何使别人“下沉”，自己“上浮”，这就挑动了另一部分人的感情，很不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吃运动饭》一文确有这封来信所指出的问题，立论、情绪和效果都是不好的。我们的报刊编辑部一方面要放得开，敢写敢说，又要认真负责，不放过错误的、有害的思想言论。要切实负起自己的职守，把好党交给我们的宣传阵地。已经发生了疏忽和错误，就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和纠正。

（第26期，6月16日）

重申不要滥用“长官意志” 这一概念

去年六月，针对一些地方在批判“长官意志”中产

生的混乱现象，《宣传动态》第十九期在“宣传用语要注意准确性”一栏内，发表了《不要滥用“长官意志”这个概念》一文，指出：批评“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这不是说长官意志、社会意志、政府意志也就是主观意志，必然是同客观规律相违背的。主观意志不等于客观规律，但它可以反映客观规律，既可以正确地反映，也可以歪曲地反映。因此，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反对。在宣传中尤其是在向工农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时，不宜简单地提出反对长官意志这类含义不清的口号。最近，一些同志又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现在重申，希望报刊编辑部同志继续注意不要滥用“长官意志”这个概念。

（第26期，6月16日）

反映新情况 探讨新问题

——穆青同志谈经济宣传

最近，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在社内多次谈到要加强经济宣传的问题，大意如下：

随着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新闻报道的重点也要跟着转移；四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应当成为整个国内报道的中心。怎样才能转移得好？如果以为只是增加经济报道的条数和比重，多报道一些生产情况和新成果，那是很不够的。宣传重点的转移，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主要表现在质量上。就是说，要求我们的报道真实地、及时地、鲜明地体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反映当前经济改革的实际情况，以及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经验，抓住大量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人们新的启示，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

要使经济报道真正成为国内报道的中心，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在政治思想领域，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现在，经济战线上面临着—场新的变革，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在人们的思想上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的意义不比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实际上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可以说，政治问题上思想解放是经济问题上思想解放的前提或基础。但是，仅仅有政治问题上思想的解放，而在经济问题上思想仍然是僵化的，那么中央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落实。

不久前，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底应该怎么看？哪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哪些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是不是把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当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比如经济建设上，过去学苏联的一套，统得很死，一切照上面的办。工厂按上面的规定要求生产，产品质量不管好坏，商业部门一概包销。这套做法，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二，我们的上层建筑是不是适应经济基础，我们的上层建筑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障碍生产力发展？我们的机构这样庞大，互相扯皮，工作效率低。这种状况要不要改？

在那次国务院会议上，赵紫阳同志把经济建设的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即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主要精神是要把经济搞活，是要在经济上来一个大变革。

在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新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经济战线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新局面，新事物不断涌现。这种形势，逼着我们考虑新闻报道怎样跟上中央的新精神，怎样跟上蓬勃发展的新形势，逼着我们认真改革新闻报道。

要解放思想，就要认真地学习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我觉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事物面前，我们不但政治思想水平不够，现代的专业知识更是缺乏。很多新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我们不懂，许多新事物我们一时判断不出它的真正意义。对中央的一些指示一知半解，有时表面看好象理解了，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又不理解。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很好地学习。

解放思想，还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要同干部、群众一起，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新问题。分清是非，探求真理，正确地判断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及时地抓住有重大价值的经济新闻。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解放，甚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

的状况，还是用老框框、老套套看待不断发展的客观事物，那就会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对中央的新精神格格不入。这样，我们的新闻工作就要被四化建设发展的新形势甩到后面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要反映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即突出一个“新”字。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必然会遇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反映这些新情况，深入探讨这些新问题，就成为我们经济报道的主要内容。

穆青同志根据中央精神，对当前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一、报道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中央早已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如农业、轻工业要发展得快一些；重工业发展要适当放慢一些；基本建设战线要缩短；积累率要降低；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今后比较长期的报道主题。需要我们着力研究的是，这些重要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我们必须善于抓住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进行报道。比如，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必须先行，建筑业必须加强等问题，都是宣传报道中应该重视的新课题。

二、报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报道改革体制，把经济搞活，经济领域里将会出现竞争，将会出现联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能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使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赶先进；也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竞争中那种“大鱼吃小鱼”的弊病。联合要自愿、互利，要有利于生产，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这些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要满怀热情地去调查研究，作出报道。

三、报道发挥我国的和各地的优势，十分注意经济效果。全国有全国的优势，各地有各地的优势。各地经济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全国的经济布局怎样做到合理，都要从实际出发。比如，广东、广西、福建适宜多种甘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适宜多种甜菜，发展糖料生产和制糖工业。江苏、湖北等地适宜于多种棉花。山西有发展煤炭工业的优势。黄河上游、长江上游有发展水力发电的有利条件。如果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一切工作都实行优选法，就能提高经济效果，加速经济建设。

四、报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我们党和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逐步地和不断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活需要。这个观点，应当成为我们经济报道的重要思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左”的干扰，我们不敢讲“改善人民生活”和“满足社会需要”，不宣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五、为四化建设中的英雄高唱赞歌。用先进的榜样鼓舞、教育群众，这是我党新闻工作的传统做法。当前，社会上某些人对四化缺乏信心，经常报道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尤其重要。

六、经济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也要有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性的新闻。

对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事物，我们首先要抱着积极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进行采访报道，给予支持；同时，处理时也要慎重。报道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贴标签，牵强附会，更不能弄虚作假。任何新事物刚出现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报道时要持分析态度，注意分寸，不要把幼芽夸大成大树。在报道成绩的时候，同时要注意适当地讲一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注意交代清楚新事物出现的背景和条件。有些事只是一个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有的事还在试点，尚未推广，这些在报道中都应交待清楚，写得恰如其份。对于各地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在采访中要深入考察，多作比较，以便进行鉴别；报道要

有辩证的观点，防止片面性。

应该看到：报道得好，对当前的经济改革可以起促进作用；反之，也会对工作有干扰。我们一定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认真负责的精神，搞好这方面的报道。

当经济改革的报道遇到阻力或不同意见时，要坚持真理，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凡是符合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效果好，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新事物，我们就要敢于坚持原则，进行报道。如果遇到有意见分歧的情况，我们要虚心倾听不同意见，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际情况，谨慎地处理，必要时应向上级请示报告。

搞好经济报道，还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例如，要集中一些记者，形成拳头，完成重要的报道任务。对于重要的新事物，要连续报道，造成舆论，增强宣传效果。同时，要创造新的报道形式，改进文风，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反映新的实际情况。

（第27期，6月25日）

北京市委宣传部调查处理 非正常流入的外国书刊

北京市委宣传部看到《宣传动态》十五期发表的《警惕进口印刷品中的思想渗透》一文后，调查了北京海关、第一服务局几个饭店、旅游局、外交人员服务局、使馆清洁队等涉外单位，发现外国书刊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流入市内。一是从海外邮寄；二是旅游者和外国代表团带进来；三是各国大使馆、办事处、外交公寓丢出来。海外邮寄进来的印刷品均由海关检查。据海关反映，近几年寄进科学技术书刊大量增加，是好现象；但内容反动，淫秽、迷信的书刊也随之增多，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关查出这类书刊八百五十五件，反动传单十二种，还有大量黄色、迷信的录音带。由于海关检查严格，这方面漏洞较少。旅游者和外国代表团带进来的书刊数量很大，据在北京饭店的一层楼调查，外宾在半个月内丢下的书刊计三十五

种，一百余本。一些接待外宾的大饭店每月收集的国外书刊数以吨计。各国大使馆、办事处和外交公寓在垃圾中丢掉的书刊更多，每月在二十吨上下，世界各国的报刊、书籍、杂志几乎应有尽有。因为制度不严，这方面漏洞较多。这些书籍、报刊、杂志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科技、商业、旅游、文艺、体育方面的，其中有参考价值的不少，但也有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反共反华和色情、淫秽的。如美国的《花花公子》、日本的《宝石小说》和一些性刺激画报，如《夫妇之爱》、《最好俱乐部》，这类书刊登载大量裸体、性生活图片和描写性欲的小说。其中有的被人带到社会上，毒害青少年。

目前对国外流入书刊的处理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缺乏具体分析，处理办法不一致。据对新侨饭店收集到的五十二种书刊（三十五种文字）的分析，其中内容好或比较好并有使用价值的政治、经济、科技、艺术书刊占百分之四十；内容有些问题或错误，但尚有参考价值的也占百分之四十，如有的刊物内容有参考意义但夹杂一些半裸体广告，有的刊物虽登载观点错误和反动的文章，但也可以供专门研究部门作参考。目前，不少单位不加分析地全当“洋垃圾”送造纸厂化浆，这是很大的浪费。第二，有些涉外单位近年

来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没有把防止外国文化渗透提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高度去认识。有的单位不敢对职工进行反腐蚀教育，甚至连“反渗透”、“反腐蚀”的口号也不敢提。只是消极地限制职工，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第三，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经过与有关涉外单位主管同志座谈，北京市委宣传部提出了对非正常流入的国外书刊的处理意见如下：

第一，涉外单位的各级党组织要把收集、保管和认真处理外宾和旅游者丢下的国外书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起来。同时要对有关人员进行防腐蚀的教育。对拒腐蚀的好典型及时表扬，违反纪律的要批评教育，必要时要进行处分。要号召党团员在反腐蚀斗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并要求基层党团支部成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战斗堡垒。

第二，接待外宾的饭店、外事人员服务局、旅游局等涉外单位和使馆清洁队、中国书店、废品公司、造纸厂等有关单位，均应建立管理国外书刊的严格制度。有参考价值的书刊，要妥善保存，不使散失；反动、淫秽书刊要减少环节，严防扩散，发现工作人员扩散或盗卖淫秽书刊要严肃处理。

第三，拟委托中国书店承担收购各单位外国书刊的任务。各单位收集到的外国书刊，要及时打包封存，由中国书店定期收购，并设专门机构分类整理、把关检查，对口供应有关部门。中国书店要订出严格的制度，黄色、淫秽书刊，销毁时要有专人负责，监督销毁。各机关团体、研究单位要购买外文书刊时，一律按购买外刊的规定到中国书店选购。不能再随便到饭店、使馆清洁队、废品公司、造纸厂等单位翻阅查找。各单位更不能自行设售书点，出售未经检查、选择的外国书刊。

(第27期, 6月25日)

对宣传干部的几点要求

——王任重同志在中宣部党员轮训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宣传干部同样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过去熟悉的一些东西闲起来了，很多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学习。怎样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样能够使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如何正确地回答干部、群众中提出的种种思想问题？这些迫切要求我们提高本领，真正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宣传战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里我提几条意见，供大家研究。

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只学词句，把它当作教条，而是主要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把我们武装起来。

现在，有些同志不学，连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基本原理都不懂，闹得笑话百出。这很不好。一个共产党员，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还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宣传干部不仅要学，而且要力求学得更多些，更好些，更深些。这就要下苦功，挤出时间学习，特别是结合实际进行学习。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是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必读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著作，都必须认真阅读和研究。

二、调查研究。要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到工厂、农村、学校、研究所、商店、街道甚至部队里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在四化建设中的创造和提出的问题，向他们学习，同他们交朋友。我们要向这些人作宣传，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那就是无的放矢。而现在，我们在这个方面还很薄弱，一定要切实采取措施加强。

三、工作、学习、写作三结合。学习是为了工作，写作也是工作。搞宣传工作，一是靠嘴，一是靠笔。过去我在湖北省委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写作组

叫“龚同文”，写的也有头脑发热的错的东西，也写了一些有用的东西。错了就改正，不要怕。毛主席提倡第一书记不仅要审查社论，而且要自己动手写社论。过去有些重要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是不讲、不写，那怎样做宣传工作？不仅要让别人写，自己也要写，不会写就练。写东西不下苦功是不行的。我们写东西，要力求符合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多一点辩证法。要写短文章，千把字，一篇文章讲一个问题。要旗帜鲜明，要生动，要泼辣。

四、发扬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要消极等待。要敢想、敢说、敢做、敢写。有些同志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这种精神状态不好。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要敢于实践，敢于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想、敢说、敢做，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共产主义风格吗？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风格，不应当庸庸碌碌，怕字当头，而应当敢字当头。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然，敢想、敢说、敢做的中间，要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光有敢字还不行。要把高度的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五、要善于集思广益，多谋善断。这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扬民主，把大家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不要个人说了算。多谋善断，不要少谋寡断，也不要少谋武断。总是在那里清谈，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那叫优柔寡断。也不能什么事情不经大家商量就搞武断。我们提倡多谋善断。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切正确的意见都接受。中央为我们做了模范。我们党中央，书记处，现在不论什么问题，都是大家你讲意见我讲意见，最后一致了，就做出决定。遇到重大问题不一致，就再放一放，大家再思考思考，再讨论讨论，不是那一个人说了算，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家长作风。我们宣传部门要向中央学习，有事要多和大家商量，不要由少数几个人匆促决定。

六、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要善于坚持真理，也要善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它的方法就是要不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人，不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科学问题上，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但也不要固执己见，以为我就是高明，就是正确。你可能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是不是你想到的就都是正确的，那也不一定，

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同上下左右商量商量。我们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是一个人不断进步、做好工作的保证。学问学问，既学又问。自己读书、实践，还要问别人有什么好的看法、心得和经验。要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为我们的习惯。现在有些不习惯，似乎别人提点意见就是对我过不去。《论语》说子路“闻过则喜”，他不一定做得到，我们共产党人却应该做到，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应该做到。你有过，人家指出来，对你有好处，你改了就好，使你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怎么就不应该喜呢？怎么人家一提点不同意见就不高兴，发脾气，甚至给人家穿小鞋呢？让人家天天吹捧你，说你的好话，在你的周围养成那么一种低级趣味，我看非跌跟头不可。

七、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搞派性，一定要增强团结。我们党不团结，怎么能有生命力、战斗力？无产阶级就是靠它的坚强的组织，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们每个同志就是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团结。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不是敌人，不是不改，我们的政策就是团结，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进步，不

是打倒他。

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就有一个顾全大局的问题。要安定团结，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要提高党的威信。凡是削弱、丑化党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首先是对党中央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党中央，当然是一个好的党中央，马列主义的党中央。有的人硬说我们党中央搞修正主义，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对此应该据理驳斥。某些外国人总在那里挑拨离间，说我们的党中央是不团结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总希望我们坏，不希望我们好。我们要警惕这种情况，在说话、写文章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宣传时，时时刻刻要想到如何照顾大局，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现在，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利益的大问题，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也有重大影响。在毛主席的问题上，有两种感情用事都是不对的。一种是不肯承认毛主席犯过错误、他的某些著作当中有错误，一讲毛主席有错误就受不了。这还是个人迷信，思想僵化。我这个人长期有这种感情，我也知道毛主席不是没有错误，他在大会上做过自我批评，与少数人谈话时也做过自我

批评。可总有那么一种感情，不愿意人家讲毛主席的错误，讲了就觉得心里不好受。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科学的态度，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反过来讲，也不能有另外一种感情，因为毛主席犯过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自己挨了整，就讨厌毛主席，否定毛主席，不愿意去学习毛主席的东西，正确的也不去宣传。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团结起来向前看，应该有一个大前提，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嘛！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或者做其他工作的，总要顾全这个大局。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原来写的是在开封“逝世”，后来改成“病故”。因为“逝世”有几种可能，可能病故，也可能被打死，所以按照事实明确改成“病故”。就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细节上，中央领导同志也是煞费苦心，考虑周到。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就愿意发表一些凄凄惨惨的东西，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权衡一下对党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利多还是害多，不能只凭个人感情驱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不考虑对大局的影响如何。

八、开动机器，解放思想。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还有哪些思想没有解放，还有什么禁区？要进一步探讨。大家要开动脑筋。中央宣传部要给中央当参谋，

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中央给我们解决，只照着去做。我们要给中央反映情况，提建议。当然，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我们大家要动脑筋，特别要研究那些在理论方面需要解决而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要下苦功，读书，调查研究，想问题，同别人交谈座谈。总之，把宣传部的工作做好，我们宣传部的每个同志都有责任。当然，主要责任在领导。大家都要关心，不要仅仅限于自己分工的那一点事，对整个宣传战线的工作怎样做，也应该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解放思想是没有止境的。解放思想是人人有责的。任何同志不要以为我的思想已经解放完了，现在是我解放你们了。新的问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很多未知的事情等着我们去探索，我们永远也不能停滞不前。

（第28期，7月1日）

要重视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

今年以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先后开展了关于树立革命人生观问题的讨论，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对于如何改进和加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大启发。

近年来，全党日愈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林彪、“四人帮”祸乱之时，青年一代首当其冲。在饱尝痛苦失望之余，一些人产生了某种幻灭之感。更多的人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迷惘，但是强烈的向上的进取精神未衰，他们渴望在新长征中有所作为。即使是有些满腹牢骚的，本质也还是想要同社会一道前进的。如何针对青年人探索人生真谛的需要，帮助他们懂得正确的人生道理，重燃起青春的火焰，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当前青少年教育工作中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一些报刊开展的有关讨论，抓到了青年思

想上这个十分敏感的要害问题，拨动了许许多多青年人的心弦，使讨论成为思想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这场讨论中，一些青年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不加粉饰地说出了藏在思想深处的真心话。即使有些话有明显的错误，我们报刊仍然照登出来，作为讨论的因缘。广大青年感到既亲切又激动。坚持“三不主义”，使青年敢于敞开心扉，说出真心话，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后的讨论中，要使青年人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真正提高思想，就一定要创设各种条件，使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把心掏出来，那怕发点牢骚，说点怪话也不要紧。只有弄清楚青年们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你才能知道其中什么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逻辑的，什么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从而对症下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这次讨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注意引导，注意具体分析，坚持平等商量的态度。不少报刊在讨论中注意到，有些青年在人生观问题上发生了苦闷，就用青年人自身的经历，以相互启发教育的方式，有说服力地告诉他们，出路不能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宝库中去找，也不能到天主、上帝的宗教灵光中去找，还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去找。今后，报刊要继续发表不同意见，做到有争辩，有交锋，允许七嘴八舌，热

气腾腾。这种争辩和讨论对青年们会有很大好处，可以使他们自己看到：在我们的社会里，既有弊端，也有与弊端作斗争的力量；既有骗子手，也有高尚的人；既有黑暗，也有光明；而且逐渐真正地看到后者是占着上风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前者和后的争斗并不总是势均力敌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这次讨论，许多文章不是教科书式的空洞说教。过去，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习惯于这一套，实际效果历来是不好的。现在报刊上充满了青年人自己的声音，而且不断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奇峰突起，有波澜，有起伏，显得生动活泼。有些青年开始还有点担心，怕讨论又是一个“阳谋”。事实证明不是如此。应该公开向大家讲清楚，讨论不是围剿。实践证明，过去那种有意无意地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之类的搞法，是失信于民，有害我们事业的，今后决不能再用。

正在进行的讨论对于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和仔细的区别。分析，就是讲道理，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只要把道理讲得透，讲得有声有色，入情入理，真正说到了青年的心坎上，青年就心悦诚服。事实表明，绝大多数群众和青年是讲道理，讲实际的。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客观真理的东西，终究是会被绝大多数

人接受的。这次讨论没有急于做总结，不要求拿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甚至到讨论的最后，也可以有不同的答案。过去那种以讲真话开始，以做检讨而告终的讨论，是脱离广大群众的。某些错误的思想，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因素。那怕只是一星火花，我们也要给予肯定，并使之发扬光大。

另外，在讨论中，一些报刊还注意到了帮助青年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要看到青年人中间存在的许多问题，固然有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毒害，有社会弊端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有许多问题是同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陷有关的，特别是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青年们在升学、就业方面，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面临着许多的困难。这一切要分别情况，推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尽可能予以妥善的解决。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同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那就可能变成空谈。

人生观、人生意义的讨论，是我们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课题。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密切关心，帮助有关报刊把讨论正确地、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并且注意充分利用报上的材料，配合对青年进行生动活泼的、有的放矢的、耐心细致的教育。

（第30期，7月10日）

汪锋同志谈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问题

汪锋同志今年四月下旬在新疆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全面贯彻宗教政策的部分，现在摘要刊载如下：

目前出现宗教热和违法宗教活动增多的新情况，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破坏党的宗教政策造成的恶果；加上近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加强了反宣传，穆斯林长期压抑的宗教情绪爆发了出来。多年来，我们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教育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从许多地方的情况看，凡是宗教活动严重的地方，一是那里的宗教势力比较大，影响比较深；二是一些基层干部支持和带头参加宗教活动。因此，对此只能因势利导，不能采用强行压制或放手不管的做法。围绕这个问题，我讲三点意见：

一、全面地宣传贯彻党的宗教自由的政策。宗教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是三、四十年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科学不发达，人们生活贫困、愚昧，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不理解，就容易相信宗教。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不变的。在宣传上，既要宣传信教的自由，又要宣传不信教的自由；既要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保护现有的礼拜寺，又要保护不信教或放弃宗教信仰的人的正当权力。这样宣传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就全面了。

有人若挑起宗教争论，我们可以拿科学、拿无神论和他争论。宗教最害怕科学，有次我们预报某月某日某时出现日蚀，一个宗教头子就故意把时钟往回拨了二十多分钟——他怕人家说神完了。科学发达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宗教就不好哄人了，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就淡薄了。

在目前，应允许信教群众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在没有宗教活动场所的地方，可以有领导、有计划地开放一些挪作他用的礼拜寺，免得他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朝拜或捐款盖新的，劳民伤财。因为这是在伊斯兰教信仰区，应满足他们进行信教活动的要求。

二、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党的统战部、政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关心和管理宗

教事务。对于正当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对于利用宗教活动，散布错误言论的，要加以教育；对于利用宗教进行诈骗财物、奸污妇女、散布谣言、破坏民族团结的非法活动，要坚决地给予揭露和制裁；对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厉打击；对经过维族干部和维、哈族宗教界人士同意已被取缔的反动依禅教不准其恢复活动，非法进行活动的坚决取缔。

对从事正当宗教活动的阿訇的生活要给一定的补助。过去有个制度，每年由政府拨一笔钱专门给那些阿訇补贴生活，“四人帮”给搞掉了，现在应恢复。一个阿訇，他不作坏事，就是给群众念个经，你不给他生活补贴，他没生活出路，只好到群众中去敲榨。对于那些对经典有研究、造诣比较深的守法的阿訇，应作为知识分子对待。

三、共产党员不允许参加宗教活动，对暗中支持或带头参加宗教活动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我们也不允许在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传授经文。当前要加强无神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要让群众最终知道，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不是胡大，而是党的政策和各族干部；乃玛孜做得多，工分就挣得少。

总之，只要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加强

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就可以把当前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引入正确的轨道。

（第 31 期，7 月 16 日）

李维汉同志谈 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各地正在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下面是人民日报文艺部整理的一个材料，本刊转载前曾送请李维汉同志审订过。革命回忆录、纪念文章、传记和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文艺作品的写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应该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实事求是，不事夸张，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出于各种原因，有的书籍文章，在某些情节上拔高，编造的现象确实不少，影响不好。请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报刊、出版部门认真研究李维汉同志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应该要求作者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在写作中认真调查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重要的文章，书籍要先在内部广泛征求意见，有的还要经过有关部门核准，不要匆匆忙忙发表、出版。

最近，李维汉同志在同一些党史工作者座谈时谈到，目前有的传记、革命回忆录写得不够真实，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有拔高、编造的现象。他说：“写历史就是一个写人，一个写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写人也好，写事也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现在写人物，我看有些问题。”

下面摘录的是李维汉同志谈到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宣传毛主席的问题

烈士传《夏明翰》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夏明翰同志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亲自培养和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好战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夏明翰先后担任过湖南学联的领导工作和中共湖南区常务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这里没有看见党，只是毛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培养。毛主席不在湖南，而夏明翰当了好多年湖南省委委员，以至于当常务委员，以后又当湖北省委委员，都是毛主席提拔的，这样写好不好呢？毛主席变得有这样大的权力，上无中央，下无区党

委？夏明翰做湖南省委委员，后头做湖北省委委员，都是毛主席提拔的，这不是上无中央吗？这是歪曲了毛主席。毛主席不是这样一个人。毛主席是很遵守组织原则，很守纪律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本书，是写蒋先云烈士的。书上说：蒋先云是毛泽东同志“直接介绍”入黄埔军校的。实际上是湖南区委派他去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一成立，各省每期都派人去。中央有个通知，要选择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共青团员以及优秀的非党积极分子去，总之要选好的送去。蒋先云就是很好的党员，陈赓也是我们送去的。送了好几次，我们遵照中央的决定，送了好多人去了，每一期都是如此。

还有写田波扬同志的《青春似火》，这本书有个错误，可能是出于粗心造成的。书中说：一九二一年田波扬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新民周刊》中的许多文章的启发和鼓舞下……。《湘江评论》出了几期，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这里讲田波扬一九二一年受到这个刊物的启发和鼓舞。隔了两年，受启发和鼓舞当然也可以啰，但使人感到有些牵强。另外，这个《新民周刊》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我编的《新民周刊》，那是国民党的刊物，虽然内容是革命的，但它是一九二四年才出版的。如果是那个刊物，那么这是

个虚构，没有这个事。而我记得毛主席又没有办过《新民周刊》。

还举个例子。写柳直荀的小册子中，柳直荀筹备各省农协的这一段我看是写得不好。写成柳直荀的上面就是毛泽东。柳直荀至少是在党委领导之下，实际上是在省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柳直荀上面还有一个易礼容，他是农协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省委委员，这个都没有，就是柳直荀在那里一个人干。别的地方，还有写柳直荀一九二三年就入党了，以后易老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不是事实，把党完全丢了。

上面讲的是宣传毛主席的问题。象这样一些例子，是不是符合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是不是正确地反映了毛主席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个关系中间的正确的地位？我还看过一些其他领袖人物的回忆录、影片、话剧等，过分夸张、突出个人的情况也不少。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想一想。

二、如何写传记的问题

列宁讲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一条非常重要，烈士都不是今天的人

物，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写烈士就要考虑他是那个时候的人物，那一个历史条件下的人物，这就不要按政治气候的变化，去拔高或者贬低他。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比如对陈独秀，有的文章一开头就骂得他狗血淋头。陈独秀参加过我们党的创建，大革命时期犯过路线错误，但还是党内的问题，以后性质才变了。我们都犯过错误，毛主席也犯过错误。《西行漫记》中讲毛主席受陈独秀、李大钊的重要影响。他讲的那个影响，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果把那个时候的陈独秀否定了，那我们党七年中的领袖是个坏人，我们党岂不成为糊涂党了？选那么一个人作党的总书记，岂不是糊涂吗？

现在有的作品我看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写文化书社没有易礼容三个字，而这位易礼容，从文化书社筹备起，到文化书社封闭，七年之间，他都是经理，不写他的名字，也是看政治气候嘛。写夏明翰，说是何叔衡向毛主席引见的，事实上不是何叔衡引见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引见的。为什么要写何呢？大概是何的名誉好一点。我替这种作法安个名字，叫做“沾光”。写夏明翰，有个地方还写了我哩。一九二七年冬天，我奉中央命令，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到汉口见到夏明翰，这是夏牺牲以前两个月，我们在武汉法租界的一

个旅馆一起度过阴历除夕。那时，武汉白色恐怖很厉害，郭亮在作书记，只有他租了一栋房子，其余的人都没有地方住。夏明翰是省委委员，还住在湖南的一个商号里。我化了装，戴了一个瓜皮帽子，蓄着胡子，穿着马褂，拿着算盘，打扮成商人。郭亮和夏明翰除夕到旅馆看我。后来，郭亮走了，夏明翰跟我留下，的确是买了一瓶白兰地，两个人谈到天亮，白兰地也喝完了。我跟一个访问我的同志讲过这事。可是，现在呢，变成这样，把我们的谈话打了引号，好象这是引来的文字，我就搞不清楚了。这段引文是这样的，夏明翰说：“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我们应该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照着毛泽东的路子走下去，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光明的新中国！”然后李维汉同志说：“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正确，这也是要经过实践啊！”这个话错了没有呢？单看话也没有错，可是那个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啦，我们没有这个语言。我没有，夏明翰也没有，这怎么来的？我不晓得。

现在讲一讲杨开慧烈士传。杨开慧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但是这个传呢，写成这么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活动，她

都是得力助手，这恐怕不那么合乎事实。杨开慧同志我不太熟悉，熟悉得很的是易礼容同志。我看到的杨开慧同志是很斯文的，幽娴贞静，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内助，但在政治上是不是她都是得力的助手呢？就不好这么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烈士传仿佛是写得越长越好。我觉得还是不要数量第一，要质量第一。最近，我看有本传记书的增订新版，比以前的那本多了一、两倍，多是些议论。我看，写传不要求长，还是实实在在，以实取胜，不以数量取胜，不以花俏取胜为好。

在北京，我看了几本烈士传，还有一个感觉：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而且，都是很顺利地成长的。写一段就加一段好评语，然后又一段，又加一些好评语，就是这样一步步升高。这不怎么好，好象在造神。

三、有些写真人真事的戏不符史实

写戏、写小说是可以虚构的，这没有问题。但写真人真事在关键问题上不好虚构，一虚构就变成编造了，事物就可能变质。

《杨开慧》这个戏里写了陈独秀有个女秘书，这个女秘书一出场就是不好的，邪里邪气，一直到最后变成了特务，到杨开慧家里去捉杨开慧。作者为了衬托杨开慧，衬托他所虚构的杨开慧在农民运动中的杰出形象，再虚构这么一个女秘书。他没有去想，写一件事也好，写一个人也好，要照顾到我们党的根本利益。他是实用主义，为了写他那个戏，他采取了女秘书这么一个虚构。这个虚构坏在哪里？坏在把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面貌抹黑了。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当时还是党的总书记，他不能到街上去随便找一个他喜欢的女的来做秘书啊！有个组织在那里嘛，应该是由组织部或者秘书处去给他选一个。还要审查历史，那个时候是严格的，审查清楚了然后去作总书记的秘书。而现在这个女秘书是杨开慧的同学，而且是同坐一个桌子的同学，一出场就不好。当时的秘书，是男的，不是女的，是共产党员，现在还在，八十岁了。我们有许多同志谈陈独秀的事情还去找他，在武汉时期他就是秘书。创作的同志，不要这个秘书，要另外创造一个。戏嘛，是可以创造的，但是创造了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党中央的路线是陈独秀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组织面貌又是这个样子，我们党的中央简直是不象话了！老实说，这就损害了我们党

中央的组织面貌。

看见有的戏剧，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马日事变”后，要湖南来的同志回湖南搞武装暴动，这也不符合事实。当时中央处理湖南事变是和平解决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也赞成和平解决。即使他并不赞成，但他是中央农委负责人，也不会单独行动的。

下面再举几个不符史实的例子。

向警予同志是应该歌颂的。她做过很多工作，是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但是歌颂要符合事实。有一个纪念她的戏叫《中原烈火》，开幕前一个同志作介绍报告，说向警予同蔡和森、周恩来在法国组织共产党。这是没有的事。蔡和森和向警予在共产主义小组时代，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一大后即加入了党，历史地说，也是属于共产党的创立者的行列，但他们在法国并没有来得及参加组织共产党，却是事实。还有一篇纪念向警予的文章，说她紧跟毛主席，时间是指的二十年代，怎么二十年代就存在着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呢！？

听说湖南还有一个演郭亮的戏，说“马日事变”以后，他在岳麓山开了一个会，决定农军攻长沙。这也是没有的事。他的爱人证明，他第二天就离开长沙，接着到了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去了。

现在有这种现象：你那个书上写了的呀，我这个

书上把它拿来就是，互相抄袭，听到什么，那个地方有一点，我就拿过来；还有，适合我用的就采用，不适合我用的就不采用。

有的作者有时候为了要给某一个人物或某一桩事情显名，写的时候，就以莫须有的关系，去跟那个有威信的人物牵一根线，挂上一点，这本书也就沾了光了！这样的事情，要不得，可是这样的事情不少。

强调真实，并不是主张客观主义，也不是要搞烦琐考证。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32期，8月1日）

思想工作始终是宣传工作的中心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宣传工作的重点当然也要同时实行这种转移。但是，它的中心仍然是思想工作。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方面的思想工作就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党的宣传干部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需要了解和研究，但是他毕竟不是经济建设的直接组织者、管理者，他是宣传者、鼓动者，因此所要着重研究的仍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情况。例如，实行这种经济政策，群众有些什么想法；实行另一种经济政策，群众又有什么想法；有些什么思想倾向障碍着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障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等等，这些都是党的宣传工作首先要关心的。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共

同目标。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一个企业、一个经济组织要有自己的前进方向、目标、前途，要有统一的认识，而且整个社会、各个部分的成员都要有。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向党员和群众宣传我们的前进方向，说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说明我们的方针和前途是什么。只有使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了解这些情况，尽可能取得共同的认识，才能做到步调一致。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向全党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也是向所有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党员、群众提出的要求。

我国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就更要求把思想工作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目前这个时期，情况变化非常快，非常激烈，非常复杂。在国内的范围里，党的工作任务变了，工作方法变了，判断问题的标准变了。同时，也发生很多社会问题。经济建设发展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有多种多样的曲折。在我们社会生活里面，一方面大有希望，另一方面也存在失望；一方面我们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另一方面，又仍然存在一些相当严重的不安定的因素，出现许多严重的犯罪活动。我们与犯罪活动进行了紧张斗争，一方面收到成效，另一方面问题还不断产生；

斗争是长期的。在国际关系上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变化。过去曾号称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现在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反对我们；曾经同我们在政治上发生严重冲突的国家，现在同我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曾经被我们当成修正主义代表批判的党，现在和他们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往来，这种往来与建国初期的涵意也不相同了，它逐步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国家、我们社会、我们党遇到这么多的变化，反映在思想方面，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成年也好，青年也好，都出现一系列问题，是丝毫也不奇怪的。群众中的各种各样问题，党的宣传机关不可能全部解决，也不可能提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但是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应该提出解决办法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提出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就有愧职守，没有尽责。

还要看到，在世界舞台上，敌人和我们的斗争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在诉诸武力无法奏效时，他们会把重点放在从意识形态方面向我们进行斗争。这更要求我们宣传部门认真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总之，思想工作，无论是从内部需要还是对外需要来看，始终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中心。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个方面来，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不断

变化的情况，及时提出问题和意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推动全党来抓，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紧紧循着党的路线胜利前进。

（第33期，8月13日）

多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批转一位同志写的调查报告时，指出：

现在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舞干劲，刷新文风，都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

希望各地报刊引起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多发表一些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的调查报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33期，8月13日）

关于电影《武训传》问题

一九五一年曾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过公开批判，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有这篇社论的节录）。最近有的同志提出要重新评价这部影片。说《武训传》的主流基本上是好的，对它的批判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武训传》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不好的，当时公开批判，对于教育劳动人民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次批判有过火的地方，涉及的人较多，今后应作为教训吸取。现在如果重新评价这部影片，再来翻腾，是不妥当的。

（第33期，8月13日）

陆定一同志谈理论学习问题

现将陆定一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讲话刊载如下。

现在理论空气还不浓，应该很好地学习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行动上就会动动摇摇，掌握不住正确的方向，就要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具体讲三点意见。

一、建议大家看看《列宁选集》第四卷。我主要讲三篇文章。

一篇是《青年团的任务》。这是共产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到现在还有很大的意义。这篇文章，“四人帮”曾经利用过，引过。他们为什么要引？因为这篇文章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要改造旧的。这方面，“四人帮”很强调。实际上，“四人帮”上台时，我们对旧教育、旧文化的改革早已基本完成了。所以他们引的那些东西，对于我们已经是做过的事，

没有多大意思。“四人帮”是为了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他们把这个叫做“文化大革命”）而引用这些过了时的话的。从这里要得个教训，理论必须与实际联系，而不是象“四人帮”那样不顾实际情况，背诵教条。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是列宁这篇文章中关于建设方面的东西。这篇文章中关于建设方面讲的话很多，只讲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建设要了解全人类过去的文化，并加以批判。人类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奴隶社会有文化的不是奴隶，奴隶没有文化，有文化的是奴隶主。封建社会也是这样，地主有文化，农民只有一点文化，很少。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子，知识分子当然有从工人阶级出身的，但是很少，很多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假如说剥削阶级文化都不要，那就没有多少文化了，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文化了。“四人帮”说只要盗跖的文化，只要法家，在他们看来，法家好象无产阶级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皇帝，但说好皇帝（特别是吕后、武则天）都是法家。他们使文化建设遭到毁灭性的灾难。《青年团的任务》这篇文章，讲这一点就够了：要了解全人类过去的文化，加以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读的书很多。比如马克思写《资本论》，就读了很多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加以批判，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哲

学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哲学，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而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第二篇，《论粮食税》，建议读一读。粮食税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解决了。这篇文章重要的是讲到五种经济成分。关于五种经济成分的一段中，我们要学点什么？要学的是两种资本主义经济。一种私人资本主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要加以消灭；国家资本主义则不同，可以利用，不仅可以，而且必要。这和林彪、“四人帮”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一切资本主义，有原则区别。这篇文章可以开阔我们的思想。现在我国乡下有集体所有制，城市也有了集体所有制。少数地方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搞得适当，那是对的。城市里如服务行业，也会有些个人经营的东西。列宁列举国家资本主义有四种形式。一种叫租让制。利用外国资本，国家同他们订合同，规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许做什么。我们现在引进外资，同租让制差不多。第二种叫合作社。那时是一九二一年，苏联的农业还没有集体化，社会上只有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列宁把合作社归在国家资本主义里边。第三种，出佣钱，雇用资本家推销产品。第四

种，和本国资本家订立合同，仿效租让制，让他办企业。就是这么四种。利用国家资本有什么好处？可以学到管理方法，学到技术，可以利用本国和外国的资金，可以取得产品。当然这里要给资本家赚去一部分钱或产品，还有困难，有斗争。学《论粮食税》，我个人看法重点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又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过去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目的仅在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很成功，后来统统变成国营。但是，连小的夫妻老婆店都搞成国营，吃了些亏。现在我们才真正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准备长期利用。“四人帮”根本不区别两种资本主义，想消灭一切资本主义，过早地实行这东西，不合列宁主义。

第三，在《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列宁特别强调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写了好多篇文章，再三强调这个问题。那时，苏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同时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的监察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还有一个工农检察委员会。我在苏联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人作监察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工作似乎没有做好，看来是因为没有权，或者没有办法行使职权，没有得力的干部。后来苏共把党代表大会选举监委的做法改变了，改为中央监察部，成为党中央的一个部了。这样，地位低

了，权也小了，做不出什么事了。我们党现在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不是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的纪委由中央全会选举，各个地方的纪委由地方党委选举，纪委是在党委领导之下的。看起来列宁那时的主张，实行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困难，监督非常重要。这一点我看不会改变。特别是对主要领导人们的监督。主要领导人们受监督，这件事最不好办，但也最重要。我有一次发言讲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的话，总有一天我们干部会爬在人民的头上。现在中央订了一些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不搞干部的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这些，不仅中央要实行，地方也要实行。中央是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制订这些制度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有的书记做了十年，问题就来了。

二、要学《毛泽东选集》。耀邦同志讲了，《毛泽东选集》还要加以修订。从第一卷到第五卷，有些应该放进去的文章没有放进去，有些不应该放进去的文章应该拿出来。《毛泽东选集》中，对于今天有重大关系的，我举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篇都是很重要、很好的文章，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非常有用，到现在还

是好文章。还有《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这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毛主席作的两个报告，现在应该读。这是讲反对主观主义，讲方法，讲党风、学风、文风的。

三、建议大家学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现在搞四化，宣传部门的同志，所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懂不好。薛暮桥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比较系统。第一，薛暮桥同志既懂理论，又有实际经验。开国以来他一直在搞统计局，掌握了实际的材料，有许多材料我们不知道。比如，中国的农业开始是上升的，到什么时候增长幅度下降？我印象中是一九五九年，他说不是，是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增长的幅度就下降了。象这一类的材料这本书中很多，他懂得这些材料，我们不懂得，不知道，向他请教请教很有好处。第二，他敢于指出成绩，也敢于指出缺点错误。什么时候犯了错误，犯什么样的错误，结果怎么样，他敢讲。当然也不是说这本书完全好，他自己也不认为是完全好的。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全部的问题还多得很，光有这一本小册子还解决不了。这本书现在看起来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我想我们所有宣传干部，所有的主要负责干部，要搞

四化，是不是提倡都看一看这本书，精读它一遍。书里如有错误，可以提出来嘛。

刚才我讲的各项：《列宁选集》第四卷、《毛泽东选集》、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要学的不只是这些。比如，法律要不要学？要学。搞工业、农业，搞经济的人还应该花工夫读一读《资本论》。还要学点科学，学点技术。初学的人，当然要学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

理论教育工作，正在改进。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第34期，8月20日）

保持清醒头脑， 认识资本主义弊端，避免盲目性

（我驻日使馆参赞陈抗同志对留日学生谈话的一部分）

这份材料是李先念同志发现和推荐的。先念同志批给耀邦同志有这样一段话：“陈抗同志对日本很有研究，这份简报可以印发给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阅，作为参考资料。”耀邦同志看后，要我们在《宣传动态》上刊登出来，请各宣传口同志推荐给你们的负责同志看看，作为教育干部和青年的一个参考资料。

中央宣传部

日本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科技、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战后三十多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67至68年间就超过英、法、西德，

仅次于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号称经济大国。它的石油制品、粗钢生产、汽车工业、电力、铝和铜的生产居世界第二位，造船量则居世界第一位，其它化学工业、电气制品、钢铁生产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等都名列前茅。对外贸易几乎是每五年翻一番，去年进出口总额达1,922亿美元。此外，日本经济的经营管理也十分科学，质量管理十分严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由于在日本学习的客观条件比较有利，近年来我留学生在学习中都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同志由于强调了向日本学习，就片面地认为日本一切都好，什么都应向它学习。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一切事物都应一分为二，尤其是日本，更是如此。我们在日本呆过多年的人就常常看到，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原子发电站或号称世界第一的大桥举行开工典礼时，要请日本神社的和尚来念咒，驱鬼之后才能破土；开最现代化的“新干线”电车和飞机的驾驶员，身上还要带着从庙里买来的护身符；人们见面九十度鞠躬彬彬有礼，但在家庭里殴打妇女却是家常便饭，电影电视上这些镜头是司空见惯。所以我们常说日本是一个先进和落后、高度现代化和封建迷信、文明和野蛮并存的国家。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

制度固有矛盾引起的种种弊端，更是俯拾皆是。千万不能一看到高楼大厦、高架电车、高速公路，就五体投地，而忘记它一旦断油、停电，整个社会就会瘫痪；不能一看到街道整洁、生产秩序井然、效率高，就对日本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资本家的“以社（企业）为家”的口号也予赞扬；也不能一看到商店里百货琳琅，大街上人们西服革履，就认为日本“物资极大丰富”、“全民富裕”，而忽略了其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我们要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区别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同，充分认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使我们在日本学习、生活中避免盲目性。现就如何认识日本社会讲几个问题：

一、日本是一个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激烈的吃人社会

目前，日本大肆宣扬它是“自由世界”，我国少数青年也认为日本是“自由化”的国家。其实，它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广大劳动人民只有受剥削的“自由”。大资本家高喊竞争自由，大鱼吃小鱼，中小企业则有失败和破产的“自由”，工人则有失业的“自由”。所以“自由”是假，广大人民卖身给垄断资本是真。

战后日本由于美国占领军“解散财阀”（家族封建式的财阀），变成了典型的金融垄断资本。目前日本六

大财团就是以银行为中心而形成的，它们集中了绝大部分的资金，控制着日本的经济命脉。这六大财团是：第一劝业银行、三菱、富士、三和、住友、三井集团。据一九七一年的材料统计，它们所控制的核心企业约为 167 家，占全国企业总数不足 0.02%，但总资产占全国企业的 42.6%，资本额占全国企业的 28.6%，营业额占 33.2%，而职工人数却仅占全国的 9.5%。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目前这些财团的资本更加高度垄断化了。

日本每年公布一次亿万富翁的名单，去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 50 人中，有 25 人是公司的大老板，6 人是土地、股票投机商。前年年收入最高者达 37 亿 6 千 4 百万日元，比当时日本的总理福田收入（5 亿日元）要高出六倍多。据日本国税厅统计，七七年工资收入者 3,115 万人中，年收入在 100 万日元以下者 320 万人，占 10.3%；年收入在 100—200 万日元者（200 万日元为日本最低课税标准线）为 1,074 万人，占 34.6%。完全失业者几年来一直保持在 110 万上下。仅就这些统计来看，日本人民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以下者超过 1400 万人。

这些显然被缩小了的官方统计说明，战后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虽较战前有了较大改善，但处在垄断资

本统治下的日本社会，两极分化是十分激烈的，特别是富者处在恒富状态之中，而广大人民群众相对贫困化却在加深。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处于无权地位，而且日趋濒于灭绝的境地。另外类似印度贱民的“日本部落民”一直受到歧视，他们大约有6,000个部落，300多万人（从无准确统计），其中70%收入很低，无论在就业、升学、居住、甚至通婚上都受到限制和歧视。在社会上为了求生，他们常常隐瞒自己的身份，但一旦被发觉就被开除。至于东京的山谷、横滨的寿町、大阪的釜崎三大贫民窟，更是日本“经济大国”的耻部，聚居在这里的流浪汉们只能以稀粥度日，一入冬季，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下“自由”地死去。

广大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比起劳动人民、工资阶层要好些，但是它们面临垄断资本的压榨，处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影响下，每天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不定那一天经营不利，财源拮据，就会倒闭。据统计，中小企业每月宣布破产者几乎都在一万件以上。

二、日本借钱成风，是一个谁都借钱的“信贷国家”

日本从个人到企业、从团体到国家都借钱，同时

大家也都设法存钱，但主要的是借钱。在日本，好象不借钱的人是傻瓜。

战后日本企业的“自己资本”越来越少，“他人资本”（主要是银行贷款）越来越多。除个别企业如丰田汽车的“自己资本”占50%以上，几乎所有企业的“自己资本”都维持在20%左右，最少的有时仅13%。据七七年统计，全日本私人企业的自己资本总额是535,410亿日元，负债总额为3,411,440亿日元，两项相比，前者为13.6%，后者为86.4%（美国则分别为57.8%和42.2%）。此项负债总额相当于日本七七年国民生产总值1,864,430亿日元的1.8倍，相当可观。

企业负债，国家也负债。仅从一九六五年度至一九七九年度的累计来看，国家发行的公债已达56万8千亿日元（相当于2,500亿美元。美国国债今年三月为止为7,980亿美元）。到一九八〇年度则将达70万亿日元，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七九年度预算的1.4倍。国债增加最快还是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机以后的事，这些年来日本国家预算收入中几乎有30—39%是靠发行国债。一九七九年用以偿还国债利息的金额为四万亿日元，为预算支出的10.6%。这个数字相当于该年度文教科学支出总额，等于两个国防预算的金

额。至于 47 个都道府县地方政府，除个别外，财政收支几乎都是赤字，同样是靠借债度日。

日本的家庭，同样欠债。据统计，总户数的 47.4% 是负债户，平均每户有 140 万日元（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的债务。

所以，日本看起来十分繁华，车水马龙，霓虹灯通明，到处可以看到吊车，脚手架，兴建新的工程，其实是负债累累。大家都在玩别人的钱，玩得好，就发财，战后不少暴发户就是这样“发”起来的。但是也正象我们的一句老话：“玩火者自焚。”一旦玩得不好，就会企业倒闭，个人破产。企业倒闭后，或被拍卖，或被合并。个人破产后被净身出户，有的全家自杀。日本有些企业的名字很长，什么“兼松江商”啦，“日商岩井”啦，“山下新日本”啦，都是被吞并、合并的痕迹。日本的六大垄断集团，就是通过不断吞并其他企业逐步形成的。

由于日本是一个庞大的“信贷”国家，银行业特别发达。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名称的银行、金库，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赊销、延期付款的商店。而放高利贷的、开当铺的，更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些就象是一个庞大的吸血机器，以不同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同广大人民的血管连结着。至于国家，那就公开

以税收名义大刮民财。什么直接税、间接税、国税、地方税、所得税、人头税、继承税、赠予税、流通税等等，应有尽有。去年大平首相由于宣布增收消费税受到朝野上下的攻击，甚至影响了大选结果，说明了日本税收之苛之重。

三、日本是一个高度商品化了的社会

上述种种，说明日本的国家、企业、个人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钱，是真正地“向钱看”。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把劳动力做为商品出卖。实际上日本的一切都已商品化了。如果说经济领域里、经济活动中的商品化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今天日本的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活动同样也是商品化了。在政治上，当官为了发财，天经地义。日本政府阁僚一般都是国会议员，因此，日本大选、参院选举，是一场最大交易。各党、各派竞相拉人、筹款。已退休的政府高级官员、社会名流、甚至名艺人、名棋手等等常常成为竞选中的争夺对象，被高价收买用以充数。所以，日本的竞选是“竞钱”，参加竞选的大体每人所有的竞选投资需5亿日元，当选后贪污刮财以收回成本则是常情。选上议员后，就要向其所属各党争美差、争肥缺，以此去获取更高的“利润”。因此，日本战后的大贪污案件中无一不涉及国会议

员，其原因即在于此。

至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吏，一般都是利用本身的职务作为发财手段，同时也把做官作为退休后进入民间企业的阶梯。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人事院公布：去年有 233 个政府退休高官转入“财界”。此数字比前年增加 18%，其中大半是转入与其退职前职务有密切关连的企业。如大藏省（财政部）退休官僚转入金融界者 47 人，其中最多的为“相互银行”、“信用金库”；农林水产省官员退职后进入食品公司、粮食保管业者居多。运输省下来后则到航空、海运公司任职。有的高级官僚则当董事、社长，如通产省原次官和田敏信去兴业银行当顾问，原外务次官有田圭辅去国际开发事业团当总裁；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去第一劝业银行当顾问，小川平四郎去住友商事当顾问；科技厅官房长半泽治雄则去石油资源开发当董事。至于历年到二流企业当副职掌实权者，则更不计其数。这一现象在日本舆论界中引起谴责，因为这往往是企业、公司对这些人过去在职期间给予“关照”的一种“酬劳”，又要利用他们的老关系为企业做出“新贡献”，纯系一种交易。

在文化方面，画家的一幅画，作家的一部小说，也常常是被当作商品对待的。许多作品粗制滥造，目

的就是卖钱。卖出名后，随便画上几笔，随便讲上一席话也能成为生财之道。日本的私立大学同样是商品化了的。学校本身，日本人都称它为“学校产业”。学校收学生是为发财，学生上学是为了买文凭、赚工资，因此学校是按你将来能赚多少而收费。今年开始，高中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已从去年的五十万上涨为六十万日元。大学中名牌学校、医科大学学费更高，私立的早稻田大学理工科第一年交七十二万学杂费，最高者如东京女子医大第一年交费一千一百万日元，外加“捐款”五百万日元。因此日本的私立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多，也是这个道理。其中如日本大学，学生有十万人，每年毕业生举行典礼要在容纳一万五千人的武道馆举行，日本人称它为“大量生产”典型。

被日本资产阶级誉为慈善事业的各种救济团体，被誉为拯救灵魂的宗教，也统统商品化了。举例来说，正统佛教圣地比叡山延历寺，现已成为观光地，有自己收费的直达公路，有自己经营的餐馆、旅馆，是个联合企业。至于那些新兴宗教如PL教团是个开学校、办医院、开高尔夫球场的企业单位。创价学会是个大出版商。

四、社会问题成堆

日本这个社会同美欧“发达”国家一样，资本主义

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布满各个角落，渗透在各个领域。试举以下几点以说明之：

（一）精神空虚。日本除一部分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们以外，比较普遍的是处在一种茫然状态。他们没有远大理想，精神上空虚、不安，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日本社会经济国民议会出了一本书，叫《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劳动青年意识》，它的副题是“无目标社会下的郁闷不乐的一代”。通过他们的调查，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黑暗的、不安定的、颓废和危险的，占被询问者的一半以上；对现状不满，对政治漠不关心者约占56.4%。因此，人们往往把精力集中到家庭、亲友和吃喝玩乐中去以求排遣。日本教育工会把当前青少年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无”，即“无气力，无关心，无作法（礼貌）”。也有人归纳为“五无”，增加“无目标”，“无感动”，翻译成中文就是无精打彩，漠不关心，不讲礼貌，没有目标和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在统计中也说到50岁以上的人们中也确有忧国忧民之士，年轻人中也有愿意为“社会献身”之人，但这些人日本是少数，没有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二）吃喝玩乐行业大兴隆。大家到了东京，一路上看到很多“麻雀”（麻将牌）字样的店铺，灯火辉煌的“叭勤叩”弹子房，靡靡之音的“夜总会”，烟雾弥漫

的“酒吧间”，阴暗小巷里的“料亭”（日本式备有舞伎女招待的饭馆）、“吃茶店”，上映凶杀、色情片的影院，跳脱衣舞的剧场，有变相卖淫的“土耳其”澡堂，窝藏暗娼的“温泉”旅馆。

法国大菜、成吉思汗火锅、朝鲜冷面、中华料理（饭店）到处皆是，四川菜、上海菜、广东菜、北京菜应有尽有。至于甲鱼、河豚、野猪、熊肉在日本“料理”更是林立街头。啤酒公司年年搞竞饮，胜者一次喝上几十瓶，然后奖励一年啤酒券。

赛马、赛车、赛艇、赛狗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斗狗、斗牛也很兴旺；西方拳击、泰式“摔跤”场场满座，甚至把女人也弄上台互相揪头发、踩肚子，摔打卖座。日本玩艺儿看厌了，就把西洋碧眼金发女郎弄来表演。据统计，到日本来赚外汇的外国艺人一年约有两万人次，其中美国人高达三千人次。

日本书刊杂志、电视节目充斥着吃喝玩乐的内容，以此招揽顾客的广告比比皆是。

一到连续休息的日子，日本人几乎倾城而出，不是上山就是下海，电车拥挤，交通堵塞。淹死的、冻死的、摔死的、撞死的人，每年都成百上千。对此人们还是熟视无睹，照样往外跑。

女学生们在观看英国“甲壳虫”的歌唱表演时，有

的能够兴奋得气绝、失神，甚至不上学连续跟随几个城市观看。每场都得派出大量警察维持秩序，给人一种感觉好象疯了似的。那种热衷于吃喝玩乐的景象似乎世界已临末日，充分反映了日本的市民、青年男女们精神没有寄托，要求寻求某种刺激来填补其思想上的空虚。

（三）新兴宗教四起，封建迷信盛行。由于上述原因，人们精神空虚，各种类型的宗教迷信就乘虚而入。类似我国解放前落后市民阶层中盛行“一贯道”一样，战后日本新兴宗教四起，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中比较有名的如天理教，PL教团，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等皆是。其中如PL教团把天主教神道和佛教的教义“溶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号称有150万（实际有80万人）信徒；立正佼成会号称550万人；创价学会号称一千万会员。它们共同特点是一反传统教义，宣传“如其死后升入天堂，不如修得今生‘幸福’”，大搞“互助”和“福利”以笼络人心。利用日本法律规定“宗教法人”不纳税的方便，大肆榨取信徒金钱，大发横财，经济上成为“不贪财”的大资本家，政治上成为政党的“压力团体”。公明党是创价学会的御用政党；立正佼成会则是支持自民党的。

至于那些传统的宗教也在商业化，几乎每个派都

是一个小“托拉斯”。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拥有大量的信徒，每年举办法事时，都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前来合掌、跪拜。据日文部省统计，作为佛教信仰者登记的有7,500万人（这显然是个夸大的数字，可能有很多人是随便登记的）。其中最大教派如日莲宗约3,000万人，净土真宗1,400万人，真言宗1,200万人。全国各宗系拥有的寺院共72,500座。每年逢年过节时，各寺院的香火都十分兴旺，舍财捐款数额都十分可观。仅就人们抽签乞运的收入就不得了，学生升学、就业，人们结婚、祈祷发财，消灾、却病者都去讨签，每张十元，积少成多，其数可观。这种活动不仅寺院搞，连大街上都设有抽签卜运的机器，在最现代化的设施名古屋电视塔上也有。看手相、拆字算卦摊都摆到火车站旁、银行楼前。就连新日铁高炉的综合自动控制室的电子计算机上，还供有“八幡神社”的神灶。尽管这些人们不一定每人都是宗教的笃信者，更不会去殉教，但这同日本高度发达的科学物质文明形成十分鲜明、十分矛盾的对照。而特别奇怪的是谁也不感到它们之间的不调和，从未引起人们的反感，这是值得玩味的。去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权威朝永振一郎死去，祭灵仪式上，三个老和尚披着袈裟，念着经咒，祈祷朝永阴间冥福。那些大科学家们，诸如

茅诚司等也身穿黑色西式丧服，手持菩提念珠，合掌唱和，景象十分离奇乖谬，但大家都心安理得。这就说明，日本人十分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以求精神上的寄托，但却是求之不得，寻之不见，而入此途。

(四) 老人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在这种矛盾激烈的冲突中，有志之士不满现状，奋起批判；热血青年急于砸烂这座魔狱，但缺乏正确有力的领导，又误入极左冒险之途，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被孤立，被打散，被逮捕。而大部分人如前所述，无可奈何，处于茫然终日、郁闷不满之中。其中有些人则走投无路，走上自绝之途，或者铤而走险，沦为流氓暴徒，或者堕入烟花柳巷，或者犯罪。就其弊端之甚者，列举如下：

老人问题突出。日本战后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据统计，女性平均 78 岁，男性平均为 73 岁。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退休问题、老后问题。老人无人赡养、照顾，已成为日本突出的社会问题。这在高度商品化了的社会中是必然的。本来日本战后六十年代的自杀率，以十万人计，已降到 14—15 人，七二年以后又上升到 17—18 人了。这一比率在世界范围内居第九位（匈牙利第一，丹麦第二，芬兰第三）。但老年人（75 岁以上）自杀率，日本则仅次于匈牙利而居世界第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中年人的自杀率在增长，全家自杀者在增多，其办法有的是汽车里放开瓦斯；有的连房子带人一起烧毁自杀；也有的用猎枪把全家打死，然后自杀；也有的吃一顿带毒的高级河豚生鱼片把全家大小都毒死。总之方法无奇不有，但其原因都是借贷过多，偿还不了，破产自杀。

其次是犯罪趋势有增无已。据统计，一九七八年一至十一月，日本刑事案达 121 万 5 千 3 百起，比七五年同期增加 5.3%。犯罪内容以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诈骗、诱拐、绑票为最，其他如赌博、卖淫、吸毒、贩毒也很严重。特别严重的是如上所述这些犯罪行为正在向少年中蔓延。目前日本中学生出现各种各样的集体犯罪的倾向，他们搞斗殴集团、盗窃集团、摩托车暴走族（成群结伙开快车横冲直撞）、汽车暴走族等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

从统计中看出，刑事犯罪中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由吸毒、贩毒而引起凶杀、抢劫、强奸、拐骗者居多，最近揭发出的一些案件多属于此。其次是这些犯罪背后几乎都有“暴力团”（犹如我国过去的青红帮黑社会）插手。据统计，一九七八年日本全国的暴力团黑社会组织共有 2,525 个，成员有 108,700 人。比七七年增加 23 个组织。这些人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

非作歹，成为日本犯罪的祸根。

综合前述各点，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表面上很“繁荣”，但其基础是虚弱的；日本的“自由”社会，是金融资本统治下的奴隶们竞生存的牢笼。富者恒富，穷奢极欲；广大的小康阶层和劳动人民则在为改善物质生活而奔波，在相对贫困化的道路上徘徊、挣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固有矛盾在深化，在发展，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

(第 35 期，8 月 25 日)

宣传老干部新的光荣责任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不久亦将下达。这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也是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势在必行，意义深远。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各个宣传部门要认真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几十年来，我们党的老干部，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忠心耿耿，

艰苦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不少的同志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愈来愈难以适应繁重的工作。为了爱护这些老同志，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并利用自己的经验，在晚年尽可能为党做一些工作，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并且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这是十分适时和必要的。

老同志肩负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光荣的责任，就是培养新干部，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和自己的经验知识传给年轻一代。我们老同志，革命几十年了，都要想一想党在今后五年、十年的情况，要努力协助党发现、选拔、培养年富力强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优秀干部，让他们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以加强党的领导。那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少管一些具体事，多在一些方针大政上出主意、当参谋。毫无疑问，这将更有利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也是我们老干部在现阶段能对党做出的更大的贡献。

老干部当顾问，基本上丧失工作能力的离职休养或退休，这是一项新的制度，这方面我们的经验不多，在贯彻实施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必须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才能行得通。在党的会议

上，在公开报刊上，要从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老干部承担的光荣历史责任上，充分宣传设置顾问的重要意义，不断报道老干部按照党的要求，物色、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先进事例。还要发扬我党关心、爱护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敬老尊贤的美德，教育干部、群众虚心向老干部学习，尊重、支持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对担任顾问或离休的老干部，不得有任何轻视和怠慢。

（第36期，8月28日）

注意一个重要提法的变动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公开发布消息时（见八月十二日各报），一个提法有变动。

指示原文说：一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公开发表时，中央改为：“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肃清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在指示原文谈到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之后，中央增加了以下的一段话：“同时，在宣传先进个人或先进集体时，也要掌握适当分寸，不要过于集中和绝对化，防止产生副作用。”

（第36期，8月28日）

不要开“比富大会”

发动、组织生产队、社员抓富，这是一件大事。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长期影响下，很多人视富裕为畏途，至今思想顾虑很多。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分别不同情况，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规定致富的方向、道路和方法。自然也要有实实在在的典型事例去示范。有关的领导机关，要把精力放到这些方面去，不要开什么“致富大会”、“比富大会”。这种一呼隆的大会，不可能深入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助长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动辄就开大会，敲锣打鼓，发号召，呼口号，这是我们多年形成

的一种习惯。在经济建设中，不应该盲目搬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是要提倡扎扎实实做工作，认真思考，分析问题，总结具体经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第36期，8月28日)

组织学习和宣传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国内外反映很好。现在，代表们已回到各地，开始向干部、群众进行传达。会前，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等问题。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在组织学习和宣传人大会议精神时，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一、增强信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信心不足，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这只有随着我们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发扬民主，在组织上选拔人才的实际进程，进行密切联系实际的宣传教育，才能逐步加以解决。这次人大会议

开始对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对政府工作开展严肃的批评，真正显示出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使广大群众普遍感到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要广泛宣传人大会议的新成就、新气象，使大多数人进一步增强信心，使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得到鼓舞。

二、立志改革。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贯串了改革的精神。从国家领导体制到经济管理体制，凡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都需要进行改革，并且已经着手进行改革。改革应该是有领导地、审慎地、有步骤地实行，但在思想上要普遍提倡立志改革、着眼改革，树立只有改革才能前进的观念，克服保守、僵化以及其他一切妨碍改革、阻挠四化建设的思想。要通过组织学习和宣传，引导干部和群众在这方面的认识大进一步。

三、发扬民主。这次人大会议雄辩地证明，发扬民主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一项根本性措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不可分割的，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必须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进一步发扬民主。要宣传在这方面采取的积极改革措施，批评和纠正种种妨害和压制民主，搞家长制和“一言堂”等官僚主义现象。

（第39期，9月20日）

在思想政治方面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我们应该认真宣传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

官僚主义、权力过份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表现在：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

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要通过宣传教育和改革制度逐步克服和消除这一切现象。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因此，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干部队伍中间，要用积极组织学习和讨论小平同志讲话以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的办法；在公开报刊上，要结合批评妨碍四化建设的不良现象，结合各方面的改革开展宣传，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认识，增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自觉性，以便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

在学习和宣传中，自始至终要领会和掌握：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至于一些农村地区流行的买卖婚姻、封建迷信活动，要靠日常的思想教育解决，靠发展生产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解决。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分析，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

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方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同时必须注意，宣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要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要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和有极左思潮的人，接过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口号，乘机捣乱，破坏安定团结。

（第39期，9月20日）

要经常注意揭露谣言

据反映，有些地方前个时期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不注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起一些群众不满和恐慌。最近这些地方准备开展地方病的普查防治，很快就传出谣言，说由于中国人口多，中央从国外请来了大批医生，强给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打“灭种针”。不少农民信以为真，不敢让孩子上学，一些学校因而

停课；有的带上行李家具，全家外出“避难”；还有一些群众听说都是在夜里打针，吓得夜不安寝。有一个村全村二百余口人，集体跑到庄稼地里过夜。普查防治工作不得不停下来。此外，个别地区还流行一些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谣言。

有关地区的党委宣传部门要及时掌握情况，发现谣言，立即采取措施，通过有线广播、口头宣传进行辟谣，安定群众情绪，不能放任不理。更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加强经常性的时事政策宣传教育，推动实际工作部门改进工作方法，及时提出防止谣言的要求。

（第39期，9月20日）

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理论宣传

九月十九日，中宣部理论局邀集首都主要报刊理论部负责同志座谈，研究理论宣传如何贯彻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大家认为，《讲话》是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改革的论述，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有根本性的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提出一个新课题。大家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重大，涉及面广，阻力不少，思想理论界需要认真努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宣传。会上，讲了如下一些意见：

一、理论研究和宣传要有长远打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进行。理论宣传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注意从基本原理上把道理讲清楚。要能顶住各方面的阻力，切不可翻云复雨，时进时退。

二、理论宣传要注意联系群众的思想实际。为了使理论宣传收到好的效果，根本改变空洞说教、无的放矢的现象，大家建议，及时汇集整理群众中的思想问题，组织写一些针对性强的，有说服力的文章。

三、要加强理论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一些同志反映，当前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的政策决定，某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同中央的看法距离很大，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我行我素。这一方面是由于极左流毒尚未肃清，思想僵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是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忙于事务，很少学习中央文件，很少读书看报，同时也由于我们对重大的理

论问题普及宣传得不够。因此，理论工作既要继续深入提高，又要做好普及宣传，使思想理论研究成果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

四、要打破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禁区。有的同志说，现在我们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一方面却又借封建社会的历史人物、典故轶事做文章，发议论，这并非不可，但要恰当。在今天，我们能够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借鉴的地方，远比从封建社会要多得多。当然，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必须坚持批判。由于过去批“资”扩大化，至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禁区，在不少问题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资本主义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成就，比封建主义前进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引进，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经验要学习和借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管理体制和方法，它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们也应当认真研究，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我们只能在人类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从事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工作，否则就将是不切实际的。

(第42期, 10月9日)

县报大有发展前途

八月，中宣部新闻局对江苏的《无锡县报》、《吴县报》、《兴化农民报》、《淮安报》、《铜山报》，山东的《泰安县报》、《兖州县报》、《荷泽县报》作了调查。

这几个县报，创刊早的已出版五十多期，晚的只有五、六期，但都普遍受到欢迎。群众反映：县报讲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事，读起来亲切，学起来容易。有个办县报的同志说：县报也有自己的优势。一期可以刊登四、五十条消息，各个公社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一般都能及时报道。党和政府的政策能结合当地情况具体宣传。比起大报来，更能联系当地群众，指导实际工作。上半年江苏兴化县的一些社员群众，由于猪肉销售临时降价，担心收购生猪也要降价，养猪政策会变。《兴化农民报》及时宣传了党的奖励养猪政策不变，安定了群众的情绪。《荷泽县报》报道了本县吕陵公社社员牛广书饲养长毛兔的经验，赵楼公社赵王李大队妇女主任看报以后，就带领几个社员，跑了四十多里路，去向牛广书学习。现在，赵王李大队饲养长

毛兔的副业也发展起来了，养了两千五百多只。铜山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由去年的六十五万亩，扩大到八十五万亩，新稻田较多，有的生产队种水稻的经验也不足，搞好各项生产技术措施，是保证水稻增产的重要环节。为此，铜山报同县农办、县农科所等单位以及农业科技人员一起，根据水稻的生长情况，有计划地撰写、刊登了一批有关水稻田间管理、除病灭害的经验和科学知识性的稿件，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群众称赞县报“一看就懂，学了管用”，“小报是个大参谋”。有的生产队干部，兜里装着县报，经常向社员群众宣传讲解，研究生产措施。

这几个县的县委，对县报工作都比较重视。他们对办报思想、选调干部、筹办经费等问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做了很大的努力。县报出版以后，县委对县报的宣传报道工作时常过问，注意利用县报推动工作。如兴化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经常同县报的同志谈情况，并同他们一起研究宣传计划，确定宣传的典型。这位同志说：“县报能直接和群众见面，利用报纸作工作，比开干部会还直接、迅速。”江苏、山东的省委宣传部对县报工作也抓得较紧，他们都准备在近期召开一次交流县报经验的座谈会。

当前，县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亏损问题。

试办县报前，曾设想县报如能有自己的印刷厂，以厂养报，可以基本上不亏损，或者一年只亏两、三万元。现在，县的印刷厂大都是地方国营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一定的利润，如把县印刷厂划归县报，就影响上缴利润，财政、工业部门都不同意。目前，县报都是由外面代印，一张四开小报的成本高达五、六分钱。县报按周二刊，发行一万份至一万五千份计，年亏损约五、六万元。过去提出办县报所需经费由县财政解决。据了解，有的县今年的县财政只有八十万元。这样，对县财政较紧的县来说，县报的亏损完全由县里负担，显然过重。为此，江苏决定县报的亏损由文教企业财政收入退库中解决。山东有的地区或县已拨去一笔专款为县报筹建印刷厂或增添印刷设备，以便逐步做到以厂养报。试办县报，仍应坚持有条件的可以试办，没有条件的不办的原则。对已经办起来的县报，如在经费等方面确有困难，各有关方面最好能像江苏、山东那样积极协助解决。

二、县报的新闻干部很缺，需要为他们调配和培养干部。这几个县报各配有干部十五至二十人，他们绝大多数过去都没有做过报纸工作。有的县报甚至连一个做过报纸工作的都没有。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具体办法可考虑：（一）从省报和中央新闻单位抽

调部分新闻干部充实县报；（二）今后凡新参加新闻工作的干部，尽量先分配他们到县报去工作，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三）省属大专院校增设新闻专业或新闻班，为县报或地（市）报纸培训干部。最近，江苏省委宣传部准备开办新闻班，轮训县报的新闻干部。这个办法很好。

三、县报初办，需要加强指导，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中宣部新闻局准备同办有县报的省委宣传部同志一起，继续对县报工作做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争取明年上半年召开县报工作经验交流会。

（第42期，10月9日）

“让贤”的说法不好

近来一些报刊重视了老干部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很好地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但是有的消息或文章使用了“让贤”的提法，值得考虑。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是受人民的委托进行自己的工作。这种权力是不应该私相授受的。“让贤”的说法容易引起这方面

的误解。而且，这样说也可能产生谁贤谁不贤的误会，不利于顺利推行干部制度的改革。

（第42期，10月9日）

对“四人帮”组织、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

编者按：邓小平同志八月十八日的讲话再次提出：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样说是以事实作根据的。下面这则材料就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上当受骗、犯错误的人不少。粉碎“四人帮”后，这些人中的多数已先后觉悟过来了。但是，还有为数极少的帮派骨干。他们并不是一般的思想中毒，而是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总目标下行事的。经过清查之后，他们还不服输，还在搞两面三刀，甚至公开威胁：“再过十年你们要给我平反。”他们至今仍在互相串连，此呼彼应，一有机会就闹。有的人竟然贴大字报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第一、要经常敲敲警钟，记住“四人帮”组织

上、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天下并不平安。第二、对顽固干扰破坏我们工作的帮派骨干分子，应该坚决揭露，分别不同情况进行适当处理。第三、对于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更应依法查究。

据上海市委宣传部反映：在上海市出版印刷系统的一些基层单位中，有些造反派的头头和角刺人物仍在隐蔽地（有时公开地）搞串连活动，搞派性干扰，影响安定团结，抵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成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阻力。

一、坚持错误，不接受教育，不转变立场。市印十二厂的×××，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市总工会常委，被定为突击入党，取消党员资格。她非但不认错，不接受组织决定，还到处“告状”。印机一厂在处理突击入党对象、原厂工会主任×××时，他说：“我不承认，不同意，不签字。过去的检查是你们叫我写的，我上当了！”还说：“过去有过去的真理，现在有现在的真理，也许再过多少年要翻过去。”“再过十年你们要给我平反。”据印刷公司反映，处理出党的四十余人中，拒不签字者占半数以上。

二、私下串连，活动频繁，相互支持，与党较量。目前，造反派组织虽不复存在，但是，帮派犹存人未

散。一些派头头虽罢了官，丢了权，不能继续发号施令，但是，他们常常利用“红白喜事”聚集在一起，打听“行情”，发政治牢骚，研究对策。市印一厂“造反派”×××结婚，一楼招待一般贺客，二楼摆酒一桌，专让八个“造反派”头头聚在一起。去年十一月，原印刷公司党委副书记×××（犯严重政治错误）、×××（犯政治错误）在支部大会上被通过取消党员资格以后，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公司机关的几个小兄弟就普遍通知各基层单位中的同伙。

三、和领导对着干，大搞派性干扰，抵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古籍出版社反映，他们那里的派性没有得到批判，以后又调进了一些角刺人物，这些人（包括个别党员）抱成一团，形成一股暗流。他们总是一贯“正确”，过去反过“走资派”，今天又反所谓“思想僵化”的“凡是派”。他们抓住解放思想的旗帜，接过发扬民主的口号，大搞派性干扰，凡事唱反调，处处刁难领导。社里贯彻上级指示，要求发稿做到“齐清定”，他们诬蔑“是搞投降主义”、“卖国条约”、“妥协主义”，公开反对和抵制。社领导抓调整选题计划时，因他们顶住，难以贯彻。

四、挑拨关系，扩大事端，制造矛盾，唯恐不乱。日历厂的支委×××犯有生活错误，公司纪委正

在处理。该厂少数“造反派”则利用他的错误，大造舆论，趁机捣乱。今年四、五月份，派头头×××用“读者来信”的形式，把他的错误写在明信片上，到处扩散，企图破坏党的威信。中华厂在工调中，有的职工得不到升级，思想不通，“造反派”、角刺人物就趁机挑动说：黄浦江没盖子，你不通可以去跳！

五、提出所谓“落实政策”的要求，妄想官复原职。新华书店的派头头××，原系一九六四年进店的仓库工人，文革中靠打砸抢爬上台。在他掌权期间，书店制造冤假错案一百四十多起。他不甘心下放，竟说：“过去新干部对老干部落实政策，现在老干部上台，对我们新干部没有落实政策。”有的还以“安定团结”为名想翻案。

六、假借民意，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欺骗群众。一些“造反派”头头，过去假借民意，打着“造反”的旗号，以“群众代表”自居，结合到领导班子中来上台掌权。今天他们被罢了官，丢了权，还竭力继续把自己装扮成群众利益的代言人，成为我们的反对派。少儿出版社的派头头×××，今年六月在选举区人民代表时，和党组织对着干，帮助别人拉选票，搞“竞选”，甚至不择手段地要把另一位候选人搞下去。据古籍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等单位反映，在基层工会的选举中，

不少“造反派”头头、角刺人物钻进了工会，他们倒成了为群众说话的“代表”，和党政领导谈判。

（第43期，10月20日）

增加旅游服务项目 要注意政治影响

据反映，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今年为旅游外宾增办了照相业务。除一般的摄影外，他们还仿制了一批八路军军服（有臂章）和军帽，临时出租给旅游的外宾穿戴，扮作八路军指战员，在挂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牌子的门前拍照。一些旅游参观点在照相业务中，出租古装、戏装给外宾照相，是可以的。但是，出租八路军军装，让外国人扮作八路军，在我纪念馆门前照相，这在政治上很不严肃，影响不好。

各地旅游参观点为发展旅游业，积极设法增加服务项目，丰富活动内容，值得鼓励。但举办各种活动时，要注意政治影响。

（第43期，10月20日）

“绥靖”一词使用应慎重

国际上对苏妥协退让的倾向，应该揭露批判，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害性，但是要注意实事求是，不要动辄扣“绥靖”帽子。

英文中的“绥靖”一词为 Appeasement，系指姑息纵容侵略者，不惜牺牲他国的领土、主权甚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求妥协的政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等国纵容德、意对外扩张，以牺牲中欧、东欧的一些国家为代价，取得与德、意侵略者妥协。一九三九年的《慕尼黑协定》就是这种政策的突出表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搞“绥靖”导致大战灾难，西方政界对“绥靖”帽子很敏感。我们使用“绥靖”一词应该慎重。不要把缓和、对话、政治解决一律扣上“绥靖”帽子，因为这样做不利于争取朋友，而且不够确切，难以使人信服。我们要把西方国家同苏联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牺牲别人，与苏作交易相区别；把西方国家在加强实力的基础上与苏对话，同在苏联威胁面前软弱退让相区别；把西方国家

同苏联进行正常的经济技术交流，同在经济技术上资助苏联相区别。

（第43期，10月20日）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一文的编者按

这是新华社《参考资料》译载的一个材料，系日本两个教授的一篇谈话记录，原载该刊九月二十日一期。这两位教授对现时的中国发了一大通议论。有些是瞎说的，有些确实戳中了我们的痛处。而我们对自己的疮疤却往往麻木不仁，或者讳莫如深。认真想一想人家的议论，从中受点教育和刺激，打起精神，奋发图强，硬是要把四化建设搞上去，不是很好吗？随着外国人来华日多，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我国各式各样的评论。建议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注意选择那些有份量的、同本身工作关系密切的“外论”，交给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城市中的青年讨论，得出必要的结论。这也是把思想工作做活的一种办法。

（第44期，10月25日）

地方要关怀和支持部队建设

据人民日报反映：近几个月来，编辑部收到各地驻军干部、战士的大量来信，反映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情况。

部队同志来信说，现在社会上有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看不起解放军，侮辱性地称他们为“小当兵的”、“穷当兵的”、“大头兵”、“大兵”、“黄皮”。有一次，在甘肃嘉峪关西大桥斜坡，一个女青年骑自行车滚下路基，解放军跑去救人，几个青年竟然高喊：“大兵，快上啊！谁救了她是谁的！”这些使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非常不满和气愤。有的生产队不按照政策照顾军属。山西长治驻军的同志来信说，他们连七班副班长张俊林，家中没有主要劳动力，母亲要求生产队适当照顾工分，大队支书竟说：“不照顾你。没劳动力活该。谁让你儿子当兵去了？自找苦吃。”把张大娘气哭了。青海驻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反映：仅今年八月份就收到二百八十七封声称亲人病重、病危，催战士回家的电报，经向地方政府查问，这类电报大

部不实，多数是叫战士回去找对象、找工作，或动员早退伍。新疆驻军某部同志说，许多战士一见家里接二连三来电报，催促探家，不由得心里发毛，使训练工作无法进行。《人民日报》短时间就收到一百多封来信，呼吁亲人不要给部队战士发假电报，以免影响战士情绪。不少来信还反映，一些地方女青年缺乏正确恋爱观，给在部队的对象写信威胁，如不能提干、入党，就断绝关系，对战士的压力很大。

上面这些问题都同我们地方工作有关，应该严肃对待，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要主动地、热情地关怀和支持部队建设，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爱护军队、关心军队、帮助军队的思想。解放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忠诚保卫者。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地方干部和群众要虚心学习解放军的革命精神。任何看不起解放军的思想和有损军民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制止和纠正。对极少数肆意丑化、诬蔑解放军战士见义勇为的人，要发动群众给予舆论制裁。

要切实做好拥军优属的工作。地方党政群领导机关要经常征询当地驻军的意见，在各方面给部队工作提供必要的方便。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

产责任制的文件明确规定，实行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社、队，对烈军属要有适当照顾。各级党委要督促、检查基层组织具体贯彻落实。要继续妥善安排军队转业、复员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要教育爱人在部队的女青年，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支持自己的亲人安心在部队工作，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各地报刊也要关心这些问题，通过宣传报道和评论，为促进地方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46期，11月3日）

总政文化部提出要继续加强 反腐蚀的教育和斗争

新华社反映：最近，总政文化部派人去福州军区所属部队，调查了在海防、侨乡部队推荐歌曲、电影、文学读物后部队文化活动的情况，发现当前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反腐蚀的教育和斗争已取得了效果，但是还需要继续加强。

闽南沿海一线，侨属密集。党的对外方针和侨务政策调整后，厦门辟为特区，福州、泉州、漳州开放，越来越多的华侨归国探亲观光，不少人向公社献款献物，做了许多有益于侨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对部队有积极影响。但是，外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台湾的“心战”宣传和文化渗透，也随之反映到部队中来，对一些干部、战士起到腐蚀作用，以致有的堕落变质。一些人相信“命运”，搞封建迷信活动。某师一位退休师长病故，有关部门效法当地为死人“超度”的封建习俗大办丧事，“花圈一大片，小车一大串”，战士列队护灵，并竖立镶有遗像的墓碑，影响很不好。

针对这种情况，在部队大力推荐歌曲、电影、文学读物，对抗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得军心。总政推荐的十二首歌曲，有力地促进了大唱革命歌曲和传统歌曲活动，抵制了港台靡靡之音。连队反映：推荐歌曲，是“战士的歌”，“一唱这些歌，就象要上战场一样”，“连队再也没人哼哼港台流行歌曲了”。唱革命歌曲活动也影响到地方，福州、泉州、厦门等地都举行过军民歌咏大会。

总政推荐的二十部电影，也很受部队欢迎，为部队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提供了形象教材。某守备师在

××放映推荐影片《东方红》时，军民观众人山人海。连队干部说：这些传统影片能帮我们学军史、学英雄、学打仗，娱乐性也好，部队很需要。他们对外国影片、爱情影片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通过影评引导大家正确理解。

部队推荐三十部文学读物，蔚成“阅读好书”风气，有效地抵制了手抄本坏书的流传。福州部队连队俱乐部设施较好，普遍有图书室、阅览桌，连队图书室藏书从二百至一千册不等。文学读物、科普书籍和各类杂志，对青年战士很有吸引力。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四面是山，抬头是天，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的枯燥生活。最近，军区又拨款九万六千元，为每个建制连购买两套推荐文学读物。

总之，对以上三项活动，部队老干部支持，说“这才象部队样子”；基层带兵的人赞成，说“这样一来，兵就好带了”；连队广大战士，尤其是骨干最高兴，说：“这样引导，部队风气就歪不了啦！”有的基层干部听到一些指责三项活动的反应后说：部队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为迎合一些人的不健康“口味”，为迁就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而放弃我军文化工作的好传统。

个别单位在进行三项活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

是对三项活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军队推荐十二首歌曲是搞“形式主义”，推荐二十部电影是搞“样板戏”，“吃忆苦饭”，“多此一举”，不理解引导大家唱健康的歌，看健康的书和健康的电影的重要意义。二是在进行这三项活动中，有的部队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引起战士反感。有的乱下禁令，乱没收书籍等。

根据以上情况，总政文化部认为，对外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影响和腐蚀，不仅海边防、侨乡部队应该引起重视，而且驻大中城市部队以至全军也不能忽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腐蚀教育和斗争。这应成为巩固部队战斗力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在部队文化生活中，要继续加强反腐蚀的教育和措施。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方针原则，以及今年向全军推荐歌曲、影片和文学读物的措施，反映了部队文化生活和反腐蚀教育的需要，得到部队指战员的拥护，应该坚持搞下去。并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更细。

二、海边防部队要重视开展“战士之家”活动。不仅海边防部队和驻侨乡、特区的部队要搞，而且大中城市驻军以至全军部队都应该逐步搞起来。要给广大干部、战士以高尚而丰富的精神生活。

三、为培养部队文化干部，需要重视军队院校的

文化工作。军队院校要适当开设部队文化工作传统的课程。也需要有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使部队文化工作干部后继有人。

四、要重视部队业余作者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作用。要有军事题材创作的繁荣和突破，不能不重视全军广大业余作者的作用。他们希望重视部队业余创作队伍，更希望恢复类似《解放军战士》那种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刊物。

(第46期, 11月3日)

照相业要刹歪风

据新华社记者反映，一些城市的照相业近年来积极恢复特色，扩大服务项目，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又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上海市照相业一九七九年营业额达到一千四百三十多万元，比七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创造历史最好水平。但是，有些照相馆为了追求赢利，不惜迁就、迎合社会上某些腐朽颓废的风气。有的女青年头戴男式大圆礼帽，身穿男西服，配上“杜丘”式墨镜，嘴叼香烟，要求摄影员在她喷吐烟

雾时拍摄。有的男青年戴假发，装“乳房”，画眉抹脂涂粉，还戴了耳环、戒指，要拍“女人照”。我们有的照相馆全都照办了。特别是还有些照相馆，代客冲晒下流无耻或其他的坏照片。其中，有男女裸体拥抱的；有一个非洲留学生同我国两个女青年在床上全身赤裸抱成一团的；也有身着伪军装，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有既佩戴青年团团徽又挂上十字架的。

社会主义的照相业，要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需要服务，反映健康美好的形象。群众的审美观念、个人爱好千差万别，在摄影时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以千篇一律的模式对待，应该尽可能照顾他们的要求。但是对于上述那种丑恶的、淫秽的、政治上别有含意的东西，决不应该来者不拒，照摄照印，而是要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教育引导，或者严词拒绝。有些实际上是勾搭外国人卖淫的底片，还可以考虑提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46期，11月3日)

江苏省发出解决工矿企业 宣传经费问题的通知

最近，江苏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联合发出通知，明确了工矿企业宣传经费的开支问题。通知中说：

“根据许多工矿企业党委（总支、支部，下同）宣传部门反映，目前工矿企业党的宣传工作所需经费从何处开支不大明确，有的单位甚至因经费不落实而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现经我们研究，今后工矿企业中，除工会系统的宣传教育活动的经费由工会经费中支出外，凡是由党委宣传部门负责的宣传鼓动工作等所必需的经费，现重申本着增产节约精神，仍按原来渠道列入企业管理费开支。”

（第47期，11月5日）

王任重同志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六日)

结合我们的广播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

广播、电视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于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工具。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广播、电视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发展的事业，在整个宣传战线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广播、电视是我们宣传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别于通讯社、报纸、杂志，应该有自己的新闻，自己的评论，自己的特点。它同其它宣传部门的关系应该是：既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特点，又要互相

支援，很好地合作。同志们提出竞争，我看还是搞竞赛好。比、学、赶、帮、超。我们大家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要互相扯皮，同心同德、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搞好宣传教育工作。

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各级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和宣传部长，有责任及时地把党委的意图给宣传单位的领导同志通气。广播、电视是一项新兴的事业，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困难较多，大家要通力合作，争取中央和地方党委对我们的领导和支持，困难总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二、八十年代的中心任务

今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提出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侵略扩张。（二）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三）加紧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心是发展国民经济。这也就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任务。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完成，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

（一）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经济体制的改

革。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调整比例失调，在调整中进行改革。这就要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通过领导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克服一切不适应四化建设的制度、作风、方法。这是一场大的斗争。我们要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并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来宣传改革的好经验。

（二）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三）必须整顿党风党纪，克服官僚主义，克服特权思想和作风等错误的东西，向各种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作斗争。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三、关于经济工作的宣传

（一）首先要明确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思想领先”，“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些提法是正确的。加强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在强调按劳分配、实行必要的物质奖励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精神鼓励，使广大

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没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没有国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个人利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要正确认识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

必须使人民知道，我们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困难还很多，改善人民生活的步子不可能太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和政府一定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要着重宣传经济战线上的好人、好事、好典型，以增强人民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对缺点、错误、违法乱纪、不良倾向，也要揭露、批评，只要做的恰当，同样会增强人民的信心，使人民看到我们党确有纠正错误，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决心和力量。但是，应以表扬为主。

(三)宣传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希望同志们定期总结检查自己的工作，有哪些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有哪些报道对调动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不利的影响，等等。

(四)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是肯定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阻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是

些什么？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加以解决。

列宁讲过，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靠什么？靠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他讲的是整个历史过程。

有人把我们国家的现状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说我们不如人家，这是事实。我们有不少年轻同志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向青年同志讲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他们经过了几百年。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他们主要是靠对本国劳动群众（包括妇女、儿童）极端残酷的剥削、压榨和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解放前的深重灾难，人民受的剥削和掠夺，很多年龄大一些的同志是知道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为我们党缺乏经验，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特别是十年浩劫，所以我们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焕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不发生意外的事件，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速度一定会比过去快，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关于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等问题

(一) 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学习,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实搞清楚。最近,耀邦同志批评了这个问题,对中央文件,有人把它锁在抽屉里根本不看,有的人马马虎虎看一遍,就丢在一边,不好好思索,不好好研究,不好好贯彻执行。例如:最近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经过讨论,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农村实行责任制问题的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补充,是根据实践经验的发展。但我们有些同志不作调查研究,也不学中央文件,在那听“风”,按“风”办事,好象中央提倡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哪有这回事呢?同志们把这个文件认真地看一看,研究研究,就可以正确地宣传党在农村的政策。按“风”办事,不是从实际出发、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

(二) 必须联系实际。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三) 新闻报道必须真实,不要乱许愿。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宁肯多做一点,少许愿,多报道已经做了的事情。

(第48期,11月10日)

积极准备做好《周恩来选集》 出版后的宣传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将于明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恩来选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编辑出版《周恩来选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做好《周恩来选集》出版后的宣传工作，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十一月十一日邀集首都主要宣传单位及有关部门进行座谈。大家谈了如下意见：

一、宣传的重点是《周恩来选集》的思想理论内容，而不是作者的生平。要从这些著作本身的分析中，

使大家认识到作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的一些见解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注意实事求是，不要滥用溢美之词。

二、学习我党思想理论财富，包括《周恩来选集》在内的重要著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要造成一个运动。因此，在宣传上不要过分集中。但在《周恩来选集》出版后，宣传上应当有一定的反应。组织理论界写些有质量的文章，分别在各报刊陆续发表。同时发表一些各界读者言之有物的学习心得。

（第49期，11月25日）

理论研究中 一个需要注意掌握的问题

今年九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写信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要求发表毛泽东同志年轻时读《伦理学原理》一书之批注。他们说：“发表这一历史文献，有利于研究和认识毛泽东同志世界观的转变、发展过程，有利于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的神话。”

中央文献研究室认为，研究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

虽然是可行的，但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全党正在与讨论三十年来的经验总结相结合，进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宜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在毛泽东同志早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这些著述上去，免使问题复杂化。因此，现在以不发表这类著述为妥。毛泽东同志早年的这些文献材料，宜于在以后适当时期比较有系统地整理印出来，提供学术界研究。

（第49期，11月25日）

宣传涉及政策变动的试验要慎重

据全国妇联和其他有关部门反映：近来有些厂矿以保护怀孕、哺乳期女工和独身子女母亲的身心健康为由，对她们实行留职放长假一至三年，发工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的办法。有的地方报纸公开报导了这方面的消息，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疑虑和意见。

全总女工部在今年八月调查，据不完全的统计，鞍山、大连、沈阳三市已有三十个企业实行了上述办法。而在这些单位中的大多数怀孕、哺乳期女工并不

欢迎。她们认为，这种办法弊多利少：第一、影响进步，容易造成技术荒废；第二、减少收入，引起生活上的困难；第三、职业得不到保障，社会地位降低，受歧视。

全总和全国妇联认为，一些企业不分工种，不管自愿与否，强使怀孕、哺乳期女工回家休长假的做法，是不对的。它并不符合党和国家保护女工的一贯政策，直接违反劳动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不利于充分发挥女工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对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权衡利弊，以便正确处理。

凡涉及政策变动的一些试验性的作法，一般不要匆匆忙忙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如果确有必要公开报道，也一定要说明这是在一定范围内试行，并且讲清试行的条件和问题，供各方面研究参考。不要造成已是成功经验，可以普遍推行的错觉。对怀孕、哺乳期女工实行放长假的办法这样一个相当复杂，涉及面广的问题，我们要慎重处理。最好先在内部报刊上反映，开展讨论，不宜公开刊登消息或文章。

（第49期，11月25日）

正确对待少数人闹事的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的个别大专院校学生由于校舍、选举等问题，发生集体上访、罢课、游行。有的铁路沿线的货车上出现煽动性的标语。个别工厂有工人乃至工会干部公开提出要“抛弃现在的工会”，成立“独立工会”。这些情况必须引起当地党委和有关学校、工业交通企业党委的高度重视。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破坏，党的领导工作上的“左”倾错误，使得我们各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欠债累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又徘徊了两年。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党和政府在调整 and 改革国民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还将做更多的工作。但是，至今无论是党、人民政府还是广大干部、群众，都还面临很多很大的困难。其中有些经过工作是可以克服的；有些限于客观条件是一时难于解决的。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学习中应该而又可

能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对目前确实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做宣传解释，这就有可能孕育闹事的因素。

要防止和消除闹事，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向有意见的学生、工人说明，党和行政组织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领导人不能称职，可以向上级党委提出以至建议撤换。但是要求成立“独立学生会”、“独立工会”，企图摆脱、取消和推翻党的领导的行为，则是违反宪法的，不能容许的。要依法劝阻、制止。我们仍然要坚持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原则，决不允许任何从根本制度上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必须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关心他们的疾苦，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

（第50期，12月5日）

宣传要有利于民族团结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干事恩克吉雅（蒙族）同志来信，指出有些公开文章在涉及民族关系的时候不够谨慎，引起少数民族的意见。例如：讲吃月饼的历史，绘声绘影地叙述元朝末年汉人“一起动手杀‘鞑子’”的故事；说“四人帮”的祸害，“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留下了现代成吉思汗马蹄的印迹”。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后要大力宣传民族团结，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谈古论今，都不要说任何有可能伤害民族感情，挑起民族纠纷的话。

（第50期，12月5日）

关于党的诞生日的公开宣传

十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第三版《党员应知》栏目里刊载了一篇资料说：现经查出，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所以，我们党的诞辰日应为七月二十三日。

关于党的诞辰日是否应该更正，如何更正，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没有作出改变的決定之前，公开宣传仍应维持历来的说法，即七月一日是党的诞辰日。希望各地报刊注意。

（第50期，12月5日）

桂林市推行人民公约活动

今年五月，一些外国旅游者对桂林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提出了批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引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努力进行整顿，做了大量的工作。桂林市不少干部、群众提出，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需要有一个道德规范，使全市人民有所遵循。市委接受了这个意见，由市人民政府在六月间草拟了《桂林市人民公约（初稿）》，发到各个基层单位广泛讨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订，正

式印发给工厂、商店的班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生产队，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学习、宣传。于十月十日起正式执行。有不少单位还结合制订了更具体的厂规、店约。据检查，实行人民公约以来，全市环境卫生、社会秩序和风气有明显的改观，很多商店的服务态度受到中外旅客的好评。

附：

桂林市人民公约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扬社会主义风尚，以利于风景游览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特订此公约，全市人民共同遵守。

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同心同德干四化。

二、爱护山、水、花、木，爱护文物古迹，爱护一切公共财物。

三、尊老爱幼，尊师爱徒，尊师爱生；邻里团结，家庭和睦；乘车乘船不争先恐后，主动给老弱病残者和孕妇、儿童让座。

四、遵纪守法，维护公共秩序。不赌博，不打人，不骂人，不聚众起哄，不乱停放车辆，不在街上乱设摊摆卖，不

乱张贴广告海报。

五、讲话和气，不说粗鄙话，对人要有礼貌。

六、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婚事、丧事要移风易俗，不铺张浪费。

七、积极参加正当的文体活动，不唱黄色歌曲，不看黄色书刊，不搞家庭舞会，不跳摇摆舞。

八、对外宾要热情友好，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不尾随围观，不讲有损国格、人格的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九、爱清洁，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扔果皮、纸屑、烟头。不乱倒垃圾、乱泼污水。

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第50期，12月5日）

不举行领导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

最近，有的友好国家驻华使馆人员向我有关部门询问：明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五周年，我国是否准备组织纪念活动？

明年一月、七月、九月，分别是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逝世五周年。根据中央关于“少

宣传个人”的指示和有关礼仪、制度改革的精神，今后一般不搞去世的领导同志的周年纪念活动。明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逝世五周年，国内将不举行有组织的纪念活动。至于逝世十周年是否举行纪念活动，将来再作研究。

(第51期, 12月24日)

报刊要严格把关防止泄密

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第一版，据广州“一位北调秦城从事监守政治要犯的朋友”提供的材料，发表了一篇题为《秦城监狱里的江青》的“本报专访”，把秦城监狱的内部情况、江青等四人帮在狱中的表现以及关押的其他一些要犯的姓名等等，都透露了。而广州《南方日报》却在第二天把这些内容加以转载。有的地方报纸又据《南方日报》再予转载，更扩大了影响。

秦城监狱是我国囚禁重要犯人的地方，未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不得对外泄露它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广州那位曾被调到秦城监狱工作过的同志，擅

自对香港《文汇报》透露机密情况，违反保密规定，是错误的。香港《文汇报》公开发表这些材料，就更不妥当了。而我们内地的报纸理应严格掌握，不去扩散这类东西，但却没有这样做。

最近一个时期，类似的泄密问题不断在一些报刊出现。有的不经请示，甚至同有关部门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内部机密刊物的材料刊登在报纸上，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过去有的地方和部门控制太死，不该保密的东西也严禁宣传。纠正了这种偏向，要求报刊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之后，有的又把应该保密的东西捅了出去，产生了不好的后果。我们的记者、作者、编者，头脑里的保密观念还是要继续加强。在涉及到一个具体问题的机密界限的时候，要主动虚心地向实际工作部门联系，内容重要的还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不要轻易自作主张，以免由于泄密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报刊编辑部在这方面，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度，有专人把关。对于情节严重，恶果很大的泄密事件，必须认真处理，吸取教训。有的还要追究责任，不能放任不理。

（第51期，12月24日）

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进行拨乱反正，千头万绪，几乎采取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到调整一部分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在工作方法和步骤上要慎重，要善于分清轻重缓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政治和经济的调整，这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个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维护安定团结。每一个步骤都要力求稳当，尽量避免或者少引起人们的紧张和波动。要首先解决主要问题，不要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好事不能一天做完。有些不急的事，可以先放下。凡属重大决策，在没有经过周密讨论，确定妥善的实施办法之前，先不要拿到党员中去讨论。这样，才能团结绝大多数干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解决主要问题而努力工作。

（第52期，12月25日）

